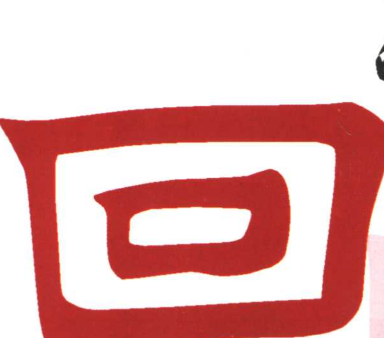
科学与人生

学思历程的



忆



何丙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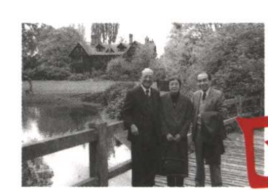
科学、人文、李约瑟



(N—0278.0101)

学思历程的回忆







何丙郁（Ho Peng Yoke），1926年4月4日生于马来亚，世界著名的华裔中国科学史专家、人文学者，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终身职），被评为英国物理学会会士、澳洲人文科学院院士、中国院学院名誉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等。

若以“科学”、“人文”、“李约瑟”这三个主题词来包络全世界的学者，本书作者何丙郁的名字当是排在最前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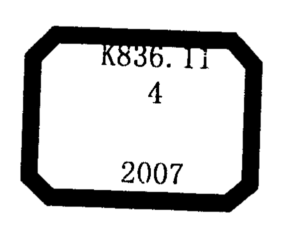
作者从一名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物理学家，摇身变成东西方文化界知名的华裔人文学者。他以独有的眼光、睿智和魄力，穿梭于欧亚澳美四洲，做出跨领域、跨文化、跨学术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肯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作者与李约瑟博士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关系，以及后来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长达12年。

本书作为学术性自传，既记录了作者不平凡的学术生涯，又向读者展示了他慈祥、谦和的绅士形象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ISBN 978-7-03-018765-9
9 787030 187659 >

销售分类建议：科普/传记

定　价：24.00 元



学思历程的回忆
——科学、人文、李约瑟

何丙郁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思历程的回忆：科学、人文、李约瑟/何丙郁 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3-018765-9

Ⅰ．学…　Ⅱ．何…　Ⅲ．何丙郁-自传　Ⅳ．K836.1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039871号

责任编辑：胡升华　侯俊琳　王　建／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高海英
八方文化创作室　策划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3/4
印数：1—6 000　　字数：212 000

定价：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代序

两栖学者、行吟诗人和云游僧

刘钝*

2005年底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国驹寄来的何丙郁教授新著，立刻为其新颖的书名所吸引——*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内中rove这个词本有“漫游”、“流浪”的意思，按此原书似乎可以直译成“一个游走学者的回忆”，而作者游走的世界，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是“科学、人文和李约瑟”(*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平心而论，以上面三个主题词为交集来一个“煮酒论英雄”，纵使放眼全世界的学者，本书作者的名字也会排在最前面。作为一位出生在英属马来亚的华裔学人，何丙郁先生从小接受英文教育，大学主攻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当物理教师，20世纪60年代成为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

*作者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英国李约瑟研究所2006年度梅隆基金学人，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海外Fellow，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70年代出任澳大利亚格里斐斯大学当代亚洲研究院首任讲座教授兼院长，80年代主持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任讲座教授，90年代由李约瑟博士钦点担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作者精通世界多种语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一身兼任了科学史工作的筹资者、组织者、宣传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欧亚澳美四洲”（席泽宗院士语），当之无愧地入选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台湾“中研院”，以及总部设在莫斯科的欧亚科学院院士。

从书中得知，作者1926年生于马来亚一个叫甲板（Papan）的小镇，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父亲从广东军界退出后移居南洋舌耕为业，用粤语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还有艰深一点的《四书》和《左传》；他也从父亲的藏书中读到汤姆逊（J. A. Thomson）的《汉译科学大纲》，并由此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的兴趣。生活在一个华、马混杂的地区，父亲曾以《孟子 · 梁惠王下》的“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为训，告诫他要博采众长，尊重当地文化。7岁那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他送到当地的英语学校去读书。作者后来认为中国人的“学以致用”和西方的“为知识而知识”是可以相容的，这与他早年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以及父亲教导他要宽容地看待异质文明是有关系的。

成年以后，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选择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是1952年博士论文的方向和题目。当时作者已是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物理系副讲师，在气流测量方面做过一些很好的工作并参与指导核物理课程的实验，这一年他在英国《暖气与空调设备工程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内中提出一个关于温度、湿度和气流对居民舒适度影响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对这种工作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因为他意识到个人的感觉是不好用物理参数来衡量的。也正是在此时，兼任文学院院长的数学家奥本涵（编者注：即奥本海默）（Alexander Oppenheim，并非主持曼哈顿计划的那位美国物理学家 Robert Oppenheimer），听到他在学校数学会所作的一个有关中国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讲，遂建议他转向研究中国科学史，这样在理学院注册的何先生就跨系师从文学院院长从事《晋书 · 天文志》的研究，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李约瑟博士。

第二次是1963年接受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聘请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讲座教授。这时作者在学术界已站稳脚跟，当年担任其博士论文校外答辩

委员的两位学者——李约瑟和哈特讷（Willy Hartner，德国从事阿拉伯天文学史研究的权威），都想将他罗致身边，而作者在剑桥访问两年之后回到新加坡，被任命为该校仅有的两个“Reader”（英国俗称“无讲座教授”）之一，并在物理系开设科学史课程。在剑桥的时候，作者亦曾旁听固体物理学课程——由于不久前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科目，也曾有过同几位顶尖科学家打交道的机会。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且阅历越深标准就应该越高。关于这一点，作者总是不忘父亲当年评价一位前清榜眼书法时说过的话：“假如这些字出于别人之手，可以说是美轮美奂，但是以榜眼的身份来挑剔，就显得缺少个人风骨。”而李约瑟博士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他给予忠告：“在一个研究条件较差的大学，你绝无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但如转而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日后也可建功立业。”因此当吉隆坡的聘书到来之际，作者考虑的是：要继续研究中国科学史，一个中文系的位置远比物理系的位置有利，而吉隆坡将为他提供一个当时世界上唯一以中国科学史专业任讲座教授的机会。

第三次是1990年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一职。此时作者已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在澳大利亚有优厚的讲座教授待遇，在海峡两岸、东南亚和日、韩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剑桥当一名无薪所长，除了筹钱维系研究所的生存之外，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应该说是一件极为棘手而于个人得不偿失的工作。考虑到李约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开创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薪火相传，作者毅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在剑桥当了12年的义工。从书中知道，当时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机构有三家，即剑桥的东亚科学史信托会，以及分别设在香港和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围绕着研究所的运作出现分歧是难免的：剑桥信托会认为自己拥有管理研究所的主权，香港和纽约方面则认为自己是股东，当然有权对研究所的方向以及管理人选进行干预，再加上李约瑟本人和他身边的一些老朋友，作者发现自己有四个“雇主”，而为人处事的洒脱与厚道使他在困难的环境中游刃自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免得顾虑四个不同意见的雇主之间的分歧，这是唯有当一个义务所长的人才能享受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作者、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后继者们的努力，李约瑟研究所修复和发展了同剑桥大学的良好关系，

不但成功地继承了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宏伟计划，而且发展成西方世界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

对何丙郁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等方面的那些具体工作，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脉络进行评点，那将是为他的学术文集撰写导言者的任务。但在匆匆追溯了作者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游走经历之后，我还是愿意从大处着眼，特别介绍一下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他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科学，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等等。相信这位睿智的前辈的亲思亲历，对于我们今日客观地认识历史、体验和欣赏人类文化，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近年来我一直留意斯诺（C. P. Snow）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因此也就特别关注作者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看法，以及使他最终成为一名两栖学者的原因。作者写道："科学有助于人文，而人文也有助于科学；科学不能逃避历史，但是能够创造历史。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新知识积累越来越多，学科划分也越来越细，而且还有新的学科不断出现，20世纪初以来人们所担心的文科与理科之间的鸿沟现在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建议"研究人文科学的人们不妨多了解一些科技，不仅可以赶上时代，而且或许可以促进对人文学科的认识；反过来，从事科技专业的人们说不定也可从人文作品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养分，至少可以开拓视野，砥砺思考的能力，陶冶高尚的情操，从而培养健全的品格。在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

书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传统中国科学史"，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数术研究的一个动因。作者说，早年受邀参加《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时，必须尊重和采纳李约瑟的观点；而李是以一个20世纪中叶著名生物化学家的立场来探讨中国科技史的。到香港后何先生就想起父亲关于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的遗训，开始尝试从传统中国人的角度来探讨一些话题。他认为：我们谈及中国的传统科技史，应该力图和当时的人们易地而处，考虑传统中国人所分析和理解的自然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分析和理解。宋代的张载、邵雍、朱熹等都有自己的学说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当代研究科学史的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理学家们主要关注人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工作不被看作科学。但是"很少人知道宋代司天监曾使用三种与理学家学说相关的方法以预测天气的变化。无论在他们的时代

'科学'这个名词是否存在，也无论他们想象中的东西是否被现代人承认为科学，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能够解析自然界和应用这些知识以预测大自然变化的学问，应该算是科学。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中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是基于他身为一位现代科学家的立场。在传统中国人的心里，李约瑟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该是当时的科学"。

关于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科学知识，作者还有如下一段有趣的陈述。1985年作者接到伦敦物理学会的通知，证言他已是一名拥有女皇特许状的职业物理学家（chartered physicist）。此刻他不禁回忆起30多年前追随卡文迪什实验室出身的老师学习物理的经历，当时虽然是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前殖民地大学里的本科生，但使用的教材同剑桥大学的学生是一样的，因此相信自己所学习的就是当时代的物理；而在接获这一正名文件之后，他倒觉得已经不能妄称物理学家了，充其量不过是个物理学史的研究者，原因是自己30多年前学习的物理今日已成历史陈迹。他写道："科学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30多年前的物理学已经不是90年代的物理学，何况几千几百年前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呢？西方托勒密（Ptolemy）的地心说和施塔尔（Stahl）的燃素说是他们时代的科学，后来都被推翻，可是从来没有人说它们不是科学。这是从西方希腊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学史，没有什么不对，否则就没有科学史学科这回事。问题是有些人对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认为假如研究东方科学史，能够兼从东方文化背景做判断，应该可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

在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为题的这一小节中，作者叙述了一段故事，说明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科学史态度的转变。对于动辄以"辉格史学"来贬低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某些学人，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这里忠实抄录如下："以历史这门学科为例，20世纪中叶，西方的所谓'正统历史派'以古希腊遗传的文化为正统。例如，剑桥大学没有中国史这门课，偶尔提及的都是中国与欧洲有关的事情，主要的课题是欧洲优越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中国史学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当时的'剑桥历史学派'可说是'正统历史派'的代表者。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一个皇室讲座教授（Regis Professor），享誉欧美史学界。起初他对中国史也采

取轻视态度。1955 年，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在他的就职演说辞中说：‘中国不能被屏诸人类历史的主流以外’。以后他和巴特菲尔德之间发生多次笔战。《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二、三卷相继在 1954 年、1956 年和 1959 年面世。1962 年，巴特菲尔德突然改变他的立场，他自己说是受到李约瑟的影响。可是争论余波还往往浮现在中国科学史的讨论中，有些人还以西方的定义划分中国的科学史。例如，在第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中有一位物理学专业者以西方的定义说传统中国没有科学。传统中国是否有科学的问题本书已经做了交代。较近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天文纪录不属于科学史。其实，当年我研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纪录时，我的心中也毫无科学史这个念头，谨希望可以对知识和学问做一点贡献。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泽宗做类似研究的时候，也跟我有同感。”

Roving Scholar 这一称谓也使我联想起另一类人物，西方叫 troubadour，中文译作行吟诗人。前面说过，在这篇序文中，我不打算对何丙郁先生的学术成就过多着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想尝试的是向读者展示这位老学者人性中极为可爱的方面：宽容、潇洒、机敏、助人为乐。回顾最后在剑桥的那段经历，作者说：“我放弃澳大利亚讲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剑桥当义工，从经济上看是一件极不上算的作为，我也很难向关心我的局外亲友解释自己的行动。可是在李约瑟研究所当时的场合，不领薪有不领薪的好处。一个拿钱的所长在当时不仅会树大招风，而且还要讨好几个意见不同的东家，这样的所长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这是大智者的语言，大智者的行为。及至功成身退，作者又流露出诗意般的心境：“我以轻松的心情离开剑桥，想起伍连德博士当年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做事情要担得起放得下’。也许一个做义工的人很容易做到这点，但是没有金钱上的报酬不等于没有其他方面的报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任职期间，很欣慰地看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海峡两岸的大学，以及日本和韩国大学的年轻研究者能够共聚一堂，不分国家、地域、门派地友好相处，切磋讨论学术问题。”他又说：“几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学者，经历过在李约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时期，得以和国际上的同辈排名。他们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也令我感到快慰。我认为这是金钱所不能替代的最好报酬。”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是有亲身体会和发言资格的。1992 年，在何先

生的安排下，我得到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为期半年的访问。记得何先生在邀请信中写道："我相信你不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能够置身剑桥的学术环境去体验世界一流的学术传统。"对于我和许多后来的中国内地学者，后一点尤为重要。经过在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的这段经历后，我回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不久就承担了学术服务任务，后来亦参与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活动，先后担任国际科学史学会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等职，又与国内外同事们一道，在北京成功地组织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在何先生主持李约瑟研究所期间，通过纽约的李氏基金会（Li Foundation of New York），每年都安排一名中国内地的年轻学者来剑桥学习和研究，那些来访的年轻朋友后来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在李约瑟研究所访问结束后转到剑桥大学考古系深造，成为国内最早接受专业科技考古训练的学者，现在是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来自西北大学的曲安京在中国数理天文学和古代历法领域颇多建树，亦被选为国际数学史委员会执行委员；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郭世荣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钮卫星也都成绩斐然，后者还承担了第10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的主要组织工作；我的同事胡维佳现在负责中国科学院李约瑟著作翻译出版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另一位同事汪前进则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何先生卸任后，古克礼博士（Christopher Cullen）和李约瑟研究所继续施行这一方针，目前研究所利用李氏和梅隆（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两个基金，以及中英研究奖学金（Sino-British Fellowship）等，常年资助七八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前来访问研究；此外，研究所也为众多从其他渠道（包括美、欧、日、韩，以及中国内地高校、教育部和科学院，还有台湾地区）获得资助的访问者提供办公室和图书馆的便利，最近还开拓了与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合作培养东亚科学史方向博士生的计划。

曾经有人当面赞扬李约瑟博士，说全人类都欠他一大笔账。从揭示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意义上来看这话固然不错；但是作者也指出"既然李约瑟研究所全靠国际上的资助，它就应该对国际上有关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贡献，让人们有机会利用这个研究所，尤其

是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国内地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出国做研究的机会则相对比较少。协助李约瑟出钱出力最多的是华人，我就应该从华人方面先着想。"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情，作者对来自华人世界的访问者特别是中国内地的青年人就格外热情，我接触到的几位朋友对此都深有体会：不管来自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也无论其背景和学历如何，老先生对每一位新来的年轻人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和指导，从剑桥的学术传统到英国的社会习俗，乃至围绕着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种种趣闻轶事，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地熟悉这里的环境。逢到师母一道来剑桥，作者还会邀请年轻人到他家做客，一道品茶、聊天、包饺子，无分长幼，其乐融融。

作者对推动中国内地科学史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1978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作者向在场的夏鼐、席泽宗等学者提出：自1956年竺可桢、李俨等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科学史舞台几乎失去踪迹；又言及多次听到李约瑟为此表示遗憾，因此提议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在场的学者立即拍手赞成并一致推举作者在海外首办。作者计划到香港赴任后即行推进这一计划，而此时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正好争取到一笔开会的经费，何先生就把首届会议组织者的名份让给了李倍始，并建议他使用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ICHSC）这一名称，那是1982年8月的事情。作者则于1981年4月只身赴港履新，并于1983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举办了第二届ICHSC会议，作者为此会的召开而操劳不遗余力，书中也有一些叙述。后来这一系列会议发展成两支：其一仍沿袭旧名，至今已召开了10届，第11届将于2007年在中国南宁举行；其二则扩充为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ICHSEA），去年在慕尼黑召开了第11届会议。两个系列会议都吸引了包括许多中国内地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科学史家参加，现在已成为国际东亚和中国科学史领域中的两桩盛举。从发起开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亲莅，而且热心地帮助组织者解决各种困难。例如，1990年的第六届ICHSC是在剑桥召开的，其时际逢李约瑟90华诞，作者又是刚到所长任上，按照他的

说法，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会议从东亚地区寻求资助。再如第九届ICHSEA，由于会址一时发生变故，又是作者运用自己的关系在新加坡大学找到了资金和当地组织者。

过去曾有传说李约瑟博士生前同剑桥大学某些科系不睦，甚至他的成就遭到大学里汉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嫉妒，以致始终得不到教授席位。从书中我们可以多少窥见一点事情的原委，尽管作者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说法。固然李约瑟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羡艳而其治学路数又与正统的汉学家不同，但与大学发生龃龉，主要还在于他乐得享受独立研究的快乐而拒绝开课授徒，而剑桥大学的Reader头衔可以保证他不受任何个人与部门的干扰，专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史。实际上，即使在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任上，李约瑟也很少过问行政上的事情；东方学部亦曾多次邀请他开设中国科学史的课程，都被老博士婉言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完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何先生主持研究所之后，开始举办定期的中国科学史讨论班。这一举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坚持至今，参加讨论班的既有研究所的成员、访问学者和学生，也有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作者认为这是同大学开展深入合作的良好开端。

作者主政李约瑟研究所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筹资。他在书中写道："剑桥信托会的大部分成员不认为替该研究所筹资是分内的事情，他们都有自己的正业，绝不会把李约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业更重要"；"况且东亚科技史尚未能够引起英国本地人士的兴趣，求他们解囊资助可说是难如登天。李约瑟在英国的名气也远比不上在东亚地区这么响亮。我多次遇到剑桥的人，甚至剑桥大学的毕业同学，问我李约瑟是谁。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国筹款也不是办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李约瑟还能亲自出马到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各地为自己的计划筹资。等到老博士跑不动了，剑桥信托会亦曾派人到香港等地活动但一无所获，后来发现何先生在香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很好的人脉与威望，尤其对权力没有兴趣，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因此就把为研究所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计划筹资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李约瑟本人和剑桥信托会都期望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替他们多筹些资金"，他写道。他也果然不负众望，在担任所长期间，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以上那些地区，为研究所和李约瑟的写作出版计划、为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各种研究计划和国际会议寻求经费资助。何先

生对此事业倾力投入而个人分文不取，为此赢得人们极大的佩服与敬重。记得有一次他以“高级乞丐”之语自嘲；而在我眼中，他简直是一个道法高深修行完美的云游僧人，以古稀之龄浪迹天涯，为塑造科学史事业的不坏金身而广寻施主。

关于为科学史事业奔走和募资的故事，作者书中讲了许多，这里仅就亲身所历做一点补充。1996年1月，已是70岁的何先生拄着李约瑟博士留下的拐杖，从香港经罗湖来到深圳大学，出席由中国科技史学会组织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来前作者已有电话给我，说要介绍一位英国的独立制片人来探索一项文化开发计划，目标是利用香港方面的资金，北京和剑桥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图书资料，以及该制片商的经验和在国际影视市场中的关系，制作一套介绍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系列电视节目，产品的销售所得则全部用来支持两家研究所的运作，这就是后来的“龙腾”计划。以恒生银行前董事长利国伟爵士为主席的一个基金会承担了这一计划的筹资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英国尤德夫人（Lady Pamela Youde）和劳埃德爵士（Sir Geoffrey Lloyd）在内的几位知名人士给予了重要支持，时任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的古克礼博士则承担具体工作最多。在实施该项计划的三年多里，作者亦曾多次居中斡旋，对于沟通中、英、港诸方信息，协调官、商、研的立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今“龙腾”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在海外播映获得好评，两个研究所也按预期的设计得到可观的资金，用于继续支持各自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抚今追昔，眼前总会浮现10年前作者行色匆匆从香港赶到深圳来时的景象。

后来我们筹备2005年在北京举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最感头痛的也是经费问题。又是何先生，于2002年来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等单位发起的研讨会期间，主动询问此事并向我建议从海外募资。他在我的办公室里亲自起草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寄给新加坡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的李成义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何文汇博士，后来李氏基金和香港北山堂基金（Bei Shan Tang Foundation）很快就有回音并对大会给予慷慨资助（后者是通过何文汇博士由中大校董利荣森先生提供的）。

因为工作和研究的关系，我曾数度在剑桥和李约瑟研究所滞留。记得上一次来剑桥是在2002年秋天。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经过研究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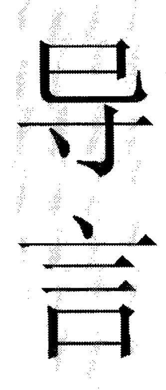
前庇护着李约瑟博士长眠地的菩提树，进得前门就看见了何丙郁先生，也是刚从北京赶来，带着旅途的疲惫，但还是那样亲切、慈祥、笑容可掬。先生身后的签名簿上则有他刚留下的大名，墨迹未干，时间是2002年10月24日，地址写的是布里斯班他的家。我知道当天是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开会的日子，后来还知道——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信托会正式通过了古克礼博士接任所长的任命，并选举前港督尤德爵士的遗孀尤德夫人为新的主席，后来这个信托会更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

在一个专为来客准备的签名簿上留下名字，老先生此刻的心境我无法揣摩，只见脸上仍是孩童一般灿烂的笑容。想起几乎每个来剑桥的中国学人都熟悉的那首《再别康桥》，虽然已经用得太滥，放在这里还是非常贴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谨以此文为先生80华诞寿。

2006年4月14日

于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导言

我原是英文教育出身的华裔物理学者，中文程度仅相等于在高中一年级时英国主办的会考中获得优异成绩。我想不到后来会成为一个中国内地之外大学中最主要的中文系讲座教授，并获得国际上的肯定，入选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欧亚科学院等院士。我早已感觉到我有必要向学术界做一些交代。2004年，潘国驹博士建议我写一部自传，由他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并安排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做演讲。主持人提议我在演讲中提一提我的经历，好让听众知晓，一个物理学家在汉学的研究上，是可能做到汉学家无法做到的事情。虽然我没有令当事者失望，但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物理学家比汉学家强的妄想。相反的，我自知在许多方面是远远比不上受正统中文教育的学者，我只能努力从其他方面寻求补救。也许读者对我这个海外华裔学人在面临逆境时的努力奋斗和应变能力会比较感兴趣。

依据我跟潘国驹博士的谈话，我的自传先以英文出版，然后再考虑将之翻译为中文或直接用中文写出。2005年，命名为《*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的英文版面世了。我必须在翻译和另写这两者中做一选择。我以英文的思维撰写我的英文版，以英文读者为对象。中文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未必完全和英文读者雷同。例如，一般中文读者不一定知道“板球”(cricket)并对它感兴趣。无须向英文读者解析的有关名词就必须对中文读者交代。这就等于白废纸张告诉中文读者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情。相反的，英文读者对巴金、刘海粟、武汉合唱团这类名词会比较生疏，就需要有多些解析。所以在取舍方面，用英文思维书写英文版和以中文思维写中文版就会稍有差异了。

完美地翻译难度极高。我曾陪同我的英国籍大学校长访问中国。当地派人替他做翻译。他讲笑话的时候看到听众都没有反应，就问我中国人是否缺乏幽默感。我回答说，问题是在他用语带双关的英语，翻译员仅从正面把它翻译成中文，遗漏了幽默的部分，听众当然不会知道他说的是笑话。我补充说，假设翻译员向观众详细解析他的笑话，经过详细的解析后，这个笑话也会失去原来的效果。一个语言的句子往往不能百分之百跟另外一个语言的句子吻合。例如，“我跟着一头驴子”翻译为英文“I follow an ass”就多了一个含义。因为在西洋文化中，“驴子”和“笨蛋”是同义词。假如翻译成法文就更不得了了。法语的“我跟着”和“我是”同样是“Je suis”这两个字。

以前有人表示我是李约瑟大作《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理想翻译者，提议我把这部书译为中文。我不以为然，也不愿意这样做。原因是李约瑟的文笔太好了，喜欢用很长的词句，并常引用欧洲古典文学的内容。翻译成中文相当费力，又恐怕译文的思维读起来不像中文而像英文。既然我不愿意中译李约瑟的大作，我也不好意思翻译我自己的书了。

经过以上的考虑，我决定另写中文版。这也提供我一个好机会引用一些从来没有动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在插图方面。由于写在英文版之后，而且引进的资料也比较多，这也可以看作为“自传”的再订版。我的两位老朋友卢绍昌和林和合替我阅读本书的初稿，赐予他们的宝贵意见，谨此致谢。卢绍昌先生早年在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建树良多，而且熟识东南亚的大学情况。林和合先生早年在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然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念物理，入学比我晚三四年。他

在新加坡政府服务期间，对工艺教育和南洋大学理事会方面贡献不浅，是我的一位广见多闻的良友。

在我撰写这部书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着不计其数的现在和过去的亲友和相识，虽然未能一一在书中提到他们，而且长期东奔西跑，我们难得有机会彼此相见，向他们多请教益，可是有缘曾和他们相遇，实不枉此生。没有他们，这本书就绝无可能面世。在执笔的过程中我常对我的已故亲友抱着怀念的心情。我谨以此书向我现在所有亲友和相识表达我的敬意。

目录

幼年时代

第一章

家世

我的父亲大约在1925年从中国广东省移民到马来亚（现在称马来西亚）。他没有带来一部详细的何家族谱。早年我曾经在家里看过他手写的一本《何光族谱》，族谱的冠名大概是他祖父的名字。但是我20岁就离家去新加坡留学，毕业后也在外任职，不知道这本《何光族谱》如何在家中遗失，后来才从一位堂叔父的口述中，获悉父亲的高祖父何芥屏公是从浙江省上虞南移到广东，落籍番禺县。当时不少在南方幕府任职的人士都来自浙江的绍兴县。我的先祖是否是其中的一位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高祖父何冠山公育有何文元公、何文光公、何文宽公和何文耀公四人。何文光公是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是何俊卿公。据我所知，俊卿公曾在海关任职，但中年就过世。他留下两男一女，即我的父亲何其汉公（字汉槎，后来改名何迪庵）、我的三叔父何其杰和我的姑母何翘珍。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三叔父，父亲跟他也毫

无通信，我又是从同一位堂叔父口中，听说他在公安局服务，当一名巡警。这位堂叔父，我称四叔，是文宽公的孙子。他名其埙，字伯乐。20世纪30年代，他在广州市伯乐街执律师业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广州市沦陷。50年代，他移民新加坡，在中正中学执教，讲授中国国文。他的母亲，我称三叔婆，是我见过的何氏家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1] 翘珍姑母，我称姑妈。我的姑丈钱永兴是一名前清的举人，听说曾当过军官。他比我的父亲更早举家移民去马来亚，在霹雳州（Perak）近打县（Kinta）的一个小镇拿乞（Lahat）开办一所私塾，取名“永兴学校”。

公元1895年，父亲在广东诞生。父亲年轻时代在学堂念书，希望将来有机会应考科举考试。我感觉到，他似乎对废除科举考试的事情有点失望。他擅长写作，曾告诉我，他常在老师出题的时候写两篇不同的作文，一篇让给同学，以赚取一些零用钱。从他的谈话和藏书中，可以看出他很崇拜晚清时代的曾国藩（1811—1872）和梁启超（1873—1929）。他曾向我推荐载述朱熹学说的《近思录》。他的思想大概是受了宋代理学家和晚清学者的影响吧。祖父逝世的时候，父亲仅10多岁。听说当时祖父的职位是可以传给父亲的，可是有一位长辈却以父亲还年轻为由，便继承了祖父的职位。于是父亲就去从军，最后从文职升到少将，为当时华南著名军阀陈炯明的部属，我猜想他的直接上司是一位姓叶的将军。他曾对我说，虽然陈炯明不肯帮助孙中山，但前者并非反对后者本人。大约在1925年，父亲突然带同眷属移民到当时的英国属地马来半岛。他对我说，这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

父亲到了马来半岛后便改名为迪庵，此后便没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除了他的几个亲戚外，父亲和中国国内的朋友们都断绝了书信来往。母亲原名吴佩瑶，后也改名为贤贵。她在16岁时和父亲结婚。她的家世我也不太清楚。我有一个称呼为“奶奶婆”的外婆。母亲称她为“奶奶”。母亲有一个弟弟，名吴日暄，我称他舅父。1938年，他们都移民南洋，有一段时期在我家居住。我和奶奶婆的关系一向保持友善，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外孙受外婆疼爱的微妙感觉，使我有些不解。

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三岁时就夭折了。母亲第三胎是一个女孩。我还记得这个妹妹。大概在她四岁的时候，当时我们

[1] 我这位四叔住在新加坡加东（Katong）的教师别墅，后来跟随他的儿子何兆明移民到美国。

住在怡保市（Ipoh）郊外的一个大和园（Pasir Puteh）小村，在一栋亚答（attap）（椰叶盖顶）茅屋里租了一间小卧房。有一天我跟妹妹在户外的时候，突然间闪电打雷，妹妹摔倒伤了腿，被送到怡保医院就医。她在医院中过世。我还记得曾随母亲往医院探望她。

根据我的学校记录，我是1926年在甲板（Papan）诞生的。甲板是近打谷的一个小镇，曾一度以产锡享誉东南亚。当时近打谷出产全世界锡矿总量的三分之二。父亲选择去近打谷不是为了它的锡矿，而是因为他的姐姐和姐夫住在拿乞，离甲板不远。我对甲板毫无印象，但是还记得曾和双亲搭汽车去拿乞拜访姑妈和大姑丈。

1928年，弟弟耀南诞生；1930年我多了一个乳名亚女的妹妹。我和弟妹三人就跟随父母度过他们经济最艰苦的几年。1933年，四弟诞生，但数月后便夭折。1934年、1936年和1938年，五弟河通、三妹丽金和六弟河津在双亲生活比较宽裕的环境下相继诞生。

我弟妹的名字可以反映我幼年时代的家境。耀南是三弟入学以后所采用的名字。入学前他的名字是应顺。顺字有两个含义。由于他出生时是顺产，父亲就寄望将会“应”在一个顺利的环境。亚女是二妹的乳名。由于父亲向官方报告的时候，尚未想出一个适当的名字，就顺口报了一个乳名，后来才替她取名润金。这个名字也有两个含义。一是因为她生在闰月，二是“润”字用来形容文人的收入，爸爸期望金钱也随着这个闰月所生的千金而来。五弟的名字河通表示父亲认为当时家境已经“通顺”了。三妹出生时，家里雇有两个佣人，父亲心情比较舒畅，就替她取名丽金，意指美丽的女孩。六弟取名河津，表示父亲认为家境已经安定，因此希望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

丙郁是我入学以后所用的名字。之前用的名字是燕恬。本来我有一个依照“华”字排的名字“煜华”，三弟名耀华等。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用这些名字。丙郁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名字。许多次，有人问我跟美国的一位著名教授何炳棣是否有关系，我回答说我的“丙”字不从火部，没有火。我久仰何炳棣教授的大名，可惜没有机缘和他会面。1990年，我们两人终于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相见。他说他担任1970年度美国学术界上声望很高的耶鲁大学休谟讲座讲师（Edward H. Hume Lecturer）时，得知我曾担任1969年度的讲师，当时也有人问他跟我是否有关系。谈话中，他知道我的先祖来自绍兴县的上虞，而他也

来自绍兴县。我们两人同姓，他的排字是“炳”，假如我用同一个排字，我们就可能有远亲关系。他问我“丙”字没有“火”字旁的原因。我回答说，由于我生在南方，“丙”字已经属火，再加上“火”字旁，火就太盛了，因此先父就替我取这个没有“火”字旁的“丙”字。何炳棣深懂命理学，很赞同我的解析。他比我年长几岁，从此我们就以宗兄相称。

说到命理学，何炳棣听过我的解析，便觉得我的父亲对于这门学问也非门外汉。其实我不知道父亲对这门学问懂得多少。虽然他没有说出方法，但他常谈及气色和面相学，并曾引述曾国藩派遣将领出兵前，必先看看他们的气色和面相然后做决定。我知道他对命理学有点儿兴趣，至于他懂不懂得批命的方法是另外一回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托香港某“子平推命”法相士替他批命。我也看过这份长达10页的大批，指他的寿命可达67岁，但多行善事可以使他寿增一纪。父亲在1957年逝世，享年63岁。假如依例加算“天”、“地”、“人”三年，也只得66岁，尚未达67岁。这份批命是否灵验，要视乎个人的解析。我没有把算命是否灵验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但后来父亲的批命书却引发我对术数做了些学术性的研究，可惜的是家中没有人保存这份文件。

文化冲击下的移民

我记得父亲曾提到《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一句“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1]，可是很少移民南洋的华人能够把孟子的这句话施诸实行，父亲也不例外。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文化、生活、习惯上都各有差异。试举一个例子，在华人的心目中，法律不外乎人情，可是外国的法律就比较不近情理，也没有“不知者无罪”这一套。打个比方，下象棋有下象棋的方法，虽然“一箭双雕”和“声东击西”等战略可能在象棋中派得上用场，但是下国际象棋（又称西洋棋）时，就不能使用“起炮在中宫”这一步棋了。我并不是要比较，只是想指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常会引起误会，而一个外来文化和一个与法律相连的主体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处下风的无疑是前者。移民南洋的华人都生活在当地主体文化并非自己固有文化的地方，很少移民对当地的主体文化有

[1] 《礼记·曲礼》有“入境以问禁，入乡以问俗”句。

所认识。父亲也不例外，他仅能够在一部分华人的圈子里活动。

当时的马来亚是英国属地，其中一小部分，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等，是英国直属殖民地。怡保所在的霹雳州是比殖民地低层次的英国保护区（British Protected Territory），由该州的苏丹（Sultan，当地俗称马来王）统治，但除却回教事务，一切政务都听从一位驻新加坡的总督派出的英国顾问（British Advisor）裁断，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势力。当地华人称政府为“皇家”，“皇”是指英帝国的皇帝（Emperor），也即是英国的国王（King）。

当时，马来亚的华人分为许多类。出生在霹雳州的人算是该州苏丹的子民，同时也是受英国保护的人，但不算是英国籍公民。仅有出生在新加坡等殖民地的人，才可以成为英国籍公民。他们比受保护的人享有更多权利。

从国籍方面来看，仅有少数是英国殖民地籍民，大部分是没有明显国籍而受英国保护的苏丹子民，还有移民马来亚的华人。这三类华人的总称为华侨。当时，中国政府对外的思想还没有开放。他们认为华侨是中国国民，可是却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在国外的权利。模糊的“双重国籍”在马来亚后来争取独立的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不再自称华侨了。

思想方面，当时马来亚的华人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和教育有很大的关联。华人之中，有受过英文教育、受过中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也有兼通双语教育的。差别最大的是只受英文教育和只受中文教育的人。我记得有一个进口英国糖果的富商，把他几个念英校的孩子送到我父亲的夜校学中文。他们常谈到“祖家”和“红毛祖家”，两者都指英国。还有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仅有中国人的姓而无中国人的名字。由于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在政府部门和洋行找工作的机会比受中文教育的人多，而且在与非华人交流时也比后者占优势，因此往往看不起受中文教育的人。相反的，受中文教育的人，则以“香蕉”比喻黄色皮肤却有白种人思想的华人。

移民南洋后，父亲一直以教学为生。我对他早期的职业没有什么印象，大概是任家庭教师，在家里教几个学生。由于生活不安定，他多次搬家，曾住过怡保市郊外的大和园和大鉴堂、红毛丹（Tanjong Rambutan）和怡保市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每次他仅有能力租一个小房间让全家居

住。我还记得我的大妹在大和园中摔倒和我在大鉴堂初次看到房里有电灯设备的事情。

有一次，父亲有事情要单独回国，便把家眷寄居在红毛丹某一农村民居。这是一间菜园屋，是用椰树叶盖顶的木屋。我记得当时正在补修马路，我陪母亲在路旁摆摊子卖东西。虽然我不记得卖的是什么，但我猜大概是水果和饮料之类的东西。当时谣传父亲在国内遇难，但是他还是平安回来了。我没有听他谈及回国的事情，我后来猜想这也许是和陈炯明的逝世有关。

我的大姑丈也迁移到怡保市附近一个名叫华林（Falim）的小镇。父亲曾带着家眷寄居他家。我在华林时首次对年份有了印象。新年即将来临，我听说当时是民国十八年，来年是民国十九年。我还记得有一天父亲给了我两文钱和一封信，让我到邮局买一张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把信放入邮箱。邮局就在附近，我付了两文钱买了两张一文钱的邮票，就贴上一张邮票把信寄出，把另一张邮票交给父亲。父亲说邮费相差的数额只好让收信人支付了。

大概在1930年，父亲迁往怡保市，换了几个地址。大概在1932年，他借顺德会馆开课授徒，我们也住在会馆里的一个房间。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焕章先生从中国来访，在孔教会做演讲，我便跟随父亲去听讲。我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演讲者的姓名，也记得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的学位。当时我认为有这样的学位是高不可攀的。

会馆附近有一间诊所，挂着一位叫孔锦德医生的名牌，写着他拥有剑桥大学内外科医学学士和文学硕士两个学位。这位医生称自己为孔子的后人。当时我还不了解剑桥大学的学位制度，认为获得医学和文学两个学位，必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医。[1]我到过他的诊所看病一次，后来还认识他一位念医科的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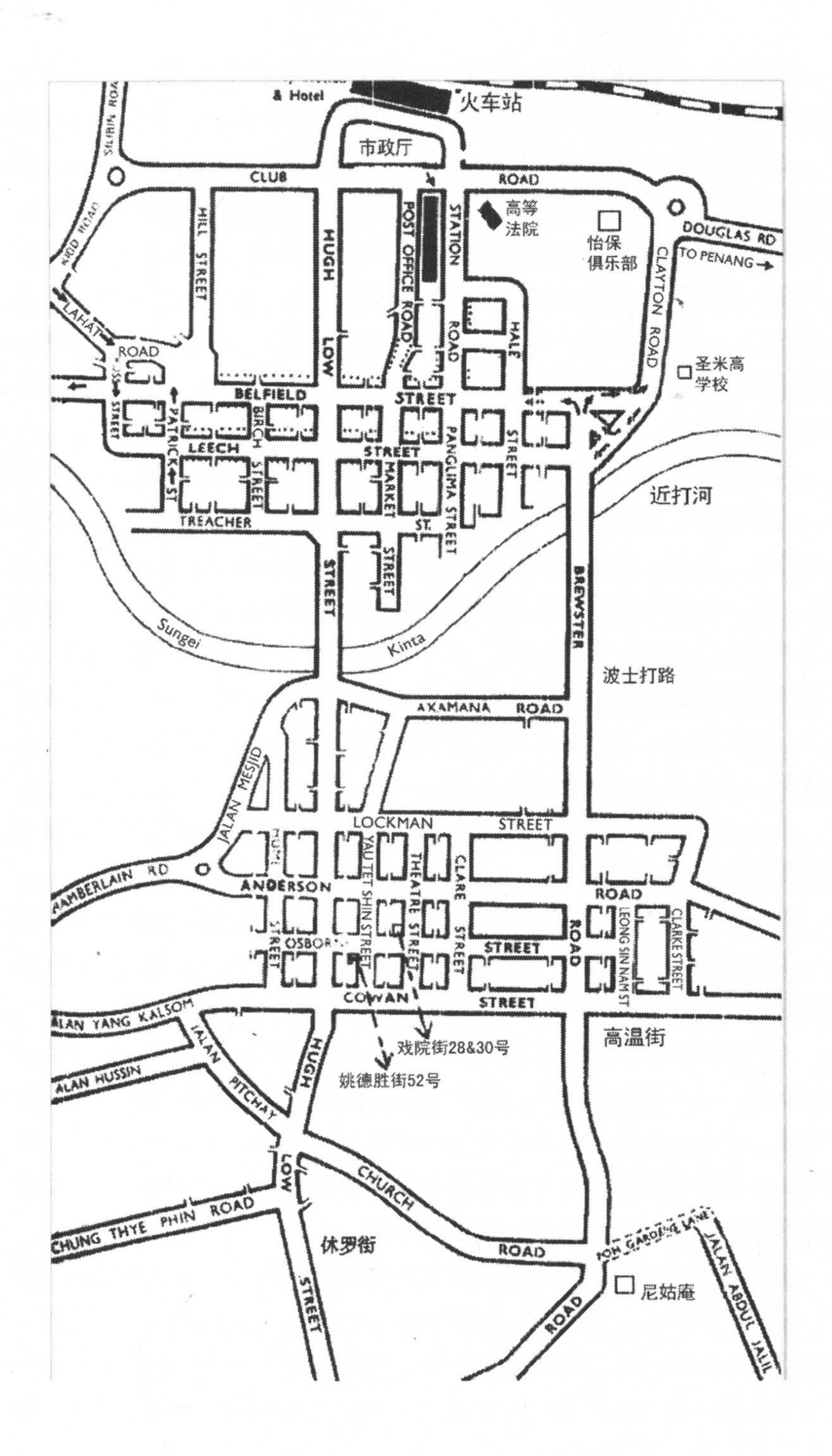
---

[1] 获取剑桥或牛津的文学硕士学位有三个不同的途径。孔锦德医生是从正常的途径获得这个学位的。大学没有开办文学硕士的课程，也不设该学位的考试。若有较好成绩而继续缴学费的大学毕业生，两三年后就可成为文学硕士。

"文学硕士"不是"Master of Arts"的正确翻译。依照欧洲中世纪英国大学教育制度，"Master"这个字的原意是"教师"。没有剑桥或牛津授予"Master of Arts"的人就不能在这两所大学正式授课。若大学需要某大学毕业生帮忙授课，必须先给予他一个"Master of Arts"的学位。这是第二个途径。

第三个途径是有关人士最不乐意接受的，也是博士候选人提呈论文后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根据考试委员判断，博士候选人可面对三种结果。一、及格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二、不及格不通过，不过可以补考；三、不及格但通过并授予"Master of Arts"，论文通过以后就不能再提呈做补考了。

以上所述仅限于"Master of Arts"这个硕士学位，剑桥和牛津的其他硕士学位不作此论。



童年时代怡保街市示意图

1933年，父亲的生活比较安定。他租了在姚德胜街52号一座两层楼的组屋作为私塾，取名“时务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学生分日夜两班。上日班的是一般入学年龄的学生；上夜班的是白天在英校念书、晚上前来补习中文的全职学生，以及白天工作、晚上来学些中文的成年人。他聘请了一位尹财稳先生作为日班学生的英文教师。日夜两班上课时，我都在一旁听讲。该年九月，父亲突然做了决定，请尹先生替我报名进英校念书。大概他深感不谙英文是他很大的绊脚石。50多年后，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曾对我说过，父亲决定送我去英校念书，是他一生中为我做的最佳选择。

1934年初，父亲把他的学校迁移到和原址相近的戏院街28号和30号。50多年后，我在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家设的一个晚宴上遇到邵逸夫爵士，就把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作为话题，谁知却引起他许多有趣的回忆。原来邵氏兄弟公司属下的一间电影戏院是和戏院街26号、28号和30号相连的。这间“京都戏院”放映的都是粤语和国语（普通话）片。早期还放映无声电影。我提起放映《小白金龙》这部影片时吸引了许多观众，他回答说，这部影片的成本很低，仅花了几千块钱，却被广大观众接受，邵氏兄弟公司也由此起家。

有一次，马师曾来到怡保，在京都戏院登台演出。他的弟弟马师元曾到我家做客拜访父亲。

我在戏院街的旧居，原来的业主是英商罗可素氏（Russell自用的译名），后来转卖给邵氏兄弟公司。该机构的产业这么多，邵逸夫爵士当然不知道他曾经是我父亲的房东。

当时替邵氏兄弟公司管理怡保产业的是一位吴湛发经理。他是父亲的好朋友。我一提起这回事，邵爵士就开始畅谈对榴莲的喜爱。他喜欢吃榴莲，也喜欢去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避暑。因此，吴经理常从怡保带榴莲上金马仑高原给他。他又说，每逢榴莲季节，戏院的票房必定下降，可见榴莲的魅力有多大。

搬到戏院街后，时务学校就有两间课室和一间小书房了。父亲聘请了一位教师教英文，自己则以粤语授徒，教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四书》、《春秋左传》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和初中国文课本等。教《三字经》的时候，父亲把“上致君，下利民”这一句改为“上辅国，下泽民”。

之后学校多了一位国语（当地后称华语）老师，父亲先后聘请了陈德坚先生和周善明女士。父亲也开始购买图书，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今学斋”。他购买了一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学生阅读的《小学生文库》，由我来看管。整套书我看了七七八八，其中一些部分还翻阅了好几遍，获益不浅。他的藏书中有一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姆生（J. A. Thomson）原著的《汉译科学大纲》，启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父亲又购置了一张乒乓球桌，让我有机会练习乒乓球。

搬入戏院街不久，我的五弟河通诞生了。之后，霹雳州教育局的华校副视学官王宓文先生来巡校视察，从此和父亲结交，来往甚密。后来，父亲也结识了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彼此也有来往。我跟他们两家都有来往。我称王先生为王伯伯，他的夫人为王伯母。他们的儿子王赓武是三弟耀南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在我的大学历程中常和他相遇，无论是在新加坡、吉隆坡、澳大利亚，或是香港。在吉隆坡的时候，他的男孩跟我的男孩是小学同班同学。王伯伯跟父亲讲话使用普通话，父亲则以官话回答。王伯母也不懂广东话，但是跟我的母亲谈得很投机。母亲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其他任何方言或语言。王伯母后来说她的广东话是从我的母亲处学来的。我称吴毓腾先生为吴先生，称他的妹妹吴君亦为吴姑姑。后来我在新加坡任职时期跟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都有来往。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和吴先生会面的时候，他看见我驾驶一部敞篷汽车，他劝我以后不要再买这类的车，这是为安全着想，不是好朋友他不会坦白说出真心话。不过幸运的是，我驾驶这辆车子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辆车牌号码SF8828的汽车就成为我一生中购买的第一辆车，也是最后一辆开篷式的汽车了。

父亲在他的“今学斋”招待访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1936年朱汝珍榜眼的来访。我向他奉茶，并站在父亲旁聆听他们两人谈话。朱榜眼亲题“教思无穷”这四个字，以赠父亲。父亲就以镜架装上这个题字挂在课室的墙上。[1]有一天，父亲一位我称为“昌伯”的好朋友冯永昌来访，看到这四个字，叹说朱榜眼的书法是尽善尽美。父亲则回答说，假如字是出于别人的手，就可说是尽善尽美，可是以榜眼的身份，朱汝珍的字体该自成一家，无须模仿古人采用科举的字体。我没有许多机会练

[1] 可惜家中没有保存朱汝珍的墨宝。

习书法，当时无法体会父亲这句话的精髓。可是我在日后的为学和处事上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几年前，我在电视看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新任总裁在中国的谈话节目。有人问他是否会跟随前任总裁的作风。他回答说，他很敬重前任的总裁，会借鉴，但是不会模仿，因为每个人必须有自己的风格(I do not copy; each person has his own style)。我又想起父亲的遗训。

我还铭记父亲教学生写文章的方法。他说，写文章和做事情一样，必要按照顺序，如盖房子，不能先在屋顶盖瓦然后竖立屋柱。几十年后，我在英国剑桥目睹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写文章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的话。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点认识，虽然还只是管中窥豹，但这一点点中国文化基础，却对我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梦想不到的影响。谁会料到一个从英文教育主流出身的物理学家后来会转变为一个中文系讲座教授，而且获得国际上的肯定，并入选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欧亚科学院等的院士，还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父亲协助一些亲属到马来亚。首先到怡保来的是曾在中国湖北省任小学教员的李荣端。她是父亲三叔母的一个姨甥女。我称这位远亲为表姑。父亲聘请她在他的学校任教，把“今学斋”的一部分改为她的卧房。继后我的外婆也举家南来。随她同来的还有我的舅父和他的一双儿女。我的舅父叫吴日暄，表弟名叫吴福润，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表妹的名字。她真是可怜，由于不能讲话，家里上下都叫她“哑女”。我称呼“奶奶婆”的外婆还带着一个年纪大概跟她差不多的近身侍婢。母亲称她为“契妈”，而我则要称她为“契婆”。外婆一家五口也住在我家。父亲聘请吴日暄舅父为国文教师。听说外婆在广州市和吉隆坡殷商李孝式的家属认识。一两年后，舅父在《中国报》寻得职位，举家迁移往吉隆坡。20多年后我才有机会再度和他们相见。

1939年欧洲战事发生后，父亲在怡保近郊的一个名叫铁船路（Tebing Tinggi）的小村里盖了一栋小房子，作为“时务分校”。分校和戏院街相隔大约三公里，父亲每天要跑去分校一次，他需要多一位教师帮助他。从1939年至珍珠港空袭的短短两年间是“时务学校”的鼎盛时期，可惜的是仅仅昙花一现罢了。

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涯

我是在怡保度过我小学和中学生涯的。1933年9月，尹财稳老师带我去他的母校报名入学，临时插编到初小第二年班（Primary Two）。当时英文学校采用的是11年学制。学童六岁入学念初小第一年班（Primary One）。经历初小第二年，就开始从当地所称“第一号位”（Standard One）至“第九号位”（Standard Nine）的九年英文教育。[1] 初小第一年班至“第五号位”的七年等于小学；“第六号位”至“第九号位”的四年大约等于初中加上一年的高中。毕业试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海外学校考试机构”（Overseas Examinations Syndicate）主办。“第八号位”所考的初中毕业试称为“Cambridge Junio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而“第九号位”所考的则称为“Cambridge Senio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所以“第八号位”通称“Junior Class”，而“第九号位”则称“Senior Class”或“Senior Cambridge Class”。[2] 从前初中毕业后就可以被招聘为低级文员，许多毕业者再学些簿记和英文速写，来担任此类的职位。后来学历的要求也提升到“第九号位”毕业证书。英文学校的制度和公立华文学校的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公立华文学校中没有官立的，多是民间社团或者是教会所办的学校。它们采用的是中国国内的学制。华文学校常设有英语课程，但英文学校很少开设国语课程。普通话当时称国语，现改称华语，而“国语”就指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

我念的是圣米高学校（St. Michael’s Institution）。这是一所天主教修士所办的学校（选择它的原因纯是基于它是尹财稳老师的母校，要靠他的人事）。当时怡保有三所著名男子英校，一所是官立的安德逊学校（Anderson School），一所是美以美耶稣教会的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另一所就是圣米高学校。父亲把三弟耀南送进安德逊学校，认为将来申请政府机关的职位时将会比较有利。二妹没有正式入学念书，仅在家中作旁听。后来我在父亲的学校开英文课时她也作旁听。父亲需要她留在家里帮助母亲处理家务。五弟河通和六弟河津都念圣米高

---

[1] 这种学制和称号已被淘汰。当时的华校也不采用它。

[2] 1940年开始，剑桥大学不再开办初中毕业考试，“Junior Class”这个称号也随着被忘记了。我赶上了参与1939年的最后一届考试。

学校，由于我当时在该校任教，方便推荐他们入学。三妹丽金则在英华女子学校念书，父亲当时的家境比较宽裕，无须留她在家里帮助家务。

我入学三个月后就参加考试，名列前茅，大部分的科目都获得满分，其余的也接近满分。学校就让我连跳越两级，升上“第三号位”(Standard Three)。而在这三个月内，我却在球场上由于无知犯过一次错误。老师把40个学生分为两组踢足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认识和参与这项活动。当我看到球走近我方的球门时我就用手接住它，以助守门员一臂之力。于是我方就因被罚点球而告败绩。此后学校就没有挑选我去参与课外的运动和一切球赛活动。也许是由于我因足球误了事，也可能负责挑选的人认为我像一个文弱书生，对球赛和田径一类的活动不会有太大贡献。我因此因祸得福，无须下午五时再回学校参与各种田径和球赛活动，得以有空闲和耀南弟在家打乒乓球和在父亲的夜校听讲。我也没有忽略运动，每天清晨我和耀南弟跟随父亲跑到精武体育馆练拳术。父亲练的是太极拳，我和弟弟练的是由一位叶书田师傅亲自传授的潭腿、功力拳、脱战拳、八卦刀等。只可惜当时年幼没有专心练习，但也许我没有练武的天赋和体质，多练也是枉然。

1934年上了“第三号位”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的视力有问题，看不清楚黑板上老师所写的字。经过检查才知道是近视，要配戴眼镜。由于在校日浅，我讲英语比不上同学们那么流利，有同学说我是一个“chinkjong Chinaman”。不过他们仅是取笑我，并没有存任何恶意。以他们的年纪，大概不会懂得“chink”和“Chinaman”两字对华人的鄙视含义。虽然如此，英文学校的华人学生用此类的文字来取笑同学，可见他们内心认为受英文教育的人比不懂英文的华人要强。当时我没有生气，我也不懂这两个字的含义，老师也不当作一回事，没有阻止同学们。过了几个月同学们也把这个绰号忘记了，也许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已经有些进步的缘故。

我遇到另外一个大问题：我在这个时期患了口吃。我猜想导致这种毛病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自卑感，因为如上文提到的，我讲英语的能力比不上同学；二是犹疑心，这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尚未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当时我对中国的历史书和英校的课本都深信不疑。虽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时我的圣经历史课本明明白白载着创世的年代是公元前4004年，与中文书所

载的古代纪年有所出入。[1] 犹豫就随着怀疑而来，而犹豫是导致口吃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这个毛病在念小学和中学的时期一直存在，但是在中学时期已经没有在小学时期这么严重。这大概和我的考试表现和日渐增强的自信心有关。

英文学校采用三个学期制，每学期末举行考试一次。我在“第三号位”的第一学期考试在40个同学之中名列24，在第二学期的考试名列18，而在第三学期的学年考试进入了前10名。1935年，我升上“第四号位”，考试成绩比上一年有些进步。我对当年学校唯一的印象是我的一位班主任老师。他不停地抽着香烟，并常在有赛马的时候跑出课室去。1936年是我小学的最后一年。主任老师聂成安先生是一位良师，也被管理学校的修士们认为是该学校的台柱，因为一方面他是一位优秀教师，另一方面他也替学校向某些富裕人家筹款。他教的是英语文法和地理。我还记得他第一次上课时所讲的勉励同学们守时的话。这一年我开始修读代数和几何，由林乾辉老师任教。他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我在这一年学到了我比较感兴趣的学科，考试成绩也有进步，每次都在前10名以内。

1937年，我开始念中学。聂成安老师也转到“第六号位”，任我们的班主任。这一年我的考试成绩也继续进步，每次总在前五名之内。这是我在学校最为得意的三年。1938年，我升上“第七号位”。主任老师是德国籍的儒帕修士（Brother Rupert）。他是我认为全校学问最好的老师，而且他在上课时也十分认真，讲课时间只讲课，讲道时间才讲道。当时非修士老师之中，没有一位念过大学，也没有一位从专科学院毕业。他们仅拿到“第九号位”的毕业证书，就一面在学校教书一面兼修师资训练班的课。一两年后通过考试就成为一名合格的“师资训练教师”（normal trained teacher）。儒帕修士具有丰富的化学知识，日军统治时期，他曾任化验工作人员，以资助他的修士同僚。我猜想他应该念过大学。但可惜得很，我念的学校当时不开设化学这门课，只让他教授英国文学、法文、地理和天主教的经典。数学则由林乾辉老师专任讲授。我在学校的表现更好了，第一、第二学期考试我都名列前茅。有一天，在上法文课的时候学到“le professeur”这个字，同学们就给我取了“professor”这个绰号，连儒帕老师也这样称呼我。从此这就成为我在校

---

[1] 后来考古学已经使创世纪年在所谓圣经历史上消失，而中国商代以前的纪年也正待考古学家的考证。

时期的绰号。其实法文的"le professeur"仅是一般学校教师和大学教授的通称。年终考试，我获得陈森麟奖学金，得以补助下一年的学费。

1939年，我念"第八号位"，聂成安老师也被调到这班当主任教师。他教的是英语文法和地理。林乾辉老师依旧教数学，他是学校当时唯一的数学教师。一位美国籍的汤姆斯修士（Brother Thomas）老师教授法文。他告诉我们，他去法国用法语讲话的时候，当地人说他讲法语就像一头西班牙母牛。这句话不会鼓励我讲法语，因为我想，既然我的老师讲得像一头西班牙母牛，充其量我的成就仅能达到讲得像一头西班牙小牛而已。他鼓励我们向美国人学习，想的事情要大（think big），做的事情务必讲求快速和效能（speed and efficiency）。1939年是欧洲大战开始的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圣约翰救护会（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的救护训练班，成为了圣约翰救护队（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的一名队员。训练班的活动没有影响我的学业；我依然保持良好的考试成绩。年终我参加由英国剑桥大学海外学校考试机构主办的最后一届初中毕业会考，成绩优秀。我再次获得陈森麟奖学金，在校最后一年的学费又有交代了。

1940年是我在圣米高学校念书的最后一年。班主任是一位修士，也是该校的副校长。他是英国人。我们早已知道这个事情，聂成安老师事前跟我们说，要学习这位副校长的英语发音，由于他的听力不好，他纯正的英语发音没有受到当地人所讲英语的影响。这位副校长教授的课是英国文学和植物学，可是他却常利用上课时间来传道，以及教导我们将来离校进入社会后的处世和为人之道。他是一位出家人，对俗世的事情的了解不同于常人。这是可以体谅的。可惜的是我不能向他多学些植物学和英国文学。有一位与副校长同名的缅甸籍修士老师负责教英帝国历史。在他最后一节的历史课上他写了五个历史题目在黑板上，嘱咐我们留意这五道题。果然在会考的历史试题中有四题类似他所提出的那五道题。当时有些人会根据以往10年所出的试题预测该年剑桥大学海外考试机构将出的试题。会考须答的五道历史试题中有四题让我的历史老师猜中，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地理和数学还是由聂成安和林乾辉两位老师分别教授。年终我应考剑桥大学海外学校考试机构主办的"Cambridge Senio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毕业试，获得优秀成绩。这样我在圣米高学校的学业便圆满完成了。

回顾我在圣米高学校的就学时期，我跟老师和同学们长期保护良好的关系。老师们都对我不错，尤其是上述提及的几位老师，后来也成为我亦师亦友的伙伴。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同学们的校外活动。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书呆子，并不见怪。毕业后跟我保持联系的同学有好几位。一位是在新加坡行医的李金辉，后来成为我内人的姐夫。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职的时期，我的同学谢鸿德是该校的副财务主任。另一位同学曾经跟我一起在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会议厅里参与会议；他是代表宗教团体的天主教 Bishop Anthony Yong。有一位同学陈国书是汪精卫的内侄儿；陈璧君是他父亲陈继祖律师的姐姐。由于我们所念的是英文学校，尤其是一所教会主办的学校，这些关系对他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虽然中日战争广受当地华人的关注，但仅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则比较不关心此事。当时收音机尚未普及，更不用说还未发明的电视机，大众传媒多依赖报章。不看中文报章的人们也不会知道关于中国的更多事情。由于我略懂中文，能阅读中文报章，我可以留意到没有被英文学校同学们关注的事情。我知道华校教师喜欢阅读巴金的《家》、《春》、《秋》三部书，还等待着一本《群》的出版。我看过徐悲鸿和刘海粟两位大师的画展，为了抗日筹款他们分别到南洋义卖他们的作品。我也去听过“武汉合唱团”来怡保的义唱会。团员们所唱的歌使人难忘。

毕业后我跟几位同学时有交往，常谈及如何进修和就业的事情。有时我会回到母校看我的旧同班同学。虽然已经毕业，他们有的还留在学校希望再次参加剑桥海外中学毕业试，以期获取比上次更优秀的成绩。由于欧洲战事紧急，我也要参与圣约翰救护队的操练，队员多是我的同学。后来我在新加坡工作，也遇到三几位老同学。他们当中我来往得最密切的是李金辉。我在吉隆坡任职时，旧同学谢鸿德成为我的大学同事。2001 年我回怡保演讲，与隔别 60 年的四位同学重逢。他们是黄耀宗、黄汉忠、刘耀明和杨建德。会谈中得知我们的同学们十之八九都已经辞世了。这时我们都已过古稀的年龄，刘耀明告诉我他已经 80 了；这次相逢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杨建德是一位留英的律师，他的一位千金是电影界著名影星杨紫琼。他说她刚去香港，所以未能带她来跟我会面。讲话中我谈及后汉时代的杨震，从他家里挂起的“四知堂”三个字的匾牌，我问他是否与杨震有关连。他回答说是他的先祖。真想不到，在小小的怡保城市里，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竟然有几位与一些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的渊源颇深。

回顾我的学校生活，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愉快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好，我的毕业考试成绩也很圆满，且后来因此获得奖学金往新加坡升学。可是学校的环境较为闭塞，这使得我的视野如井底之蛙，比较狭窄。老师们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和其他学校的人们交往，更不必说天主教以外的宗教人士了。当时我的学校并不重视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它开办的主要目的是传教。怡保的其他两所英文男校拥有比圣米高学校更优秀的师资，而比较积极帮助学生升学。例如，它们设有科学、化学、高级数学等学科。我在学校所学的只可以说是初等数学。幸亏我父亲夜校的学生都是来自其他两所英校，我才有机会和他们交谈。通过我父亲的学校我也和一些华校的教师有来往。如此我就得以知道多一点学校圈子外的事情了。战后圣米高学校在师资和毕业生升学两方面也改善了。学科开设了多种科学项目，“第九号位”年班以外还设立两年的“高等学校证书班”（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考试依然由剑桥大学海外学校考试机构主办。学校也聘请拥有大学学士学位资历的教师，还请了一位有硕士学位的杨文芳数学教师。1971 年，我在吉隆坡曾任与圣米高学校同一修士学校系统的圣约翰中学（St. John's Institution）的理事，查得该校每 10 位教师之中有四人曾经受过大学教育。

升学的问题

我在圣米高学校毕业后，父亲就托他的一个朋友替我在一间本地的小银行找份职位。事先也没有征询我的同意。这个事情没有下文，后来我听说那份职位的月薪仅有 30 元。我就留下在父亲的学校当英文教师，上午在铁船路的分校，下午在戏院街的本校任教。依照当地的法规，学校教员都需一份登录证书。我被登录为一个“未受训练的教师”（Untrained Teacher），证书签有王宓文先生的名字。我在父亲的学校教书从来不支月薪，零用钱仅靠晚间做家庭教师所获的一点收入。此后父亲就没有再为我的工作操心了。父亲也曾替三弟耀南的就业做打算。他有一个姓钟的钟表行业的朋友，就预先托他将来聘任三弟为店员。他的苦心也白费了，后来三弟所任的是马来西亚政府财政部的保险副总监。父亲这样替我两兄弟费神，但是他的这种比较封建的思想是不太适应时

代发展的。从父亲的观点，他仅是在尽做父亲的责任。在他的苦心都白费后他也没有再替他的子女在这方面费神了。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教训，因此我就在教育和就业上从来不向子女施予任何压力。

我知道不可以让在父亲学校任教的状况长久继续下去。我一心要继续深造，但面临许多难题。父亲没有能力提供我的升学费用，唯一方法是申请奖学金。我等待一个机会，向香港大学申请一项陆佑奖学金，或者向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申请当地政府的奖学金。我对学科的选择没有成见。假如得以进入香港大学，我希望念工科；假如是莱佛士学院我则选理科，但也不排除文科。本来我在圣约翰救护会的笔试中曾获得满分，引起我对医科的兴趣。但是念医科比理科和文科要多费一倍时间，我不能让父母等待太久；他们有经济上的压力，我必得负起责任，相助一臂之力。

当年香港大学没有发出邀请学子申请陆佑奖学金的告示。后来我才知道这项奖学金不是每年都有空额。1966年，我曾代表马来亚大学校长，任陆佑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以遴选得奖者，可是该年的奖学金也没有空额，因此不必开会。话转回头，我在报章上看到莱佛士学院招生的告示。那时的手续是先得学院录取，然后再向当局申请奖学金。申请入学要先获得两位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推荐。刚巧伍连德博士的弟弟伍德安先生有一个儿子伍长福在父亲的夜校念书。伍德安先生领我去见他的哥哥；伍连德博士答应做我的推荐人。另外一位推荐人是郑连瑞医生。但是我很快收到回信说，我尚未到16岁，学院无法接受我的入学申请。我只得耐心等待下一年再向该学院提出申请。同时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利用这个时期在一间英国的函授学校念了一些实用数学。所学的微积分数学对我日后的学业有不少帮助。

1940年12月，太平洋战事开始。战争终于扩展到马来亚半岛，我的升学计划也被迫暂时搁下。我参与的圣约翰救护队被编入保卫团的“辅助医疗队”（Medical Auxiliary Service），该队所管地区包括整个怡保市，总部设在怡保市政厅大楼（Ipoh Town Hall）。辅助医疗队分两班轮流当值。怡保数次受空袭，也许由于大型建筑物不多，日机投下的只是小型炸弹。巧合得很，每次空袭都是在我不当值的时间发生，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受伤者，连一滴血也没有看到过。战后我去领受一枚英王乔治六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卫纪念徽章”（The Defence Medal），

深感受之有愧，只好收藏它留作纪念。一天早上，我去总部报到，发现岗位空无一人。后来才获知，上一班的队员临危奉命，已向新加坡撤退。我是属于来不及通知的下一班队员，只得听天由命，留在怡保郊外的铁船路小村，等候日本军的入城了。

日本军政统治下的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两三个星期后，日军很平静地进入怡保，连枪声也很少听到，听说英军已经退守怡保以南大约一百公里的士林河（Slim River）。日军的先头部队是一些骑自行车的士兵，这些交通工具多是就地取材，来自当地居民。大概是由于占领怡保没有遇到抵抗，日军没有展开"大屠杀"的行动，仅不时有些小规模的所谓"肃清"活动。怡保可以说是比某些地方幸运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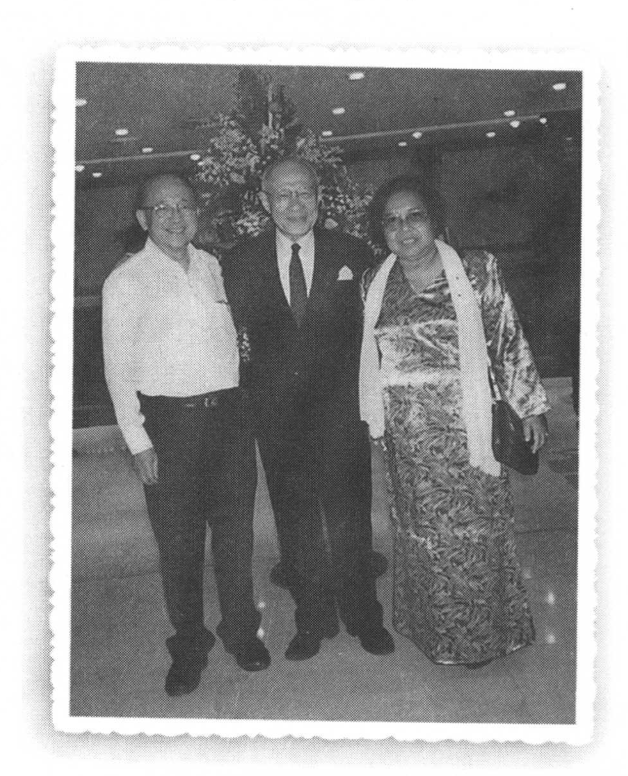
战争爆发的开始，父亲说："大难入村，小难入城"，于是举家从戏院街搬往铁船路的分校。铁船路没有受到空袭，从家里可以听到怡保被空袭时的炸弹爆炸声。王宓文先生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王赓武曾在我的铁船路家避难，住过一段时期。王伯伯每天练字，写的是篆书体；他监督王赓武练写颜真卿的字体。受他们的影响，我也陪着练字，练写松雪道人赵子昂的字体。这个字体是父亲替我选择的。[1] 王赓武和我的三弟耀南刚在安德逊英校念过"第六号位"（初中一年级）。我替他们两人补习一点代数，以备将来他们的英校复课。铁船路的家很简陋，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也没有抽水马桶。外面的局势稍为安定后，王伯伯等三人搬出我的铁船路家，寄居到一位矿商钟森先生家。

没有多久，马来亚的统治由军队移交到一个"军政监部"的手中，由被称为"陆军司政官"的文官处理地方行政。"陆军司政官"上有"陆军司政长官"，下有"军属"。霹雳州由一个有"陆军司政长官"官衔而称为"州长官"的知事管辖，行政机构设在我的圣米高母校，称为"霹雳州政厅"。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伴野知志郎的教育课长。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记得他好像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或是美国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毕业的。他下令全体教师，包括英校、华校、马来学校和印度文学校的教师，都要受三个月的日语训练，然后才可以执

[1] 由于生活在非中国文化的主体文化环境中，我没有学得赵体，后来王赓武所写的字也不见得像颜体。

教。他使用天主教女修士所设立的女校Ipoh Convent School作为“霹雳州日本语教员养成所”的校舍。[1] 三个月的课程称为“速成班”，接着还有六个月课程的“专修班”。1943年，我参加第一届的“专修班”。伴野亲自教日语文法，课本采用他本人所编的《日本语口语文法》一书。我有些中文根底，有利于学日文的文字。我在学校念书时，对数学和文法特感兴趣。因此我比其他同学有更好的学日语优势。伴野担任教育课长兼教员养成所的所长。我在该所念书的第四个月，该所从日本调来一个陆军司政官阶级的新教育课长，而伴野就转任为霹雳州宣传课长。新任教育课长兼教员养成所所长是胜吕弘。他本来是在一所商科学院任教授，战后他获商科博士学位，曾在明治大学和神户大学等任经营学教授。他对伴野的文法书毫无兴趣，在教员养成所授课时他采用的教材是来自日本小学生一二年级的课本。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现在回想此事会觉得有点可笑。我的同学们都变成日本的小学生，而堂堂一位日本教授要来当一个小学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恐怕没有一个日本人比我们更“幸运”，念小学时就有一个大学教授的老师。全班毕业生由教育课长分配职务。毕业考试我名列前茅，被任命为教育课书记（文书）兼日本语教员养成所助手。我的书记任务是录写日文文件和翻译。其他毕业同学被分派去霹雳州内各学校当日语教员，其中有几个留在教员养成所当助手。日本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职有教授、副教授、助教和助手之分，助手是最低层次的职位，还未列入正式教师系统。

虽然我在教员养成所任职仅有半年，我对社会的认识却增加不少，结交朋友的范围也变得更广。在教育方面，我对华校、马来文学校和印度文学校都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时在教员养成所一共有八名助手，林乾辉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作者（左）与槟城州长官敦哈姆丹和夫人

[1] 当地华人俗称它为“尼姑庵”。

是我的同事。八名助手大部分是马来人，也有两名是印度人。马来人助手中许多后来在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任要职，我后来在吉隆坡的大学任职时多次遇到他们，其中有些成为了我的知己良友，例如，哈姆丹（Hamdan）和莫哈尔王子（Raja Mohar bin Raja Badiozaman）。

来上日语课的有许多不同种族和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我帮助他们学习日语。例如，我担任聂成安老师的导师，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了解。我还跟不同学校的教师结交，开拓了我的视野。

不久教员养成所来了一小批教官。他们都是在日本小学执教的教师，而不是军人。他们都很用心教书，并且和不少学员建立了友情。几个月后又来了一个新教育课长兼教员养成所所长。胜吕弘所长则被调往当时被日军改名为昭南岛的新加坡，升任为军政监部的文教科长。他为人正直，处事严谨，有中国儒者的风度。他每天必写日记，日本投降后日本人都烧毁他们的日记以免被牵连。唯独他带着他的日记回国。后来我看过其中一条记载，谈及他在太平市亲眼看到宪兵处死三名抗日军人员。受刑者面不改色最后在行刑前用日语大呼“共产党万岁”，使他惊讶不已。他的日记没有记载他所惊讶的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是抗日军从容就义的态度和抗日军中竟然有人懂日语吧。新任霹雳州教育课长兼教员养成所所长的是东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出身的小寺三郎。他讲得一口流利英语，脸色和肤色带红，举止谈吐也不像一般的日本人。一个从前在安顺（Telok Anson）的圣安屯尼（St.Anthony）英文学校任英文教师的印度人助手说，他是一位“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an）。无独有偶，40年后他在日本濑内海边鹫山附近购买摄影胶卷，贩卖胶卷的日本妇女说，他讲得一口好日语，问他来自何方。他带着微笑回答说，他是本土人。有谁知道他的建筑公司曾经参与建筑从那个地点可以望见跨越本州和四国岛的濑内海大桥？话转回头，他上任不久就派出教员养成所的日本教官到霹雳州各地服务，他要求他们出外公干时不要佩带军刀，说他们所执行的是和平的任务，与军队的行动毫无关系。当时很多日本人常常被躲在森林里的抗日军杀死，可是教员养成所的教官皆安然无恙。日本军方也注意到这个事情，怀疑小寺三郎是否曾和抗日军订立某些协定，可是找不出任何证据，于是交给霹雳州长官川村直冈处理。川村长官就把他迁移到自己的长官官邸，和他一起居住，说是要亲自监视他，其实是利用他来当自己的翻译官。这是小寺三郎后来亲口告诉我的事情。当然我

不便问他是否曾经和抗日军有联系，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我认识的教员养成所女毕业同学后来参加抗日军。在校时期她和日本教官之间的感情还不错，后来虽然是和日军敌对，我猜想她对教员养成所的教官们不会心存恶意。抗日军可能从许多管道获知参与战争的日本人和其他人员的分别。他们所要对付的是日本军人和军警以及和他们勾结的人。日本投降后，小寺三郎曾任英军和日本俘虏之间的翻译员。

由于小寺三郎本人精通英语，教育课就不再需要我来当翻译。我被调往行政课任号称书记的文书职，录写和翻译文件以及当行政课长和本地官民会面时的翻译员。有时我也被州长官借用，做他的翻译员。这样一来，重要的事情就由小寺三郎当长官的翻译员，小事情则由我来充数。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进入怡保的时候，盘克夏中队（Berkshire Yeomanry）的士兵到我家找我，说是霹雳州苏丹建议的，要我当翻译员，替英军向日本降兵传达命令。

在行政课任职的时期，我认识了几乎整个霹雳州的重要马来人高官和其他本地人物。他们从王族到县官都对我有好感，大概由于我替他们做翻译时的表现令人满意吧。日治时代霹雳州的“马来王”是亚兹苏丹（Sultan Abdul Aziz）。有一次我陪同御驾访问霹雳州北部，替他翻译他对村民的训话，让日本官方认识他所讲的都是和人民和睦相处有关的话题。他也曾邀我到他的王宫共进午餐。霹雳州有它的特殊传位制度，预先选定依次排列的三位未来继承人。首位未来继承人 Raja Muda 尤素夫王子（Raja Yusof）对我尤其友善，称我为他的年轻朋友。战争终止不久，他就继亚兹苏丹登位，成为尤素夫苏丹（Sultan Sir Yusof Izzudin Shah）。我在新加坡念书时期，有一次乘搭火车从新加坡回怡保，途中遇到他乘搭同一列火车。他看到我就邀我进他的车厢跟他一起用午餐。1949年，在马来亚大学创立典礼中，他介绍我认识彭亨州的苏丹，这两位苏丹有亲戚关系。他的一位儿子是现任的霹雳州苏丹亚斯兰（Sultan Azlan Shah），还曾一度任马来西亚的元首。

行政课和县官们有直接关系，重要事情必得经过行政课长的裁定。我就成为他们的媒介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战争末期，日本官方怀疑两个县官和英军的降落伞兵有联系，但没有获得证据，就把他们两人调来行政课服务，减少他们通敌的机会。其中一位是天定（Dingdings）县官巴哈曼（Bahaman）。我常和他一起进午餐。另外一位是以前的马来义勇

军中尉沙里（Captain Salleh）。他跟我的感情也很好。巴哈曼对我说将来要避免做两件事情。第一是驾机车，由于它的高度危险性。第二是任学校教员，由于习以为常，学校教员往往不知不觉间就以对待学生的心理或态度来对待朋友，在与人交往上存有问题。我接纳他第一个忠告，以后一生从来不驾机车，我解析他第二个忠告不是劝我不要当学校教师，而是劝我当教师要留意与朋友交往的时候千万不可好为人师。20年后我在吉隆坡任职时，他任马来亚大学的理事，同时也任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长。我的人缘相当不错。因此在战后我在人事方面可说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战后的生活

1945年，美军在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原子弹，日本向盟军投降。怡保市民的生活渐渐复原。日本占领期间，为着生活开支父亲卖掉铁船路的房子，而迁移往离开怡保80多公里的太平市，留下我和三弟耀南在怡保。他还将戏院街30号租给一个杂货店，做了二房东。战后他企图恢复“时务学校”的原貌。他得到业主和教育局的支持，便向法院申请要杂货店主搬迁，让他的学校复课。看来是合乎情理，可是他不知道怡保市政局曾立下一条法例，防止业主或二房东向房客加租钱或逼迁。后来因为这个条例，业主不能维修市内的物业，只能在郊外建立新建筑物。60年后我回去再看，戏院街28和30号依然存在，可是残旧不堪，隔邻的京都戏院早已受回禄之灾变成废墟。当时父亲只得利用戏院街28号开课，直到1957年他去世的前夕。他再没有能力聘请英文教师和普通话教师了。

我母校的校长找我说，圣米高学校准备复校，给我教员一职。几个月内我做了好几班的临时班主任，从“第二号位”至“第七号位”我都教过。校方还要我主持校外中文课程。上课须用普通话。可是我家里所讲的是广东话，我以前没有说过半句普通话，仅有听说普通话的一点经验，来源是听王宓文伯伯的讲话，看国语电影片和唱国语歌。我于是去找我的李荣端表姑，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上课前我把课本的每个字都加上注音符号，预先练读多次，然后上课。五弟河通进入圣米高学校念书，我做他的推荐人。他上我“第二号位”的课。我也是六弟河津和表弟钱维显的入学推荐人。一天早上我一手牵着河津一手牵着维显走路去学校替他们报名入学。路上遇到伍连德博士。他看到我手牵手带着他们两人，

于是问我是否有两个这么大的孩子，我就得跟他说明原委。我教“第七号位”的时候，伍连德博士的两位公子——长生和长员也在该年级念书。我常参与同学的课外体育活动，有时和长生、长员两兄弟打羽毛球。我跟聂成安老师和林乾辉老师的关系也变成亦师亦友。几位旧同班同学也在同一学校执教，我不会感到寂寞。我在学校的薪酬大部分都交给父母作为家用。

新加坡的高等学府

我没有忘记继续深造的问题，一直在等待申请香港大学陆佑奖学金的机会。当时我是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骑着自行车就闯入尤素夫苏丹的行宫拜访他，还告诉他我的升学愿望。他的王妃对我说，他会尽力向香港大学推荐我的。可是香港方面没有陆佑奖学金招人申请的消息传来。1946年的上半年，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宣告10月复课，招收新生。我就向该学院申请入学和奖学金。伍连德博士是我两个推荐人之一。这次我不需麻烦他的弟弟带着我去找他了。另一位推荐人是谢锦聆太平局绅，是我一个学生的家长。不久就收到学院的回信，说我被录取了，并获得“马来亚邦联奖学金”（Malayan Union Scholarship）。这次奖学金的分配是根据1940年和1941年度剑桥大学海外中学考试机构的考试成绩排名而审定的。学院当局已有一份名单，据此挑选成绩最高的几名。我听说我的名字也列入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的名单里。但我的家境不容我存有学医的念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鉴于世界政治局面的改变，英国政府就在马来亚半岛成立了一个马来亚邦联。以前在霹雳州出生的华人如果没有一个明文确定的国籍，在申请政府部门的职位、政府的奖学金、出国护照等各方面都会遇上问题。1946年初我申请为马来亚邦联公民，马上获得批准。在我的公民证书上签名的行政官欧斯曼（Osman bin Talib）是我以前在行政课服务时期所认识的一位马来人县官。非马来亚邦联公民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奖学金。我的运气还算不错。1947年，在马来民族反对之下，英国政府把马来亚邦联改为马来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a）。奖学金也改称“马来亚联邦奖学金”（Federation of Malaya Scholarship）了。

我的人缘也不错。当我告诉聂成安老师我已经获得奖学金和我的家

境，他立刻说，假如我有经济上的困难我可以写信告知他。我也向伍连德博士报告我获得奖学金的喜讯，但是没有跟他谈及我的家境。他竟然主动对我说，假如我有需要他乐意给我经济上的支援。我的一位朋友郭亚来是怡保英华学校的校友。他告诉我他以前在莱佛士学院念书时的遭遇，因为多费时间在小提琴上，他没有考上毕业试。我知道他的才能，后来他考上英国伦敦大学的校外高级学士学位毕业试。他的经历给我一个大警惕。我很感激他对我说真心话，不是知己不会为朋友而将自己失意的事情说出来。我本来在学校念书时也曾练小提琴。有一个下午我在学校打排球，摔倒在场边一堆沙土上，伤了左臂骨。从此我不能再练习小提琴了。

我在莱佛士学院就学的三年期间仅向聂成安老师借了160元来购买课本。毕业后我用第一个月的薪酬清还我的借款。我没有惊动伍连德博士向他借款。本来他们两位都没有讲“借”，而仅是说“提供”这两个字。我对聂成安老师比较熟识，向他还钱的时候比较好讲话。因此我没有去麻烦伍连德博士，但心里对他同样充满感激。

大专生活

1946年10月，我离家前往新加坡入读莱佛士学院。这是当时全地区两个最高学府之一，1917年建立。另外一个也在新加坡，建立于1905年，名叫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前者开设文理两科；后者有医科、牙科和医药科。在保护政策下，当地人认为假如要拥有更高而受政府承认的学历，就非到英国或某些类似澳大利亚的英帝国属地留学不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只能得到与这两个学院毕业生相同的待遇。两学院所发的毕业证书称“文凭”（Diploma），而不是学位。本来根据英国的教育制度，一般来说“文凭”稍低于学位，但也有些是例外。

我以前阅读过的《汉译科学大纲》曾引起我对科学的兴趣，而且我从某些中国大学毕业朋友的口中听到一句“学过数理化可以走遍天下”的话。我就选择了理科。这时的理学院只有数学、物理、化学和地理四个学系，其中的数学和地理是跨越文理两学院的学系。数学系有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两科。其他的学系仅设一门学科。理学院一共设有五个学科。学生在第一年必得选读四个学科，而在第二和第三年选读其中的三个学科。我第一年所选读的是纯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和化学四科。全校

学生人数不多，大约是200人，理科学生人数比文科的少，一年级理科同学仅有二三十人。医学院的第一年级同学也到莱佛士学院报到，与该学院的学生一齐上化学和物理学的课。第一年我念得十分吃力。图书馆缺少参考书，课本也难买到。我的化学课本要从澳大利亚订购，在考试两个星期前才到手。我在学校的数学和科学的根基比班上许多同学薄弱，我必须迎头赶上。1947年学年考试，大约半数的同学没有通过，我是一个幸运者。

许多不能通过考试的同学就被逼离校，少部分获准留班，有机会补考一次。同学们称这种考试方法为“屠杀”（slaughtering）。我后来发觉那个时代香港大学的学生也有同样的遭遇，每次考试都有大约半数不能通过。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现象已不再存在。我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了一些思考。以前我听说这是基于不同改考卷的方法，或出试题的目的是试探应试者知道所应知道的程度，抑或探寻应试者所不知的事情。我猜想后者仅会偶然出现，不是常见的现象。学生考试不合格基本缘于下列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原因：①学生懒惰；②学生资质差；③学生缺乏基础训练；④老师懒惰；⑤老师学历差；⑥社会环境的转变。此外还有一个无法衡量和不好讲的因素。考试有时还要靠运气。我以前的历史老师猜中会考试题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大学物理系任职的时期，有一次物理系教授亲自批阅第一年医学院学生们的物理科考卷。阅后他把考卷交给我纪录分数。我留意只相差几分及格的考卷，试图看是否可以补救。我发现有一道试题漏改了，便向教授指出，结果有关的试卷及格，避免了一场无心的和无人知晓的冤枉事情发生。

在上述六个因素之中，①我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很努力念书，虽然也有少数例外的。②同学们以前都是中学的高材生，而且是从全马来亚剑桥会考成绩最优秀学子中选拔出来的，素质上不该有问题。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同学们在学校的基本学业训练差了一大段，不用说大学预科，我可以说我在学校所学的数学尚未达到高三的程度。有些同学比我好些，但也没有念过大学预科。后来马来亚的英文学校增设“第九号位”班后再上的两年“高等学校证书班”（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考试依然由剑桥大学海外学校考试机构主办。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④懒惰的老师总是占极少数，而且这不限于某一高等学府，不可只针对新加坡和香港的高等学府，把学生考试的高失败率归罪于他们。老师懒惰不

能算是一个大因素。⑤至于老师的学历问题，当时新加坡和香港大专老师的学历一般来说，是和英国的老师有一段距离。其中也有些例外。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从提出博士论文经过答辩口试而得来的“哲学博士”（Ph. D. 或 D. Phil.）学位。这里所用的英文“Philosophy”的含义比中文的哲学这个名词的含义更广泛，包含一切学问，不仅“哲学”这么简单，不易准确翻译为中文或日文，也许因此中国和日本的大学没有采用这个称号。近来有些日本大学索性称“博士”，省略“哲学”这两个字。“哲学博士”是英美大学系统中各学院通用的博士称号。“哲学博士”之上有各学院独自授予的高级博士（Higher Doctorate），例如，文学博士、理学博士、医学博士等。[1] 许多英国的大学教授有高级博士学位，而且不少是英国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或文学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20世纪40年代，博士学位在东南亚地区还未多见，香港和新加坡高等学府的教师中拥有哲学博士学历的多是教授，还有一些教授仅有硕士学位的学历。例外是有的，有些少数讲师有哲学博士学位。高级博士学位则甚为罕有，有如凤毛麟角。我入学的时候，全莱佛士学院仅有一位具有高级博士学历的老师，即牛津大学理学博士奥本涵（Alexander Oppenheim）数学教授。黄丽松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也记载了50年代初期在该地区拥有高级博士学位的学者极为罕见。[2] 老师的资历对学生的成就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还是要看学生的基础。⑥外来因素也对学生考试有影响。当时的高等学府和现在的高等学府有很大差异，不必考虑学生人数，不需考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没有竞争者向政府申请争取经费，社会人士表达要求也比较少。当时毕业生供不应求，可是大学当局没有十分在意这些事情，认为那都是属于政府政策的范围。当时同学们误认为校方暗中有一个考试及格定额（quota）制度，预先规定考试及格人数。我后来在大学任职并没有遇上这种事，学生考试及格率也比以前高。可是当时所说的定额制度对同学们有一定的影响，恐惧别人的考试成绩比自己好，而影响自己的考试成绩，这种心态绝非一个推动同学们互相切磋的积极因素，反而会引致同学们互相猜疑。

我上第二年级只可以念三门学科，要放弃以前的一门学科。我上化

[1] 伍连德博士称他的医学博士为“大博士”，称哲学博士为“小博士”。他本人是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
[2] 参阅 Rayson Huang(2000)，*A Lifetime in Academia*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64。

学课的时候，学院还未聘得一位化学教授，只是由一名政府化验师代讲。他的神态很像一个教授，一时声大一时声小低着头念他的讲义，有时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后来才发现他的讲义都是从书本上抄来的，听不听得见他所讲的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我放弃化学这门学科的原因。我就选读纯数学、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三科。第二年级算是比较轻松的一年。学生会选我出任乒乓球队队长。理学院的同学们有一个“理化学会”（Chemical and Physical Society）的组织，打算在理学院举行一个科学展览，我被推为该展览的主持人。展览引来许多观众，获得物理学系主任亚历山大（Norman Alexander）教授的好评。该年伍连德博士莅临理学院做了一次讲演。林文庆医生也来听讲。伍连德的前妻黄淑琼是林文庆夫人的妹妹，而伍林两位都是获取皇后奖学金而赴英国留学的著名人士。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在新加坡德高望重。伍连德博士介绍我认识他。当时他已达80高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

通过考试后我就升上第三年级。我连任乒乓球队队长，在校内西洋棋比赛中获得冠军，并成为奥本涵银盾（Oppenheim Shield）的得主。我在学院主持了一个比上一年规模更大的科学展览，博得广大观众以及老师们的赞许，尤其是亚历山大教授。在展览时期我也认识了一些工商界的人物。有些是来物色未来的理科毕业生而向我查询，并托我替他们留意。学生组织的理化学会每年都主办一次由会员主讲的公开演讲。这次会长找上门邀我做主讲。我讲的题目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亚历山大和奥本涵两位教授和普莱斯博士（Dr. Derek J. Price）都出席听讲。我在学时的老师之中仅有他们三位是博士。普莱斯博士是我的应用数学老师，后来任美国耶鲁大学科学与医学史教授，李约瑟博士的好朋友。奥本涵教授曾召集我和同学汤寿柏两人到他的研究室，传授我们超出课程外的同次几何（homogeneous geometry）数学。

当时我认为我的学业快要结束，毕业后我就要找份工作。但我还没有决定从事哪一门行业。我知道我的母校欢迎我随时回去当教师，但是我也知道政府有些部门和工商界正在招理科毕业生，况且我们将是战争结束以后第一届毕业生，竞争上可占优势。就在这个时期，政府计划建立大学，将莱佛士学院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合并为马来亚大学，校址仍在两学院原址。大学文理学院采用三年学制，三年后毕业生可获文科或理科的普通学士学位（B. A. Pass Degree 或 B. Sc. Pass Degree）。

大学承认莱佛士学院的毕业文凭与普通学士学位相等。普通学士学位考试成绩优秀者可被录取再念为期一年、专修一学科的高等学士学位，号称荣誉学士（Bachelor Degree with Honours，简称 Honours Degree）。我的毕业考试完毕后，在成绩尚未出榜前我在物理实验室遇见亚历山大教授。他问我是否有意回校念高等学士学位，专修物理学。我立刻答应他，他也已经暗示我的考试成绩意料不会太差。我选物理学可说是一个巧合。我常去物理实验室，而亚历山大教授也常在实验室出现。数学系没有实验室，无事不登三宝殿，因此无事也不去奥本涵教授的研究室，见他的机会比较少，而且我在两者之间很难选，多亏亚历山大教授替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考过毕业试后我就依例回怡保探亲。学校每学年分三学期；每学期有 10 个星期。一年有 22 个星期的假期；第一和第二学期后的假期大约各为一个月；第三学期后是学年终的假期，为期约三个月。政府奖学金同学可以免费乘搭火车回家。我回家除了探亲和温习功课，还和几位朋友保持联系。我记得有一次王宓文伯伯来访谈及王赓武在南京念大学的事情。当时正是徐州大会战的时候，他很担心儿子的安危。父亲说："兵家势败如山倒"，建议王赓武赶快回家。我常到聂成安老师和伍连德博士家访问。许多次他们都留我在家吃饭。聂成安老师要我替他的长女补习数学。伍连德博士替我看病不收诊金和药费。他还鼓励我多写作。

这次我回怡保，我的母校立刻聘请我为任期三个月的临时教师。住在怡保莱佛士学院和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的毕业同学和在校的同学们联合组织了一个舞会替快要建校的马来亚大学筹款。我被推举为怡保马来亚大学基金舞会小组的主席。义务秘书是林可然医生的二千金林丽清，也是我的理科同班同学。义务财政是医学院的王清辉。几个组员之中还有伍连德博士的长女伍玉玲，她念的是文学院。我们请到霹雳州的尤素夫苏丹、州务大臣、英国顾问官、"中华民国总领事"马天英和他的千金等莅临舞会。舞会筹得款项超过一万元，打破了以前一切类似的筹款活动的纪录。我们马上将款汇到新加坡。管理筹备马来亚大学捐款的临时秘书是亚历山大教授的夫人伊丽莎白博士（Dr. Elizabeth Alexander）。她是一位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丈夫常协助她在新加坡做实地测验，检测当地的地质情况。我曾参与一次他们的实地测验。她对我们同学的筹款成果大为赞许。

回想我们那次的筹款活动，成绩虽然可以说满意，但是也让我认识到一般华人社会人士对英文教育和中文教育的心态。马来亚大学前身的两所学院曾获得当地政府、工商业机构和富商的资援。华人富商中包括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黄仲涵、余东璇和陆佑。他们是该时期的富豪。莱佛士学院的大礼堂命名为黄仲涵礼堂，我在该学院所住的宿舍叫余东璇楼。可见他们在赞助人中的地位。可是也有一大部分华人对英文教育并不太热心。我替马来亚大学筹款的时候曾有人对我说，你的大学要钱就应该向祖家要。这表示在一些华人心目中，马来亚大学的经费应该由英国负责。马来亚大学建立不久，陈六使在新加坡筹办南洋大学。那是为华校毕业生而设的。连三轮车和黄包车的车夫也响应南洋大学的筹款义举。这充分显示了在华人心目中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的不同地位。

替马来亚大学筹款是我以莱佛士学院名义所做的最后一次活动。回想我在该学院的经历，同学们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失去四五年的就学时间，感到惋惜，而且还需要在“屠杀”式的考试里寻求生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虽然我们比平常的学生入学晚了四五年，可是比他们成熟，多些经验面对社会的问题。在战争的四五年间不少政府的公务员、学校教员、服务机构的高级人员等都到退休年龄，这造成许多空职待补。因此我的同学们从来没有面对失业这个问题，这就跟我从中国国内大学的某毕业生听来的“毕业就是失业”的情况有天渊之别。我们这届的毕业生和后来几届的毕业生可说是适逢其时了。

1949年10月，我参加马来亚大学建校日典礼，协助校方招待来宾。念物理科高级学士学位的只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老师仅有两位；除亚历山大教授以外有一位高级讲师韦布（Charles Webb）。亚历山大教授是新西兰人，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出身，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韦布是英国人，拥有伦敦大学高级理学学士学位，曾任职莱佛士学院多年。亚历山大教授主讲核子物理和电磁学，并亲自监督全部的实验课程，热学则由韦布老师讲授。采用的课本都与英国大学的相同。亚历山大教授让我在一年级实验室协助指导学生，做一个学生助手，英文是Student Demonstrator，不好翻译，尤其是后来这个名称改用在搞学生示威运动者身上。但是这份差事给我带来几百元的收入，我就无须再向聂成安老师求助了。为保持一定的水平，大学当局聘请校外考试委员监考毕业试。我事先从亚历山大教授听说学校已经聘

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物理系主任韦伯斯特（H. C. Webster）教授为我们的校外考试委员。这位校外考试委员是亚历山大教授以前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同学。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理学奖的查德维克爵士（Sir James Chadwick）。在毕业考试中我获得头等荣誉理科学士学位（B. Sc. Honours [First Class in Physics]）。这次我又一次在物理实验室遇到亚历山大教授。他问我是否愿意回校任助教兼念理学硕士学位。我不经考虑就答应他了。

大学年终的假期是我回怡保探亲的良机。在这三个月的假期内我再在我的母校任临时理科教师。荣誉学士学位很被重视，在政府机构和学校任职常比普通学士占优势，易获得比较高的职位和有比较多的升职机会。荣誉学士学位分三等。三等的很少有机会被录取为研究生，二等的就可以被考虑进入研究班，头等的则最受大学欢迎读研究生。有头等学士学位者有极佳条件获取皇后奖学金去英国留学。既然我已经有机会在马来亚大学进修，我没有考虑申请这项奖学金。我成为了我的母校最先拥有荣誉学士学位的教师，也积极鼓励同学们进一步深造。

物理学生涯

第二章

1950年10月，我返回马来亚大学母校任物理系助教。当时理学院的助教称Demonstrator，而文学院的助教称Tutor；这两种职位不列入大学的正式教职制度，不列入大学教职的主流，仅算是临时或短期额外聘任。我的物理助教职英文称为“Demonstrator in Physics”也曾引起误会，说起来也觉得有点可笑。“Demonstrator”的原意是“示范者”或“指示者”“Physics”有两个近音字，“Physique”和“Physic”，一个是指“体格”，一个是“医学”的古字。有一个下午，一位朋友带我到另一位姓陆的朋友家，接他去一起打网球。开门的是姓陆的姐姐。我的朋友用英语向她介绍我，说我是大学的“Demonstrator in Physics”。她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一下，然后带着微笑对我说：“You don’t look like one.”（看来您不像是一个［体格示范者］啊）。那时体重仅得52公斤的我，哪能像是一个在大学展示自己体格的人呢？我只好回敬她一个无言的微笑。

由于亚历山大教授该年休假，我的主要任务是替他指导荣誉学士班的课程中的核子物理和实验室的实验。此外我也担任指导医学院学生的物理实验课程。在研究方面我获得壳牌石油公司（Shell Company）为期两年的研究金（Fellowship）补助我的硕士学位研究费用。我的研究领域是气流的测量。一年之内我已经完成论文，韦伯斯特教授再次任我的校外考试委员，我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我的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金也告终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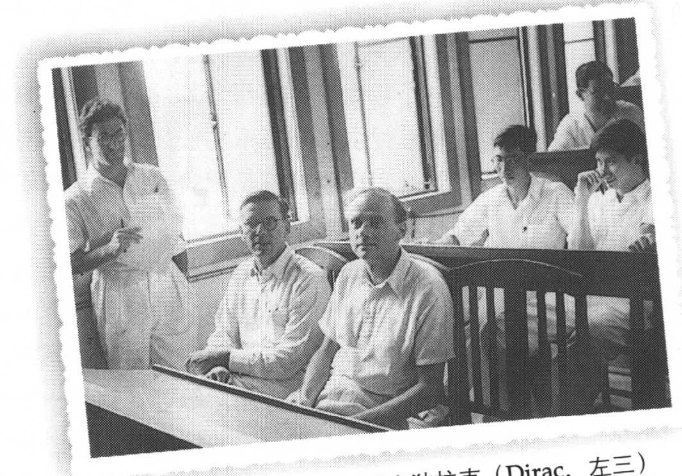
1951年，我受聘为马来亚大学物理系副讲师。我不是主动申请这份工作的，反而是亚历山大教授主动向大学提出聘任我的建议。我担任一年级医学生的物理课程，并开始做学术研究，观测气候因素对热带居民舒适感的影响。这时物理系同事们的研究项目皆集中在新加坡的地理环境。我希望从我的研究中可以找寻一个博士论文题目。1952年，我在英国的《暖气与空调设备工程学会学报》发表我的处女作，建立一个方程公式以显示气温、湿度和气流速度对居民舒适的影响。[1] 有人称此公式为“何氏系数”（Ho coefficient）。可是不久我开始质疑我的实验方法和实验。在测量气流的速度时，一瞬间风即吹过，无法回头再做一次实验以验证。后来我才领会到测量自然现象都不免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一个人的舒适是一种感觉，我也怀疑用以代表感觉的数字和温度、湿度、风速的数字相提并论同时计算是否合理，况且还有其他影响个人舒适感的因素是不能用物理方法来衡量的。我自问是否正在做着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正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教授告诉我说他替我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52年度夏季进修班（summer school）奖学金往美国参与测量云层的尘粒。由于申请旅费补助金手续失误，我未能成行。我从来没有对此事感到后悔，我相信在美国可以学到许多新方法，但我不觉得研究云层的尘粒会比研究气流有更好的前景。战后物理系实验室一切设备十分简陋，连测风仪器还要自己亲手制作。1953年，亚历山大教授向马来亚大学提出辞呈，前往非洲阿尔及利亚当大学校长。当时全大学唯一对物理学研究有经验的老师离职使我万分彷徨。

马来亚大学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备成立一个中文系。我不知道这是否

1 参阅 Ho，P.Y.(1952)，“Correlation of Equatorial Climatic Factors with Comfort”，204:196-197。

受到南洋大学快要建立的影响。听说马来亚大学曾试图礼聘胡适博士当系主任教授，胡适没有接受。后来请来在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的贺光中任高级讲师兼系主任。贺光中替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购买大量的中文书。在他买入的图书中，有几部与中国科技史有关的资料引起我的兴趣。当时理学院的各学系常邀请系外人士来系做专题演讲。例如，1933年度量子力学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P. A. M. Dirac）曾莅临数学系演讲。邀请他来演讲的人认识从前在剑桥大学同他相识的数学系讲师盖李察（Richard Guy）。有一天，一位数学系的同事邀请我在数学学会上演讲。我就参考李俨和钱宝琮的著作，以中国古代的三次方程式为题做报告。奥本涵老师也在座听讲。他听到中国比西洋更早懂得这门学问，大感兴趣。

在莱佛士学院时期，他曾亲自教我三次方程式，也出过三次方程式的考题。这时奥本涵老师兼任文学院院长，并受英国王室封为爵士。[1] 我告诉他我的研究工作处境，请教他的意见。他提议我放弃目前的研究范畴，转向研究中国科学史。我告诉他找不到指导老师，不知他是否能做我的指导老师。他说他自己对中文和科学历史都完全外行，假如能够从校外找到一位科学史专家做顾问，事情就好办。他就请人探听国际上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特殊专家。刚巧贺光中要去日本替图书馆购买图书，奥本涵老师就请他探听日本的情况。贺光中回来说，探得日本有一位薮内清教授。奥本涵老师就请他和薮内清教授联系，贺光中没有再回来向他报告，事情有如石沉大海。我不便向贺光中询问，后来薮内清教授对我很友善，但是我也不方便和他谈及此事。幸亏来了一个意外的情报。化学系一年前聘任



50年代量子力学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Dirac，左三）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数学系　摄于演讲前

[1] 何丙郁（1994年），《海纳百川》（台北，联经），是献给我这位恩师的。

的新讲师黄丽松博士向奥本涵老师提及正在剑桥大学撰写一部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说战时在重庆和他认识。通过他的介绍，我开始和李约瑟博士通信。[1] 我向他请教，我是否可以研究南宋末期秦九韶的数学贡献，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范畴。他回答说，他的〈数学篇〉已经成稿，而他正在着手整理《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文版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正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编者注）的〈天文篇〉，却苦于缺乏一部完整的《正史》中的〈天文志〉英译本供他参考。因此他建议我翻译和注释《晋书》或《隋书》中的〈天文志〉。这是一个双赢的提议。他可以用我的文稿编写他的〈天文篇〉，同时他也对我的文稿提出他的意见，作为我写论文时的参考。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选择，那是研究唐代僧一行的科学贡献。我选择了对双方有利的《晋书 · 天文志》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并参考《隋书 · 天文志》的资料，由于它们都是出自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之手。从此奥本涵老师就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而李约瑟博士和我有两层关系，一方面他是我的博士论文顾问，另一方面我成为他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一个早期合作者。[2]

本来自动跨学系找指导老师在手续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是一个理学院的低级教职员找上文学院的院长。亚历山大教授离任后，理学系就由韦布当系主任。幸亏韦布对奥本涵老师很尊重，而且奥本涵老师也和理学院院长罗宾逊教授互相敬重。我的指导老师问题就得以圆满解决。

虽然奥本涵老师不谙中文，而且天文学也不是他的专业，但是他指导有方，使我受益匪浅。他教我研究方法，指出论文中该注意的要点和该继续探讨的疑点，哪些地方可以省略，甚至暗示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修辞学在写作上的应用，等等。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经验。后来有好几次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当过自己完全外行领域的博士后候补人的论文指导老师。例如，我在澳大利亚格理斐大学任职时，邻校昆士兰大学历史系主任向我告急，说他系里一位教日本史的日籍助教必须获取一个博士学位才可以留任和升职。他的研究领域是古代日本史，校内没

[1] 黄丽松博士后来先后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和香港大学校长职。何丙郁（1980年），《道藏 · 丹方鉴源》（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大学）是献给他的一部拙作。

[2] 不少人误认李约瑟博士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不想掠人之美。他的唯一科学史研究生是桥本敬造博士。曾经成为20世纪中一东一西两位中国科学史权威者薮内清博士和李约瑟博士的正式门人的，只有桥本敬造一人。

有适当人选做他的导师，假如他没有博士学位就必须离任，而他的学系将失去一位好教师。奥本涵老师的教诲引发我的同情心，我答应做这位助教的导师。后来他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两位名教授做校外考试委员。后来我在香港大学任职，也曾担任两位同事的博士论文导师。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唐代藩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跟我个人的专业相隔十万八千里。他们的论文皆顺利通过，而且大获校外考试委员的赞赏。其实论文的成绩，主要靠研究生本人的素质和努力，指导一篇自己外行的论文本来是一件不足为训的事情，但是偶尔可以做些非常的事情来帮助别人，这应该是无伤大雅的事。说来这也是有拜奥本涵老师之赐。

研究有了新目标，我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每次我的文稿经奥本涵老师过目和修改后就寄到剑桥。1954 年，奥本涵老师和李约瑟博士向马来亚大学提呈报告书，说我的博士论文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该年六月，我就被提升为物理系讲师，任期至 55 岁的退休年龄为止。

1954 年是我人生中改变比较大的一年。这年我的五弟河通获得奖学金进医学院念医科，当时医学院第一年级的物理课程由我执教。我感觉工作已经有了着落，从此可以过比较安定的生活。适值马来亚大学学生要去香港大学做校际运动比赛，我就跟随学生们一起乘船去香港。我在香港住在学生宿舍，并参与同学们的乒乓球赛。我的怡保旧同学李金辉做月老介绍我认识他女友冯仲姬的妹妹冯美瑶，我未来的配偶。她是已故殷商冯镜如先生的第三千金。在香港时期我也到澳门探访我的堂四叔父何其埙和他的家眷。他嘱我替他全家安排申请移民新加坡事宜。在学术方面，我在数学系的通讯中发表了一篇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有关中国数学史藏书的报告。[1]

1955 年 6 月 18 日，我和冯美瑶结为夫妇。同年我的四叔父和四叔母带着四叔的母亲和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何兆明，一共四人移民到新加坡。得到新加坡华校视学官刘伯和先生的推荐，四叔父在庄竹林校长的中正中学任国文教师。我跟刘伯和先生素有交往。他几次招待我在新加坡的天津饭店进餐。那是我初次尝试中国北方菜。他的一位千金在马来亚大学念医科，常听我的物理课。庄校长我也认识，后来他继林语堂任南洋

[1]参阅Ho Peng Yoke (1954)，"Books on Chinese Mathemat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Bulletin of the Malayan Mathematical Society，1:121-132。

大学校长。虽然我属于受英文教育的主流而且专业是理科，我却一向和中文教育界有点联系，尤其是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同仁。

1956年，我和美瑶的男孩奕康诞生。同年，我入选为伦敦物理学学会的普通会员，英文称号是“Associate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Associate”这个字不好翻译，在美国常用在副教授身上，在英国的不同场合上有不同的意义。普通会员是受学会认可的普通物理学职业者。普通会员以上有具有更高学历和更多经验而称为“会士”（Fellow）的高等会员。“Fellow”这个字也不好翻译，常被译为“院士”。可是我五年前做过的“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金获奖者”（Shell Company Research Fellow）的“Fellow”仅配称为“研究生”。现在许多大学设有博士后研究奖学金 Post-doctoral Fellowship。获奖者的称号也不能翻译为“院士”。

1956年，新加坡华校教师训练所所长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和夫人邀请我夫妇俩到他们家吃晚饭。他从李约瑟处听说我们将来会去剑桥。罗宾逊是李约瑟的一位早期合作者，负责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七册的第二分册中的〈声学篇〉。1980年退休后回剑桥协助李约瑟。他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七册第二分册的〈总结篇〉。

1957年，我家里发生三件大事情。端午节过后不久，父亲在怡保逝世，我们赶回去奔丧。我们的长女淑琼和二女淑英诞生，她们是双胞胎。我的博士论文大功告成，向大学当局提呈三份，两份是寄呈两位校外考试委员审定，一份提呈指导老师审定。这一年，我在英国的《天文台》学报上发表一篇与李约瑟和比尔（Arthur Beer）合写的有关彗星的报告。[1]

我在数学系的通讯也有一篇报告。[2]

我的两位校外考试委员中，一位是李约瑟博士，另一位是欧洲的天文学史权威——哈多那（Willy Hartner）教授。马来亚大学是英国式的大学，教职员每次在校服务满六年后就享有一年带薪休假出国做研究的待遇，而且在以前英国殖民地的大学，常有大学当局补助出国研究同仁的旅费和海外生活费。这种休假称为“sabbatical leave”，反映以色列人

---

[1] 参阅 Ho Ping-yü, Arthur Beer & Joseph Needham (1957), “Spiked Comets in Ancient China”, *The Observatory*, 77:137-138。

[2] Ho Peng Yoke(1957), “The Chou Pei Suan Ching”, *Bulletin of the Malayan Mathematical Society*, 4: 47-52.

传统在每第七年停止耕作的安息年。早在我写论文的时候，奥本涵老师已经和我的两位校外考试委员谈及我将来休假的事情。1957年的下半年，马来亚大学在吉隆坡设立分校，命名为马来亚大学吉隆坡分校，而在新加坡原址的就称为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吉隆坡分校设在吉隆坡近郊的班台谷（Pantai Valley）。在过渡时期奥本涵老师任两分校的总校长，各分校有它各自的分校长。我的两位校外考试委员分别和奥本涵老师联系，探听我是否能够利用休假到他们的工作单位呆一段时期，作为他们的合作者。事先我不知道这回事，我仅跟李约瑟谈及我想去剑桥的愿望。我向大学申请一年休假，去剑桥大学和李约瑟合作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这部书。岂知出乎我意料之外，大学当局批准给我两年的休假，其中一年是一种“预支下期”的假期，我须立下契约，假期满后必得回原来单位服务最少六年，否则就必须赔偿大学的金钱损失。由大学派出一名教职员去协助其他大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情理上有些讲不通。于是大学当局就将我去剑桥的目的改为汲取剑桥名学府的经验和学习李约瑟的治学和研究方法。奥本涵老师告诉我说，从我两位校外考试委员来信的口气，他看出他们都意图把我留下，我务须留意的是哈多那教授，由于他是德国某大学的校长（Rector），去访问他则可以，但不可被他留下，因为他有能力这样做。我在这次的休假中没有去德国法兰克福拜访哈多那教授。至于李约瑟，奥本涵老师所料果然没有错。我在剑桥的时期，李约瑟劝我离开物理学，他说在一个像新加坡的研究条件较差的大学，我将来绝无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假如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即使以后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将来也会成名。他建议我等待机会，向他的凯思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申请，填补一些临时性质的附随院士（bye-Fellow）空缺。幸亏奥本涵老师已经替我准备了一个答案；我回答说有合约在身，必得回到院校服务。否则我就感到不方便说他所提出的职位比我原来职位低微而且任期短暂，两三年后的职业并没有保障，我更不愿意告诉他我的家庭经济负担，不仅要养活一家五口还须照顾老母。当时李约瑟不会料到，我婉绝他留我在剑桥的邀请，后来对双方都有利。

首次访问剑桥

1957年11月，我把淑琼和淑英送到怡保托母亲看管，然后和美瑶、

奕康一齐乘搭邮船往英国。马来亚大学的待遇很好，我们得以享受头等舱。1958年1月3日，轮船到达英国的南安普敦（Southampton）港，我们转搭火车经由伦敦往剑桥。李约瑟到火车站迎接我们。他开的是一辆蓝色的名牌开篷赛车。从前这辆车的主人是世界著名的英国赛车名手卡姆贝尔爵士（Sir Malcolm Campbell）。我让美瑶和奕康坐前座，我一人坐后座。把车门关上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拿出一条拴狗的铁链绑住左边的车门。还未足两岁的奕康几乎要哭了，他在家乘搭汽车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形，以为这条铁链是用来对付他的。李约瑟看到情形不对，就向我们说，这是由于王铃最近乘搭他的汽车出过事，他要特别小心。他替我们在康河边风景优美的花园屋饭店（Garden House Hotel）订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房间，算是一个半间房。花园屋是剑桥两个最豪华饭店之一。李约瑟送我们到饭店，让我们把行李放下后，就带着我们先去他家见他的夫人李大斐博士（Dr. Dorothy Needham），然后去到近在咫尺的鲁桂珍博士家。鲁桂珍原是李大斐的高足，李大斐逝世后成为李约瑟的第二任夫人。她是把李约瑟从一个生物化学家变为一个中国科学史家的主要人物。坐下不久，鲁桂珍就向我们讲李约瑟拴车门的铁链和王铃的故事。她说："不久以前李约瑟从剑桥开车去牛津开会。王铃乘搭他的车，他左手放在车门开关锁的位置打瞌睡，不知不觉间车门就打开了。王铃被抛出车外。李约瑟忽然间发觉王铃不见了，大吃一惊，立刻掉头去找他，看到王铃安然无恙，半身埋在一堆积雪中，举手摇着向他打招呼。李约瑟害怕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买了一条拴狗的铁链。"这是鲁桂珍对我们所讲的故事，李约瑟没有插话。

过了几天我在凯思学院首次和王铃博士会面。他也告诉我他的遭遇。他说："最近我乘搭李约瑟的车几乎把命都抛掉了。我乘搭他的车一起去牛津开会。怎知他车开得快，一个拐弯就把我抛出车外。幸亏倒在一堆雪上，否则就无缘和您见面了。我看见李约瑟开车转回来找我，便挥手吸引他的注意。"

这是从两个不同立场描述同一件事情。鲁桂珍关心李约瑟受惊，而王铃则关心自己个人的安危。不同的出发点导致略为不同的报告。

我遇见王铃的时候，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剑桥远赴澳大利亚首府堪培拉任教职。他告诉我说，这份职位是剑桥大学东方学部某讲师

替他找来的。[1] 王铃是李约瑟最早的合作者。抗战时期，李约瑟在重庆访问迁往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遇到他。这时他是傅斯年所长属下的一名助理研究员，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懂英文。1947年，傅斯年派遣他去剑桥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听说月薪是由中国方面发给，每年500英镑。两年后，傅斯年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王铃的月薪来源就发生了问题。李约瑟很需要一个中国人的助手，替他翻阅浩如烟海的中文资料，否则他的工作就无法进行。关于资助王铃的事情，他和台湾与北京两方面有许多通信。我没有翻阅这些档案，还待将来对此事情有兴趣的学者来研究。[2] 总之事情对李约瑟和王铃两方都似乎不太顺利。李约瑟告诉我说他曾把他剑桥大学薪金的一部分给王铃，但没有说明金额。王铃离开剑桥也有他的苦衷。我不宜胡乱做猜测。

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服务单位是生物化学部，不能由单位资助与生物化学无关的研究。他唯有尽力向中国科学院争取经费。1956年，他已经知道留不住王铃了，就写信向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工作的鲁桂珍求助。1957年，鲁桂珍辞退巴黎的职务，回到剑桥和李约瑟合作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她是富家女，不需薪酬。她和李约瑟早已以兄妹相称，因而就把李约瑟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那个时代，协助西方学者做研究的中国学者仅被称为研究助手。这还算好，有时连名字也不提。当初李约瑟也称王铃为研究助手（Research Assistant）。1959年《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出版时才改称合作者。我猜想这是因为鲁桂珍来了，李约瑟就一律改称了。鲁桂珍告诉我说，李约瑟很喜欢王铃，但有另外两人他更喜欢。他们是当年在重庆时期李约瑟的第一任秘书黄兴宗和第二任秘书曹天钦。她说得没错。李约瑟常用王铃的别字“静宁”称呼他，虽然王铃早在1957年已经离任，在李约瑟的晚年，每当他提及他的合作者，他仅讲出鲁桂珍和王铃两位的名字。

我没有到剑桥以前，李约瑟已经告诉我，他将会替我们寻找一间房子租住。我们在花园屋饭店住了10天，还没有找到房子，花了不少钱。

---

[1] 英文原名的“Faculty”通常是翻译为“学院”，可是在剑桥容易和传统的独立学院混乱，才用日文的“学部”。这只限于剑桥。

[2] 有些档案存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有些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也许南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存有李约瑟和傅斯年的通信。

李约瑟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鲁桂珍就请我们到她家暂住。她家在奥斯屯路（Owlstone Road）28号，而李约瑟夫妇就住在奥斯屯路1号。在鲁桂珍家做客一个多月，我们找到一间离开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le College）不远的空房子，就以每月21英镑的租金，租下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5号的二楼居住。

我离开新加坡前，马来亚大学的校务主任礼伟斯（Hugh Lewis）对我说："您必须提防受到李约瑟左倾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友谊的忠告。假如在那个时代受到这些影响，在当地的环境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我本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也许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搞政治的天赋。我还记得1955年，马华公会政党的敦梁汝皋亲临寒舍，劝我加入他的政党。"敦"（Tun）是当地最崇高的爵位，而敦梁汝皋是当时的司法部长，我曾在怡保任他的家庭教师，替他的子女补习功课。结果我还是婉拒了加入他的政党。李约瑟从来没有在政治思想方面意图影响我。后来他在信中，也曾提及他知道我不像他是一头"政治野兽"（political animal）。我在剑桥的时期，他只有一次谈及与政治有关的事情。说起来也相当有趣。这是关于他怀疑某访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事情。有一天，李约瑟的研究室来了一位美籍访客，说是天文学家，要找一些中国古代天文资料。我照常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料，待他和其他学者没有两样。我以为他是李约瑟的朋友。李约瑟后来对我说，这位访客常去苏联，他没有说他的固定职业，何来经费和空闲常去苏联旅行呢？因而李约瑟怀疑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他是否是中央情报局人员对我都没有什么影响。我没有必要也无法证实李约瑟的猜疑。我继续向该访客提供中国天文资料。后来我多次在美国和他会面，并且共同发表学术报告，大家成为朋友。他也从来没有向我问及李约瑟。李约瑟曾向我提过由于朝鲜细菌事件，美国的一份黑名单上载有他的名字，禁止他入境。也许李是怀疑美国派人侦查他，这也难怪。

我的专业是物理学，本来我希望我的专业可以派上用场。可是一开始和李约瑟谈到合作的事情，我就知道我的希望落空了。原来当时有关数学、天文和地理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已经在排版中，而第四册的物理学、工程和航海部分的资料也已经完备，只等候李约瑟亲自动手整理，而且有鲁桂珍帮忙无需我插手。当务之急是为第五册的〈化学篇〉搜集和整理资料。因此李约瑟就委托我担任搜集和整理《道藏》中

所记载的关于化学史的资料，以备将来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五册中的〈化学篇〉之用。[1] 我心里很彷徨，担心不能胜任。我在大学仅念过一年的化学，而中学时期我的母校没有这门课程。起初我翻阅《道藏》的时候确实缺乏信心。有一天，李约瑟的研究室来了一位访客。他从前在伦敦大学任化学教授，当时退休隐居在剑桥的帕庭顿（J. R. Partington）教授。他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化学史专家。他常来李约瑟的研究室找资料，李约瑟也常向他请教。我也告诉他我当时的处境并向他请教。他说要先考一考我的化学知识，问我是否还记得H_2O这个化学公式。我回答说我当然记得，并且还记得好几个其他化学公式。这位老教授笑着说，我已经获得很高的及格分数了，他解释说，研究化学史根本上无须懂得什么化学公式。他的一席话，使我充满信心，继续干下去，每天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埋头翻阅《道藏》。

我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念书的第一天，就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帕庭顿教授所编写的大学化学课本，此后这本书就没有再在图书馆出现，使我很失望。这次在剑桥得到一位久已闻名的化学权威的启发，令我喜出望外。我还遇到另外一位闻名已久，而且名气比帕庭顿教授更大的人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使我感到难堪，但我也从中获得一点教训。我到剑桥不久，李约瑟邀请我去凯思学院赴晚宴。这是我首次在剑桥学院的高桌上进餐。坐在首席的是一位头戴无边帽子的年长者，我猜想他是学院的牧师。我坐在他的右边。用餐时他和坐在他左边的人说了一段话，然后转过来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我是从新加坡来的物理讲师。他望着我，一言不发。李约瑟向我介绍说，他是凯思学院的院长查德维克爵士（Sir James Chadwick）。听到他是发现中子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时，我立刻告诉他我的老师是亚历山大教授。谁知他还是一言不发，使我感觉自己更加渺小。最后我就说出我以前物理学考试校外考试委员的名字。一听之下，他说他想起来了，然后就滔滔不绝讲他们两人没有对物理学做出大贡献。幸得李约瑟来解围，他向查德维克介绍我说我是他的合作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parhelia”（日晕及其相关的太阳现象）的发现者。于是查德维克就放过我了。不过他这样讲我敬佩的老师和校外考试委员是极不公平的。不是每一个卡文迪许实验室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英国皇

---

[1] 详情参阅拙作*Explorations in Daoism: Science in Literatur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Monograph, Curzon and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排版中）。

家学会的院士（Fellow of Royal Society），甚至成为诺贝尔奖得主。[1] 做实验要靠许多因素，况且除了做实验以外还有其他可以为物理学做出贡献的途径。对我来说，我也从这次的经验获得教益。我认识到在个人的专业上，要尽力争取达到不被国际上同专业者看低的境界。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场面，以后我还在许多剑桥大学学院的高桌上进过餐，在这样的场合，对任何人都能应付自如，得以享受英国传统大学学府气氛。后来我也当上学院的院长，这是在香港大学的柏立基学院。从查德维克身上我学到避免做些不该做的事，这是该学院的任期留给我美好的回忆之一。

1958年和1959年的两年中，李约瑟有好几个月离开英国，第一次是去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协助当地政府做教育调查，第二次是在鲁桂珍陪同下访问中国。他们从中国带回许多书，在每本书上盖上“走马看花”的印章，以纪念当时所购买的书。路经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做客马来亚大学两分校总校长奥本涵老师家，也会见了苏艾维（Ivy Soh）。艾维是一位英语教师，比我更早去英国和认识李约瑟。他是土生华人，有中国姓但只有英文名。李约瑟就替她取一个中文姓名“苏霖”；很少人知道这个中文名字，她也绝少使用它。每次她访问英国都做客李约瑟家，与李大斐和鲁桂珍相处很好。

李约瑟留言，在我需要化学文献参考时，可以请李大斐带我到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部图书阅览室。我去过两三次。我感觉到生物化学部的同仁都对李大斐很好。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同是在生物化学部出身，而且李约瑟还是在这个学部任职，我却只看到李大斐跟这个学部的同仁保持联系。除了李约瑟和李大斐以及1937年和她一起到剑桥留学的王应睐和沈诗章，还有后来的曹天钦，我从来没有听过鲁桂珍提及这个学部的其他有关人物。

我们在剑桥的日子相当愉快。早上美瑶带着奕康走路去只有几分钟路程远的市中心购买食物和日用品。我则先去李约瑟的凯思学院K1号研究室，然后到大学图书馆看书，有时也会先旁听物理课。下午我多在李约瑟的研究室，常跟李约瑟和鲁桂珍一起在K2号研究室喝下午茶。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假期。我和美瑶会利用这个机会到处走走或去探望朋友。后来我买了一辆新汽车。每周末我们不是开车去动物园，就是去看附近沿海的游览名胜。鲁桂珍偶尔也陪同我们去游览。我的三妹丽金正在沃

[1] 在马来亚大学仅有奥本涵爵士是一位皇家学院院士。

赫哈姆敦市（Wolverhampton）附近的一所替马来亚联邦培养教师的布林斯富寓（Brinsford Lodge）师范学院受训。我开车接她来我们家，留宿一晚然后送她回校。

战后的10余年剑桥的治安良好，可以说是路不拾遗。星期日贩卖报章的小贩常离开自己的摊位，任由买报人取报和付钱。所付的钱就放置在摊子的一堆钱上；这堆钱也作找钱之用。有一次我们开车往苏格兰旅行，忘记取出插在大门上的钥匙，美瑶的钻石结婚戒指也放在屋内的桌子上。10天后我们从苏格兰回来，发现开门的钥匙还是插在大门上，戒指也仍在桌子上，一切原封不动。李约瑟曾乘搭我的车，看到我下车时把车锁上。他便对我说剑桥的人从来不把车锁上。我回答说，我知道并很钦佩剑桥人士的品德，可是别处的人不可养成剑桥人士的好习惯，车子停下不上锁的话，很快就会不翼而飞了。10年后我第二次访问剑桥，乘搭李约瑟的车，看到他下车后小心翼翼地把车锁上。我心中暗叹剑桥的治安已经大不如前了。

我们家里也不时有访客，大部分是从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到剑桥的留学生。其中一位是后来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和医科教授的林彬。那时他任剑桥大学马来亚留学生会的义务秘书。当时马来亚包括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两个自治区。有一次他找我替他的留学生会做演讲，地点是在他居住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我就以“马来亚高等教育的前景”为题做报告。不料听众只有三人，他们是留学生会姓蔡的会长、林彬义务秘书和一位剑桥大学同学。发问时只有一个提问，是由这位本地大学生提出的。他请我把马来亚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术水平做一个比较。我回答说，马来亚大学成立只有10年，而剑桥大学已经有700年的历史，我的答案也是像他的问题一样不公平。这就是说，10年后的马来亚大学与500年甚至600年前的剑桥大学相比，前者的学术水平占优。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以后演讲时从不担忧听众会有多少，相信总之很难少于在皇后学院的三个人纪录。这次的演讲过后不久，又有人找上门了。伦敦附近一所称为“圣大卫学院”（St.David's College）的校长肖夫博士（Dr. Justin Schove）邀请我到他处向同学们演讲。不想我的“马来亚高等教育的前景”演讲只有三个听众听过，我就带着讲稿赴会，希望再有一次机会发表我的观点。在美瑶和奕康的陪同下，我从剑桥开车往圣大卫学院。一进大门看见草坪上有许多儿童，我就知道有点不对了。原来这是

一所幼儿园。我没有机会宣读我的讲稿了，于是我取出讲稿，把一张一张的稿纸示范中国的折纸游戏。这是我当年从一本《小学生文库》的书中学来的。后来肖夫对我说，他的孩子们对我的表演大感兴趣，希望我再跟他们谈谈。我婉拒了他。肖夫是一个业余天文学家，他的兴趣是关于彗星、北极光、气候等的记录。他到剑桥凯思学院找李约瑟向他要中国的天文记录资料。李约瑟不能抽空招待他，他遇到我便向我索取资料。我误认他是李约瑟的朋友就帮他的忙。后来大家合写了几篇文章登载在英国天文协会的 British Astronomical Association 的刊物中。1959 年，我入选为该协会的会员。

在剑桥这段时期我不仅从《道藏》和《本草》中搜集了大量资料，而且和李约瑟合写了六篇学术报告。[1] 我还单独向英国的《天文视野》(*Vistas in Astronomy*) 学报提出有关彗星和新星记录的长篇报告。[2] 不少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研究者曾经参阅这篇报告，有些人称他为 "Ho's Catalogue"(何氏表)。虽然现在已经有更精密的星表取代它，但当时我认为它是我最得意的学术报告，而且比我跟李约瑟合写的炼丹术文章更容易获得我原来物理学单位的接受。此外我还和肖夫（Justin Schove）在英国天文协会的学报登载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北极光记录的报告。[3]

我在剑桥认识了许多东方学部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浦立本（Edwin Pulleyblank）教授是该学部的主任。我跟他曾参与李约瑟的一项关于唐代僧一行的共同研究。李约瑟还介绍我认识东方学部的著名中国考古学家郑德坤博士。郑先生正在编写一部有关中国考古学的巨著。当时在西方汉学界，他的巨著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被并列为剑桥大学出版的两套著名东方学系列。我跟郑德坤结交，有时带着美瑶和奕康到切斯特屯路（Chesterton Road）166 号拜访他和他的夫人黄文

---

[1] 参阅 Ho, P. Y. and Needham, J. (1959), "Ancient Chinese Observations of Haloes and Parhelia" *Weather*, 14:124-134;Ho, P. Y. and Needham, J. (1959), "The Laboratory Equipment of the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sts" *Ambix*, 7:57-115; T. C. Ts' ao, Ho, P. Y. and Needham, J. (1959), "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Text on Aqueous Solutions", Ambix, 7: 122-158; Ho, P. Y. and Needham, J. (1959), "Elixir Poisoning in Mediaeva l China", *Janus*, 48: 221-251; Ho, P.Y. and Needham, "The Theories of Categories of the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st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ld Institute*, 22: 173-210 和 Beer, Ho, Lu, Needham, Pulleyblank and Thompson (1961), "An 8th-Century Meridian Line", *Vistas in Astronomy*, 4: 3-28。

[2] 参阅 Ho Peng Yoke(1962), "Ancient and Mediaeval Observations of Comets and Novae in Chinese Sources", *Vistas in Astronomy*, 5: 127-225。

[3] 参阅 Schove, Jand Ho, P.Y.(1959), "Chinese Aurorae I: A. D. 1048-1070"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stronomical Association*, 69: 295-304。

庄。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常遇到东方学部其他同仁，往往和他们一起在图书馆餐室里喝上午茶或进午餐。东方学部来了一位以前在马来亚大学任英文系讲师的张心苍博士。后来我们回到新加坡就住在他退出的大学宿舍。我也认识一些物理学部的同仁，并替马来亚大学找到一位物理系校外考试委员。他是皇家学会院士朔恩伯博士（Dr. David Shoenberg)，也是凯思学院的院士，他的夫人和李大斐关系很好。

虽然《道藏》的研究已经和物理学相距甚远，但我没有忘记我原来的物理系职务。李约瑟通常上午11时到研究室，傍晚在凯思学院和院士们一起用晚餐，然后回去见鲁桂珍和夫人。我就利用清早的时间，去旁听莫特教授（Sir Nevil Mott，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主讲的固体物理学课。当然李约瑟对此事情一无所知，我觉得没有告诉他的必要。

1958年底，我离别剑桥，心中感觉已经完成与李约瑟合作的任务。在离开剑桥前，我还将我一切有关《道藏》研究的笔记留在李约瑟的研究室。我想，与其把这些对我个人在大学物理系不大派得上用场的笔记带回，不如留它在剑桥以供日后他人作为参考资料。后来我很高兴看到李约瑟本人曾利用它，并且邀请某位合作者利用这些资料以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中分册的一篇。[1]

李约瑟的治学方法

黄丽松在我动身往剑桥的时候对我说，此次去剑桥不是向李约瑟学习中文，主要目的是学习他的治学方法。1984年9月，我曾经以李约瑟的治学方法为题做过演讲，并得李约瑟本人亲自致介绍词。[2] 1989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也登载一篇相同题目的拙作。[3] 今节录一部分内容如下：

> 李约瑟原来的工作场所是设在剑桥凯思学院的K1和K2两个研究室。[4]到访研究室的人，都会看到许多卡片和文

[1] 参阅Needham，J.& Lu Gwei-Djen(1983)，*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册第5分册，xxxiii和455。

[2] 演讲词登载在何丙郁（1984年）〈李约瑟的治学方法〉，《西北大学学报》（西安）卷14，1-5。

[3] 参阅新22卷第1期，31-37。

[4] 80年代，李约瑟从研究室搬出，在墙上写下“人去留影”这四个字。2002年11月，在他逝世七年后，我在凯思学院进晚餐，坐在霍金（Stephen Hawkins）教授身旁。由于K1号研究室已归霍金所有，话题就自然转到李约瑟。透过他的特制电脑传声机，霍金说这四个字给他很深刻的印象。

件夹，发现李约瑟所使用的是他自己创作的系统。李约瑟认为在他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过程中，必定会涉及人类史上的种种问题。为处理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建立一套资料分类和查阅系统。在20世纪的50年代，电脑还未普遍使用。虽然是电脑的发源地，剑桥大学当时仅有一座庞大的使用真空管的第一代电脑机。因而李约瑟所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手摸得到的卡片、文件夹和分类文件箱（box file）；它们的编排按照《中国科学与文明》各门学科的分类。同时还有存放图片资料的文件夹。《中国科学与文明》这部巨著，是西方首创的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著作。由于要一册一册地陆续出版，每册后面必须附有长篇参考书目。为着日后能经常作为参考使用，这些书目又必须编制成卡片。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参考卡片，如中国古代科技名词卡片、人物传记卡片等。它们记载着三千年来数以千计的中国的文学家、技术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炼丹术家、医学家等的简历。《中国科学与文明》仅能容纳这些资料的一小部分……还有一套李约瑟称为“影子卡片”（ghost card），这是用蓝色的卡片，作为通常所用白色卡片的暂时替身。每当白色卡片要暂时离开原来的位置时，例如，要用来编索引，“影子卡片”就派上用场了。假如没有“影子卡片”李约瑟的工作就要停顿下来。李约瑟经常翻阅他的卡片，有时补充新资料，有时修改旧资料，甚至加以取消。在一本书出版时，这些卡片又可以作为参考书目和索引之用，只须稍加整理即可。李约瑟每次翻阅一本书，必定将有关科技史的资料记在纸上，写明书名、作者名、页数等，并尽可能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分类收入文件夹，和同类的资料放在一起，这包括不同文种的资料。学报和抽印本则另外分类放入不同的箱子。

李约瑟的几个早期合作者都谨慎遵守这套系统。我也不例外，在剑桥的期间我充分利用了这套系统。可是由于不同条件和环境，我从来没有打算在我新加坡的大学单位东施效颦似地设立一个类似的系统。在

《中国科学与文明》众多后期合作者之中，仿效这套系统的人，恐怕也不多。这套系统对李约瑟本人来说，是有其利必有其弊。在他初设立这套系统时，确是利多弊少。当时在他的计划中《中国科学与文明》仅有七册。但不料后来增加了好几倍，变为20多本。随着册数的增加，卡片、文件夹等也越积越多，整理和翻阅就越来越费神和费时，而李约瑟也渐渐上了年纪，精力愈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科学与文明》后期的撰写不免受影响。此外，李约瑟的活动范围也被自己创下的系统所限制。这个系统很不方便作为随身行李搬运。一旦离开这套系统，李约瑟就无法撰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和有关文章。假如现代的电脑早五六十年出现，这类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了。1981年，李约瑟和鲁桂珍访问香港。林炳良夫妇赠送他一座IBM XT个人电脑，希望可以有助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李约瑟把它带回剑桥，但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仅留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

李约瑟每次阅读一本书或一篇论文，必定把要点记在纸上，然后放进文件夹中。他在书页边也补上他本人的意见。他的脑子存着各种图书、各个文件夹和各个卡片箱的位置。参阅后必须放回原位。偶尔他找不到所需的参考资料，鲁桂珍就对我说："今天约瑟的心情不好。"（Joseph is in a bad mood today.）李约瑟则对我解释说，他不是生别人的气，而是责怪自己的记忆力不好。动手撰写长篇文稿前，李约瑟要做些准备工作。他先选择一张大桌子，找来所需要的参考书和其他文献放置在桌上。看起来书是堆得乱七八糟，可是李约瑟还要警告整理研究室的人员，千万不可弄乱桌子上的东西。其实他的脑子已经存入那些书和文件的位置。

李约瑟在写稿前，预先把大纲要点依着目次顺序记在纸上，然后用笔划出一条一条的线，串联各要点。他平生爱好火车。鲁桂珍跟他开玩笑，打趣称这些线条为"李约瑟的火车轨道"（Joseph's railway lines）。我想起父亲当年的教诲，写文章像盖房屋，要依照次序，不能先盖瓦然后再竖屋柱。我有多次机会，目睹李约瑟撰写文章，这是个很大的收获。他能够把一大堆的资料，依着次序串成有条有理的文章。他称自己的方法为"编织法"（weaving method）。在这过程中他大量采用所谓"剪和贴方法"（cut-and-paste method）。现在写文章有个人电脑，比当时方便得多了。我看到李约瑟有时写较短的文章仅用录音机。他看着手头的资料就直接口述，经过打字员就把无须修辞的文稿写出。这是他的特殊

天赋，我没有尝试去学习。

1959年的一个夏天，薮内清教授访问凯思学院。这是他和李约瑟两人首次会面，也是我首次遇到他。他是准备去西班牙参与在巴塞罗那（Barcelona）和马德里两地举办的第九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接着中山茂博士也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会面，可是他说早已在1957年在剑桥就认识我，李约瑟让他阅读过我的博士论文。他曾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往哈佛大学念博士学位。由于研究领域是日本天文学史，哈佛大学送他返回日本向薮内清学习中国天文学史，然后再送他去剑桥跟随李约瑟一段时期。薮内清和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学史一东一西的当代两大泰斗，而中山茂则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日本专家。薮内清用日文写作，虽然他是日本学士院的院士，在日本国内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在国外他的知名度反而比不上中山茂了。

我们离开英国前，新加坡进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大胜。有些英国的朋友担心新加坡落入左派当权者的手中，探听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我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没有研究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对人民行动党也一无所知，可是我很清楚当选的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学历都远胜前执政党的议员，而且我认识其中好几位议员，相信他们是真心要替新加坡人民服务的。当时新加坡还是一个自治政体，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1959年9月初，我们道别剑桥。我开车路经法国的巴黎和图卢兹（Toulouse）进入西班牙国境，直往巴塞隆纳市，住在马可波罗旅馆。李大斐和鲁桂珍则坐李约瑟的车分道而来，参加同一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上我又见到薮内清和中山茂，也由李约瑟引见首次遇到哈多那教授。哈多那对我很友善，邀请我有空到他的法兰克福城市一行。我在会上宣读一篇有关中国天文记录的误写问题的报告。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继续前往马德里参加下半段的盛会。我们则告别西班牙，取道法国南部海岸地区前往意大利乘搭意大利邮船回新加坡，路经马赛、尼斯和康城。在康城逗留时李约瑟一行三人从马德里赶回来向我们道别。我们后来前往意大利的热那亚（Genova）港乘搭亚细亚号（m/s Asia）意大利邮船回返新加坡。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分校的“Reader”

我们10月回到新加坡。大学安排我们住在大学园里的第八号房子

(House No. 8, University)。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洋房，而且步行两分钟就可以到我的研究室，极为方便。大学12月放学期假，我利用这个机会带着美瑶和奕康乘搭邮船往香港度假，做客在香港兴汉路的美瑶姐夫杨炯煊家，还见到堂弟兆孔以及端宜和璧宜两个堂妹。回到新加坡后，我就开车去怡保带淑琼和淑英回家。我回怡保探亲时，三弟耀南已经结婚了，二妹润金已出嫁到吉隆坡，五弟河通念医科的最后一年，而六弟河津也进了马来亚大学吉隆坡分校念理科。

我从剑桥回来后，大学当局开始考虑开设科学史课，结果决定在物理系开一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课程。1960年，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分校提升我为物理系的“Reade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当时整个大学仅有两个所谓的“Reader”，另外一位是后来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杜进才博士。英国教育制度所采用的名词常会引起国外人士的误解。上文已经提及“College”和“School”这两个字。英国式大学有“Reader”这个职称，在主任讲座教授之下。英国只称讲座教授为“Professor”，有些别的地方则称讲座教授为“Chair Professor”。在英国的大学系统里，每一单位仅有一位“Professor”。在待遇上，“Reader”的薪酬相等于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但在遴选条件上，“Reader”全靠个人的学术贡献，而高级讲师则须综合评估本人对学术、校政、教学等的贡献。[1] “Reader”要比高级讲师的地位崇高。英国俗称它为“无讲座的教授”(Professor without a Chair)。从前李约瑟和郑德坤在剑桥大学所任职位就是这个俗称为“无讲座的教授”。英国以外，知道这个大学称号的人很少。饶宗颐教授也曾经在香港大学当过一任“无讲座的教授”。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他有事去香港政府某一部门。当事的职员询问他的职业，他回答说是大学的“Reader”。当事职员请他不要开玩笑，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读者，读者哪可以算是一门职业！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到了80年代后期，香港大学就索性把“Reader”这个称号中译为“教授”了。

虽然我的职称和李约瑟的相同，可是在职权和职务上却有很大分别，这是剑桥古老大学体制的一个特点。在职务上剑桥大学的“Reader”享有不寻常的自由，除了授课以外，他可以选择不过问校政，指导研究生也全由自己决定不受单位主任所管，连个人的研究项目也可以超出单位

[1] 后来不少英国式大学在教授和高级讲师之间加上一个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职位，同时提高 Reader 的待遇使它和副教授相等，遴选条件依旧。

本身的学术领域。除了牛津和剑桥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大学的“Reader”可以享受这些特殊条件。凡事都是有其利必有其弊。李约瑟是一个好例子，他尽量使用他的“Reader”权利以撰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先讲利的方面。这实在是太大了。假如没有剑桥大学给予“Reader”这样的特权，李约瑟就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岗位而投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假如把他的才能和际遇看作为得天时，那么他在剑桥大学的“Reader”职位就可算是得其地利了。弊是在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李约瑟用他的特权，不参与生物化学部的行政，不在实验室做研究，不指导生物化学研究生，不参与同仁的一切活动，只在他的授课时间向学生讲课。他的同仁就须分担他不愿意做的工作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博取同仁们的友情的好办法。李约瑟研究的科技史跟本身单位的生物化学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单位的主任没有权力以生物化学研究的经费作为别的用途，他也不能向大学当局申请经费以资助与生物化学无关的研究。因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计划没有获得剑桥大学当局的资助。

在英国外的华人社会中，有些李约瑟的朋友和同情他的学者们都责怪剑桥大学没有提升李约瑟为讲座教授。不错，在他们所知道的大学中，以李约瑟的成就，他当讲座教授应该是绰绰有余。[1] 可是谁会想到，在生物化学的单位中李约瑟早已经做了选择呢？他已经舍生物化学的“鱼”，而取中国科学史的“熊掌”了。当这个单位的主任杨（Frank Young）讲座教授退休时，李约瑟已经20多年没有在生物化学实验室出现做研究了。接班人是李大斐从前的一位高足，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也曾任过剑桥大学某学院的院长职。

虽然李约瑟放弃生物化学，但他成功地成为了研究科学史的一个权威人物。有人问为什么剑桥大学没有提升他为科学史讲座教授或者中文讲座教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剑桥大学的制度。剑桥大学的“Professor”都是讲座教授，当时每个单位仅置一席讲座教授。讲座教授其中大部分是拥有“赠予资产的讲座”（endowed chair）；还有些是来自皇室的“皇室讲座”（Regis Professorship），例如，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哲学教授、历史教授、医学教授等都是皇室教授，在大学典礼行列中，排行在其他讲座教授的前头。我们所共知，世上许多事情要靠天时、地利与人和。剑桥大学没有提升李约瑟为讲座教授，问题不在李约瑟本身

[1] 这个事情连李约瑟本人和鲁桂珍都心感不满，偶有怨言。

的实力，而在许多其他的因素。假如大学要提升某人为中国科技史教授，首先必须有人向大学当局赠予一大笔基金，作为创立这个讲座的费用。没有大笔基金用来创立新讲座，大学就不能提升任何人为中国科技史教授。我想起郑德坤。他也是一位杰出的Reader而没有被大学提升为讲座教授。当时的剑桥大学没有任何一个华裔学者享有讲座教授的职位。在这方面，他和李约瑟都是拥有天时，但不得地利与人和，真是可惜。

剑桥大学有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系。当初仅聘请一名普通的“Reader”担任系主任职，名气比不上李约瑟享有的生物化学“拥有赠予资产的职位”（Endowed Readership）。李约瑟对它当然不感兴趣。后来随着这个学系的发展，在聘请下一任的系主任的时候，职位就提升为讲座教授了。该系的同仁向大学当局建议聘请一位科学哲学专家。有人说这是为防止李约瑟申请这个职位。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也大概没有这回事。因为这时李约瑟已届大学的退休年限了。何必多此一举呢？

我在新加坡的“Reader”职务不仅包括开物理学课和参与系内一些行政事务，还须安排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科学哲学方面由哲学系的同事主讲。我认为自己的科学史研究项目，不宜离开物理学太远，而且我还须整理我的博士论文，寄往巴黎出版。因此我以前在剑桥对《道藏》的研究也暂告一段落。1960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大学职位提升的同时，五弟河通也医科毕业，我的家庭负担也减轻了。同年七月，三女淑姬诞生。我也开始购买一些股票。生活上我们已经感觉安定了。就在我认为我跟李约瑟的合作已经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李约瑟的来信说他收到由伍连德博士向新加坡李光前博士申请的一大笔资助，因而希望展开一些由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主持的筹款活动。为了筹款，他想把合作者的照片登载在介绍《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小册上。册子登载着他和他的四个早期合作者鲁桂珍、王铃、罗宾逊和我的照片。在李约瑟的心中我依然是他的合作者。这一年，中山茂和王铃先后到新加坡来访。

1961年，一位数学系的同仁温丽蓉（后来从夫姓蓝）找我做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她是陈嘉庚的一位外孙女。她的研究主题是宋代末期数学家杨辉的著作。后来她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2001年，她从大学退休后在墨西哥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史奖的梅奖牌（Kenneth O. May Medal）。

马来西亚在1963年宣布独立，这个新国家包括马来亚联邦、新加

坡、砂劳越和以前的英属北婆罗州。1962年，随着政治局势的演变，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分校改名为新加坡大学，而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分校就成为马来亚大学了。同年，我首次去美国，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和费城两地召开的第10届国际科学史学术会议。我宣读了一篇关于越南古代天文记录的拙作。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的主编也在场听讲，会后向我索稿，登载在他的学报上。[1] 薮内清和中山茂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我跟薮内清同住在一栋宿舍，并和他同机飞往三藩市（编者注：即旧金山）和夏威夷，大家变得很熟悉。

我在费城的时候还为《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受李约瑟所托而拜访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舒勒（Cammann Schuyler）博士。虽然《中国科学与文明》在第三册出版以前已经受到批评，但批评者没有涉及科技史的内容。舒勒写的书评指出〈数学篇〉中的两个错误，一个是把李俨的名字写作“Li Nien”，另一个是关于其中一个纵横图，此外他还补充他本人对传统中国纵横图的观点。李约瑟希望我见过舒勒后会写一篇文章替他的〈数学篇〉辩护。这份差事我做不了，我只能向舒勒解释说李约瑟大概是听到一些讲江苏方言的人，才把李俨写作“Li Nien”。可是他的写作系统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一来，以后就不好把它改过来了。我指出所争论的一个纵横图同是根据有误字的印本，与李俨所根据的原来写本不符。舒勒乐意接受我的解释，我就把和舒勒的谈话向李约瑟交差。我从美国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博士候补生正在等着我。中山茂曾经向我推荐这位研究生。我跟他一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讨论孙思邈的炼丹术著作。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科技史权威的席文教授（Nathan Sivin）。

以文会友：中文写作的开始

我在新加坡的时期，校内外一切公文以及学术性的写作，全部都用英文。英语是官方语言，除了家书之外，我很少有机会用中文写作。1960年，我教医学院第一年级的物理学课程。有一位同学连思亮的家长连士升先生是当时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总编辑。[2] 他听说我曾经在剑桥与

---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64), “In fluence of Chinese Astronomy in Mediaeval Annam”, *Actes 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59-563 和 Ho Peng Yoke (1964), “Natural Phenomena Recorded in the *Dai-Vie’ t Su’ -Ky Toan-Thu’*, an Early Annamese Historical Sour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 127-149。

[2] 连思亮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英国深造，专攻妇科，后在新加坡执业行医。

李约瑟合作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就约我替他的报章的〈新年特刊〉写一篇介绍李约瑟的文章。我抱着练习用中文写作的心情，以文言文写了一篇〈李约瑟博士小传〉来交卷。从此我就和这位总编辑结交，每年要向他交卷一次。那时新加坡有两大华文报章——《南洋商报》和其对手《星洲日报》。我在大学的某委员会的会议上认识《星洲日报》的经理廖颂扬先生。他看到《南洋商报》登载的拙作，便也向我索稿。我不便厚此薄彼，也答应了他，从此每年我就有机会练习用中文写两篇文

黛谷來鴻

子雲兄：

由本月三日得閱你給令嫒的信，知道她的學業天天有新的進步，可喜可賀！

你時常提到小弟，作為學習物理學的模範，使我覺得萬分慚愧。記得十九年前當我剛畢業物理學榮譽學士課程後，自己以為對物理學已經有多少認識，為著要滿足我的求知慾，就繼續留在大學從事物理研究。但是獲得碩士學位後，并沒有覺得增加了更多知識，而且發現到有許多我還未知道的，因此決心再求深造。後來獲得哲學博士，可是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博學之士」，反而感覺到太「狹隘」了，直到今年在新大領受科學博士學位時，我更認得自己的知識實在是太渺小，再一層了解「學無止境」的格言。

在物理學方面來說，我幾乎成為一個門外漢。物理學日新月異，我在學生時代所念的物理，比在歐美各先進國家現在所教的已經顯然落後，豈敢向別人示範？

不錯，物理學是一門相當深奧的課程，但以令嫒的天賦和努力，他日超人的成就當可成定論。小弟以為最費神的階段就是決定進入研究院的時候，如果只是顧從個人的興趣和所在大學的方便，那就又當別論，否則就要面臨一連串的問題。

首先讓我指出兩個很少受歐、美、澳，各科學家所注意的問題，原因是根本上這問題在[illegible]的國家沒有存在，所以不常跟從亞洲的研究生討論過。可是亞洲的學者卻必需注意。

第一、物理學在理論物理、熱、聲、光、和電磁學，以及氣象物理學、地球物理學等，[illegible]有許多方面不受地域所限，可以在我國[illegible]行研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尤其是比[illegible]和更吃香的，例如：太空物理，核[illegible]，[illegible]儀器物理等，往往受數以億計的[illegible]所限制。有些問題又不是可以由一個人[illegible]研究的，獲得哲學博士後，如果決定[illegible]研究，必定要在外國長期逗留下去，這可以說是我國的一個大損失。如果立即回國服務，就要準備犧牲所學，而向別途發展，否則就會因為沒有機會在研究上邁進，自覺如「朱泙漫向支離益學屠龍」，學非所用，不久便會發現自己已比別人落後而失望，最後連進取的雄心也會失掉了。本來「哲學博士」只是一個入門階段，要點是看以後的成就。在今天已經出現一個「哲學博士學位還不夠」的觀念，在美國念物理學得到哲學博士後，如果打算在大學裏教書，多需要再拿到一份「後期博士研究金」Poat 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hip 來跟一位有聲望的物理學家繼續研究一兩年，然後才能在大學當一名助教授。

第二、特別是從一個新建國家的立場說，我們應該學些比較有實用的科目。這是很對的，但是有時我們未必懂得今天沒有用的學識，在明天是否絕對沒有用的。今天距今一百多年前，當時的英國首相會往參觀大物理家法拉第 Faraday 表演電磁場實驗，詢問那玩意兒有何實用？法拉第回答說：也許終有人來政府可以向這玩意兒徵稅。一百年前沒有人知道電磁場之廣大用途，可是今天無數的電器產品都是利用法拉第所作的實驗結果，而向很多工業發達國家，帶來一項極為可觀的稅收。何況有些今天有用的知識在明天可能會淘汰，而等於無用。例如昨天的一位研究蒸汽專家，今天便因為蒸汽機已被內燃機所代替，而縮到所學非所用，所以新興國家也應該容許一小部份學子「為學問而求學問」。

選擇研究範圍等於選擇地探礦，有些題目在論文完成後是不再能夠向內或向外發展而繼續研究下去的。好像一座探礦的礦場，終來還要再費不少心血另找目標。最理想的就是當初選定一處資源豐富的地方，用之不竭，採之不盡，可以一輩子受用。

另一個要動腦筋的問題是怎樣選定自己的研究導師。有些大學不是由研究生自己選擇的，這又當別論。最如意的事情是找到一位世界權威專家或一位名教授來做自己的導師。因為他們一言的路，可以使你茅塞頓開。再從庸俗的觀點來說，後來如果有所成就，他的一句話便可使自己一成名，和替自己在大學找到一個職位，真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否則在一位默默無聞的導師指導下，如非青出於藍，就難得有出人頭地的希望。可是有些名教授常指導太多研究生，有時一年間只有看到每位學生兩三次的機會；自己應該看清楚情形，或者請他的得力助手做導師比較合算。

你自稱一生僅在文字的圈子裏翻觔斗，可惜在科學家當中，很少人有這麼大本領，因此會利用筆路的科學家，起碼都勝人一籌。聽說四十多年前在劍橋大學跟隨生物化學一代宗師霍京士教授工作時，李約瑟已經顯示他的寫作天才，而使霍氏讚嘆不已。做一項科學實驗研究，往往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日，獲得成績後，普通來說，實驗者還要再費不少精力和時間，來寫一份數頁的報告。可是，李約瑟動筆太快了，從實驗室裏得來的成績，無法趕上他的筆。也許他就是等得不耐煩，才決意離開實驗室來專心從事著作。可見「文字」對科學家依然是必備的「利器」。

在文字圈子裏翻觔斗的人，還有一點比攻讀物理學的青年人值得告慰。物理專一個人的精力和冒險精神，有利於青年人。黃金時代大約是在三十，到四十多歲之間。但是文學就要看「火候」，可以在這圈子裏多翻二三十年觔斗，而且「老當益壯」。未知吾兄以為然否？敬候

撰安！

弟 文燾拜上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

（編者按：黛谷出自班黛谷 Pantai Valley，即馬大所在處，筆名出自「郁郁乎文哉」）

"黛谷来鸿"文

章了。

我跟廖颂扬的交往纯属公事性质，虽然我们有一两次同桌进餐。我后来离开新加坡，也继续保持书信来往，但不离每年一次约稿的话题。可是我跟连士升就几乎每年都有相见的机会。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常邀请一两位好友或学者共进午餐。例如，他多次邀请新加坡的著名医生魏雅聆做陪客，一起在一间名叫Troika的俄罗斯菜馆聚餐。魏雅聆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位心脏专家，因其父亲是一位中医，他对中医也有所涉猎。有一次，我邀请席文参加我们的聚餐，连士升对席文的普通话发音称赞不已。1964年，我转往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之后，我跟连士升还继续保持联系。《南洋商报》有一个〈海滨寄简〉专栏，登载他用"子云"的笔名而不具收信人姓名的信稿。[1] 其中有些是给他自己儿女的家信。有一次他的家信提及李约瑟和我两人。我兴之所至，在《南洋商报》用"文斋"这个笔名复他一函，登在了〈黛谷来鸿〉专栏。"文斋"这个笔名出自"郁郁乎文哉"句；"黛谷"指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所在地的班台谷（Pantai Valley）。

写白话文的开始

以上就是我在60年代用中文写作的过程。当初我用来写作的是文言文。我觉得身为一个科学家，也不是念华文学校出身的人，提倡文言或白话文都不属于我分内的事情。因为我写家书都使用文言文，于是我就依随我个人的生活习惯用文言文写作了。1963年初，我去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以"中国炼丹术中的长生不老仙丹"为题做一次公开演讲。我也抽空到我二妹润金家，见到妹夫王亚粲。妹夫是吉隆坡贩卖汽车零件南方公司的老板，学历大约是中小学程度，但商业上的成就还算不错。他对我说看过我在〈新年特刊〉所登的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十分好。我问他那篇文章好在哪里。他叹着回答说文章写得太深奥，他看不懂。他诚意恭维的话反而令我意识到文章是一种传达工具，在大众传媒登载一篇传达效果不佳的文章，不如不写。一言惊醒，从此我就开始练习用白话文写作了。我的妹夫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所听到父亲讲书时诵读的"三人

---

[1] 连士升的文集分散文、书信和传记三种。书信类是《海滨寄简》的文稿，他在世时一共出版五集。1972年出版的第五集《落霞集》是献给我的一部书。同年中秋，他来访吉隆坡亲自带书见赠。1974年出版的第六集《孤鹜集》在他逝世后一年面世。

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

新加坡服务的回忆

从剑桥回来后我在新加坡服务的四年多里，是我年富力强的时期，也是我最活跃、最可贵，而且毕生难忘的时期。我曾参与多种校内外的活动。我被作为校务委员会的代表委任为大学图书馆委员。理学院推举我为该学院公开演讲主持人。我的一些校外活动是代表大学参加的，例



Ref: Ed.1338/56 Vol.II

MINISTER FOR EDUCATION,
KAY SIANG ROAD,
SINGAPORE 10.

29th November, 1962.

Dr. Ho Peng Yoke,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luny Road,
Singapore, 10.

Dear Sir,

I am glad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appointed you a member of the Educ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with effect from 1st November 1962, in accordance with powers vested by section 8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2. I have also appointed you a member of the Education Finance Board under section 5 of the Ordinance.

3. I know I can count on your wide experience in educational matters to assist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Board.

Yours faithfully,

(Yong Nyuk Lin)

新加坡杨玉麟教育部长来函

如，我代表大学校长作为新加坡教育咨询会的委员。有些是由新加坡政府直接委任的，例如，新加坡教育部杨玉麟部长委任我作为教育部大学奖学金与补助金委员会主席，等等。我也当过吉隆坡马来亚联邦教育部考试委员会的顾问。在文娱方面，每年我代表大学参加对抗新加坡的西洋棋友谊比赛。有一年我代表马来亚大学毕业生参加新加坡西洋棋比赛，获得乙组冠军。在体育方面，我曾屡次担任马来亚大学网球俱乐部会长，常参加对外友谊比赛。每星期我有机会和几位朋友打网球，有时也到邻居的校友俱乐部打乒乓球。我也常代表医学院同仁参加对医学院校友的友谊乒乓球赛。我不仅获得新加坡大学校长的信任，而且校监李光前博士对我也很友善。大概他对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感兴趣。几年前伍连德博士曾请他捐了一大笔钱，帮助李约瑟撰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曾提及我跟李约瑟的合作。李光前博士是当时华侨银行的执行董事长。他多次邀请我跟林溪茂教授到华侨银行的餐室共进午餐。林溪茂教授当时任新加坡大学文学院院长，1964年升任大学校长。有一次我们在共进午餐时李光前博士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得力副手丹斯里陈振传。“丹斯里”（Tan Sri）是马来西亚元首颁发的勋衔，约等于英国的爵士。后来陈振传成为李光前的华侨银行接班人。我是他的长女念医科第一年班的物理学老师。蓝丽蓉是他次女的同学，也是李光前的一位姨甥女。这是20年后陈振传赞助建筑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缘由。1963年，我的四女淑苹诞生。正在我们打算在新加坡安居下来并且考虑参加大学同仁的一个购买房子计划的时刻，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突然来了邀请信，聘请我出任该校的中文系讲座教授。

第三章

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1962年，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创办中文系，聘请剑桥大学著名中国考古学家郑德坤博士为中文系客座教授，规划该学系的组织和课程蓝图。接着又聘得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明史专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为客座教授兼代理系主任。这时奥本涵老师任大学校长，黄丽松教授任理学院院长，而王赓武博士任文学院院长。1963年的下半年，我接到吉隆坡的邀请信，委任我为中文系的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

马来亚大学是一所英国式的大学，而英国式大学的所谓中文系在性质上与其他欧语系，如英文系、法文系等，分别很大。中文系的研究领域包括几乎一切有关中国的学问，如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等，可说是包罗万象，当然科技史也包含在内。所以西方式大学的中文系不像英文系、法文系等这么单纯。英国教育系统下的中文系，在性质上与中国内地和

台湾的中文系有所差别，若称为“汉学系”或是“中国学系”也许比较接近本意。在华人社会中的英国教育系统大学，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文系常会遇到相当复杂的问题。遴选中文系讲座教授时，大学当局通常都是以西方大学所讲的汉学为标准，有时还须顾虑当地华人社会的反应。在系的中文译名方面，还是依照中国国内大学的惯用名词；在聘请讲座教授时，也有企图达到两全其美。上文已经提及，马来亚大学还在新加坡创立中文系的初期，曾经邀请胡适之博士来校，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希望可以聘到一位享誉国际并受新加坡华人社会所欢迎的学者。但是遗憾的是胡适之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后来大学当局仅能从国外聘得一位高级讲师兼代理主任，10多年来没有成功聘得一位讲座教授。我猜想，大概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以新加坡为借鉴，认为从国外寻找一位中文系讲座教授是个难题，所以考虑到我这个物理系出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我并没有向马来亚大学当局提出申请这个职位。事后我才知道，校方按照手续，由遴选委员会确立一个候选人名单，选出一些比较理想的人选，通过校外咨询后，再举行一个面试，然后由理事会做最后决定。由于我不是一名申请者，大学不便请我去面试。后来我才知道1963年初黄丽松安排我到吉隆坡的演讲，就是用来代替面试。难怪事前他给我几位理事委员的名字，告诉我多些留意他们的发问。后来我也发现这次遴选的校外咨询者是哈佛大学的洪业（煨莲）教授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费子智（C. P. Fitzgerald）教授。接到马来亚大学的邀请信之后，我开始考虑去留这个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要继续研究中国科技史，在一个中文系的单位远比在一个物理系的单位有利，无须顾虑研究项目与物理学的关联。我觉得新加坡大学不大可能设立一个科学史系。[1] 这就是说，我没有被提升为科学史讲座教授的希望。至于物理系的讲座教授我就不敢设想，有了剑桥的经验我不想做一个不能受到国际物理研究学者同行尊重的教授。假如我去吉隆坡，我可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以中国科技史专业而任中文讲座教授的人，不会和其他汉学家以及其他大学中文系的学者相比。我要考虑的是三个方面的接受问题，这三点都同样重要，即①国际学界的接受；②政府和大学方面的接受；③当地华人社会的

[1] 我离开新加坡两年后，理学院的科技史与科学哲学课程果然被新任校长杜进才博士取消了。闻说是缺少学生选读这个课程。虽然杜是我做副讲师时代的邻居，平时跟他有说有笑，我却不方便和他谈起这件事情。

接受。①国际学界方面我觉得无论在新加坡或者是在吉隆坡都不成问题。哈佛大学的博士候补生也曾到新加坡跟我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我接到吉隆坡的邀请信不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也邀请我作为校外考试委员，审定一篇关于蔡元培教育贡献的博士论文。②在新加坡政府和大学方面我觉得毫无接受上的问题，我乐意参加受政府委任的各委员会，大学的主管对我都很好，校和系的同仁跟我和睦相处，同学们对我也相当友好。在吉隆坡方面，既然邀请我去担任讲座教授，必定已经预先得到政府和大学主管的接受。马来亚大学的教职员中不少是我以前在新加坡的同仁，我必须留意的是中文系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新来的，而且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作为他们的系主任，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学术领导（academic leadership）方面。因此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方向必得适应新环境，研究项目所须考虑的已不是和物理学的差距，而是和中国文化的距离。我应该尽量使我的研究项目和系中同仁的兴趣接近。例如，在研究《道藏》的过程中，我可以关心科技史的内容，而让某些同仁留意考证的问题。我也可以找出一些与文学和科技史有关的课题，和同仁们共同研究。至于同学们我有信心可以应付。我最担心的是③华人社会的接受问题。在新加坡的物理系，华人社会的接受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在吉隆坡我就要考虑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否可以接受一个受英文教育、而对中国传统的琴、棋（西洋棋不算在内）、书、画一无所长的华人中文系讲座教授。我想到我有三个有利条件可以补救，以后只靠自己的努力事情就好办。第一，《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个大报章已经登载过好几篇拙作。连士升不时发表对我的好评，在传媒方面我已经有一定优势。第二是我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对华人来说这是一门新鲜而有魅力的项目。第三是我跟王宓文伯伯的关系。战后他曾任马来亚联邦的华文总视学官，退休后任柔佛宽柔中学校长，是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人物。我觉得我具有比较容易和华文教育的人士接近的条件，不难获得他们的接受。经过以上的考虑，我就向新加坡大学校长斯里娃散（B. R. Sreenivasaan）医生提出辞呈。当时他也是准备辞掉他自己的校长职。1964年4月，我离开新加坡大学，前往吉隆坡赴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职。我很幸运获得傅吾康客座教授的友善帮助，使我了解欧美汉学界的情况。系中同仁比我早上任的有高级讲师程曦和讲师陈启云两位。傅吾康是汉学界的著名明史专家，对目录学和华文教育研究也感兴趣。

程曦精于中国文学与诗词。陈启云则正在撰写将向哈佛大学提呈的关于汉代思想的博士论文。郑德坤博士也常跟吉隆坡的中文系保持联系，利用剑桥大学的休假回来任客座教授。我认为在应付欧美汉学界方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已经下了足够功夫，我需要尽力的方面是搞好中国传统中文系。我上任不久就据王宓文伯伯的推荐，聘请了先后在中国台湾师范大学和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任教的文字学专家陈铁凡，接着我又从台北聘请敦煌专家苏荧辉来系增强教师阵容。在客座教授方面我先后礼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兼台湾大学教授的庄子研究和校雠学专家王叔岷先生和国史大师钱穆博士来系。

我筹备礼聘王叔岷教授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有趣事情。1963年，负责招聘我来马来亚大学的事务是王赓武文学院长。我上任时王赓武已被提升为历史系讲座教授，文学院长由地理学系讲座教授何源海（译音，Robert Ho）接任。不久这位院长向大学提出辞呈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地理教授职。文学院长就由印度文系讲座教授塔尼纳亚伽姆神父（Father Xaviour Thaninayagam）补缺。1965年，我向大学申请三年经费以礼聘王叔岷教授任中文系的客座教授。申请书中说明我的理念，希望引进中国大学系统的学者，使中文系内的中西两个系统获得平衡。奥本涵校长很赞同我的要求。他马上召开一个由校长、文学院长和中文系主任三人出席的小组会议。这个会议费时仅几分钟。校长先询问文学院长的意见。院长微笑回答说，很好，但补充说，希望校长能配给文学院的其他学系每单位一位客座教授以示公平。我看到校长面有难色，就问院长，假如经费是从外来的他是否有意见。院长笑着回答说，他不会有意见。校长眼望着我，面带微笑宣布散会。我回到办公室，立刻写信给新加坡的李光前博士求救兵并说明原委。李光前博士没有跟我直接回信，可是一个星期后，马来亚大学的教务主任接到李氏基金来信，说是愿意资助王叔岷教授当中文系的客座教授，而且不限于资助三年的任期，任期可以由校方决定。校长又召开了一个三人的会议。他面带笑容宣读李氏基金来信后，就问文学院长的意见。院长也带笑回答说，很好。校长就宣布聘请中文系客座教授提案通过了。

马来亚大学初期的回忆

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服务的九年中，以最初的五年最为值得怀念。

试引一位老同事的一席话。陈启云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纳分校所写的一篇回忆文说：[1]

> 马来亚大学初期的回忆：
> 我想起来，倒觉得在马来西亚的几年，在个人生活上，是一段很有意义和很有趣的历程。在马大，傅（吾康）教授以德国汉学界老前辈的身份讲授汉学导论驾轻就熟；程曦先生诗词歌赋戏曲样样精通，由他主持中国文学，真是左右逢源。我则1960年开新亚书院教席以后，这次重返东方教中国古代史及专门史籍，特别有劲。傅太太、曾华胜太太和俞王纶女士教授中国语言更是经验丰富。王遵侗女士处理图书馆中文部筚路蓝缕以启先河，替马大图书馆打好日后的根基，更加上郑德坤先生的考古美术，王赓武先生的五代史和南洋史，何丙郁先生由物理学而钻研的科学史；后来再请的校勘名家王叔岷先生，和国史大师钱穆先生到来担任客座教授，真是极一时之盛，比美海内外一流大学的中文系亦无逊色。

当时加入中文系授课阵容的，还有前文提及的陈铁凡和苏荧辉两位同仁，以及印度文系主任塔尼纳亚伽姆教授和任职美国耶鲁大学地理系客座教授的中国地理专家——卫海楼（Harold Wein）。陈启云以上回忆所记的是1963年至1966年间他在任时期的事情。其后，中文系也聘得曾咏心、麦德莲（Magdelene DeWall）和郑良树三位博士，和杜比（William Dolby）、徐士文、陈璋、马承骕四位先生作为讲师。陈启云所提及的傅太太和曾华胜太太之外还有何秀女士和吉隆坡最有教授华语经验的邢广生女士。我曾推荐后者做马来亚大学校长翁姑亚兹教授的华语老师。著名语言学专家周辨明博士也曾以客座身份加入中文系。陈世骧、李田意、柳存仁三位教授也曾担任中文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可惜昙花一现，陈启云离开马来亚大学两三年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后话。陈启云在同一篇回忆文中又说：

---

[1] 参阅陈启云（1981年）〈早期马大中文系的回忆〉，《寿傅吾康教授伉俪七十双寿祝贺册》（吉隆坡，非卖品）。

> 马大中文系创始的前几年，系中先生都是以客卿身份，与政治无所干预，个人学术背景虽然不同，教学的目标则一致，加上没有利益纠纷，大家相处十分和洽。授课之余，专心研究著述，工作之暇，旅游观赏各地风光，其乐也融融。

陈启云这几句话使我万分感慨。我认为当时能够独力承担校内外一切政治和多元民族的社会压力，令同事们得以专心讲学和做学术研究，是身为系主任的我对中文系所能做到的最大贡献。试举一个我从来没有对同事们谈及的例子。有一次我听说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陈志勤医生收到一封对中文系不利的信。他也是马来亚大学理事会的理事。刚巧我在一个结婚宴席中跟他同桌，约他散席后谈这回事。我知道他所受的虽然是英文教育，但热心于华人的事情，而在国会中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我先打听他所知的详情，问他的反应，然后向他解释中文系的情况，让他感到我们两人正在谈些彼此有共同目标而且相关的事情；我对他说我随时欢迎他的教益。事情就这样没有闹大了。事后我也没有跟中文系的同事们谈及这回事。

系主任当时有很大的权力。我在校政方面的声望很快越来越高，不久就被选入等于董事会的大学理事会，继后又当文学院长。权力没有改变我对他人的态度，尤其是对中文系的同事们，我从来没有用上司的口吻和他们讲话，有事由我的秘书传达在办公室召见，不如我亲自到同事们的研究室和他们相谈。同时我也把公私关系划分得一清二楚，公事只留在大学，按照大学的规定办理；回到家里，因公事找上门的人，并不多见，况且我内人美瑶对我的公事从来不过问。我没有染上华人社会常有的一些喝酒和打麻将的习惯，从来没有在同事们中遇到借醉闹事的事情。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常跟郑德坤、傅吾康等讨论各种问题。有些时候我还跟回教学系、印度文系以及理学院的同仁讨论学术问题。资深的中文系同仁当然有他们各自的研究项目。我指导年轻同事吴天才的中国历代钦天监研究硕士论文，也与他共同研究白居易和陆游的诗词与炼丹术的关系。另外有一位年轻同事洪天赐，征求我对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的意见。我向他推荐李约瑟以前提出的唐代僧一行的科学贡献项目。我分别与陈铁凡和苏莹辉两位同事鉴定一些炼丹术书的著成时代，校勘炼丹术典籍，和从类书中搜集所引的某些已经失传的炼丹典籍的断片。我也跟俞王纶一同研究《镜花缘》中所载有关科学知识的资料。我写学术报

告所用语言，主要是英文，尤其是在国际性的学报上登载的文章。但我没有忘记，身为中文系讲座教授，有时还须以中文书写一些文章。偶尔我还用日文在日本的学报登载文章。西方的汉学家都有阅读日文的能力，我不想示弱。[1]

大学行政

我认为大学行政是学者一件能免则免，但又不能避免的事情。假如不能避免，就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系里的行政当然是系主任的职务，绝对不能避免。可是还有关于各学系的行政，以及关于整个大学的全校行政，都可能涉及本系的利益。单位以及人际关系就会引起所谓“大学政治”(university politics)。这并非任何一个大学的专利。

大学的最高行政机构是等同于董事会的大学理事会，其下最高教务机构是相当于教授委员会的大学评议会。教授是评议会的当然委员，而当时马来亚大学理事会有两名委员是由评议会选出的代表。1965年，代表评议会的其中一名告缺。闻说候选人是曾和奥本涵爵士竞选校长职的一名外来的理学院教授。几位评议会的委员，包括医学院的院长来找我，要把我提名作为候选人跟他竞选。结果我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入选，任期两年。

1966年，马来亚大学校长奥本涵爵士荣休，校长职务由黄丽松教授代理一年。这时马来亚大学出版社一切出版都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代办。有一个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小组，由马来亚大学校长任主席。黄丽松委任我作为他的代表，任这小组的主席。出版书籍绝大部分都和东南亚地区有关。他也委任我代表他作为香港大学陆佑奖学金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当年没有召开委员会会议。1965年，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三国组成一个东南亚国家联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ASA)，这是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前身。1966年，我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参与在曼谷召开的第二次ASA教育会议。1967年，又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在马尼拉参与第三次ASA教育会议。此后ASA便解散了，被东盟取代。

[1] 参阅何丙郁（1972年），〈マラヤ大学における科学史の位置にかする报告〉，《科学史研究》11: 92-94。

1967年的上半年，塔尼纳亚伽姆教授的文学院长任期行将届满。文学院成立的初期，教授们很少愿意当院长。何源海当院长时曾说院长不过是学院中的“首席童仆”（Top Office Boy）。院长任期制定是三年一任，可是初期的文学院院长都是任满前借故自动卸任。当时文学院共有八个学系。有一个晚上，三位文学院系主任来访，劝我出任文学院院长。我答应出任一年，以1958年下半年须回剑桥作为借口。1967年4月，我接任文学院院长。这一年李约瑟也被选为剑桥凯思学院的院长。马来亚大学也来了一位任期一年的校长。他是从牛津大学聘来的物理学专家格利斐斯（James Griffiths）博士。上任不久，他就召开一个院长会议，讨论一封来自校监（Chancellor）的信。校监是马来西亚首相东姑亚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本人。信中说菲律宾总统马克斯（Ferdinand E.Marcos）将访问马来西亚，由于马来西亚首相访问菲律宾时曾被授予一个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建议马来亚大学做回敬，授予马哥斯总统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格利菲斯校长说，虽然首相讲的是一个建议，其实是一个命令，他就用同一口吻，建议文学院院长担任授予马哥斯总统荣誉法学博士的致词人（Public Orator）。这也是一个命令，马哥斯总统站着听我讲15分钟的赞词，事后向我道谢。

在学术方面，除了1965年和1967年两次访问美国所发表论文和与中文系同仁合写的论文外，我还替美国的《科学家大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撰写五篇文章。[1] 196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参与一个由黄道章博士主持的中国科技史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一篇有关《本草》所载化学资料的论文。[2] 20世纪60年代，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李约瑟和中国的学者们都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中所见到的仅有薮内清、中山茂夫妇、全相运和席文几位。其他几位与会者的专业与中国科技史没有直接关系。

---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71)，“Ch’ in Chiu-shao，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Mathematician”，*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Baltimore)，3: 249-256; Ho Peng Yoke (1971)，“Chu Shihchieh，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Mathematician”，*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ibid.* . 3: 265-271;Ho Peng Yoke (1973)，“Li Chih，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Mathematician”，*ibid.* 8: 313-320; Ho Peng Yoke (1973)，“Liu Hui，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Mathematician”，*ibid.* 8: 418-424 及 Ho Peng Yoke，“Yang Hui，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Mathematician”，*ibid.* 14: 538-546。

[2] 参阅 Ho Peng Yoke(1958)，“Alchemy of Stones and Mineral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s”，*The Chung Chi Journal*，7: 155-170。

DFA 6.22/68
SECRET

25th March, 1968.

The Chairman,
Vice-Chancellorship Committee,
University of Malaya.

Dear Tan Sri Ismail,

It is a pleasant surprise to be informed by you that my name is among those being considered fo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new Vice-Chancellor. I have the pleasure to submit my curriculua vitae as requested. I wish to thank the Committee for the honour they have given me by considering my candidature. However, I feel that at my present age I have more contribution to make to the academic world as a scholar rather than as an administrator, and, as such, I wish to request the Committee not to consider my case any further.

Thank you once again.

Yours sincerely,

(Professor Ho Peng Yoke)
Dean,
Faculty of Arts.

encl:

自愿放弃作为马来亚大学校长候选人

1968年，格理斐斯校长任期届满。马来亚大学理事会再来一次进行遴选新校长的过程，希望从国内获得适当人选。我接到理事会会长一封信，说我的名字在候选人名单之上，希望我提供一些遴选小组所需的资料。我立刻回信说，我感到很荣幸我的名字被列在名单上，但我希望在还年轻的时期多致力于学术研究，恳请在校长候选人名单上除名。同时我另写一封信向大学当局申请八个月的带薪研究休假，再度去剑桥与李约瑟合作撰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动身去英国前我还须卸下我的文学院院长职责。

视野的展开与国际关系

我在新加坡的时期，仅在学术交流上先后到过英国、西班牙和美国，

而去过中国香港、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孟买等地旅游，那是井中青蛙出井的初试跳跃。自从在吉隆坡任职后，我的出国机会突然增加不少，大大拓展了我的世界视野。上任后不久，我代表马来亚大学参加香港大学主办的一个校外课程组织研讨会。我还被邀请参加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Robert Black College）的奠基典礼，真想不到20年后我会出任该学院的院长，也不知道该学院的主要赞助人邓肇坚爵士（Sir S. K. Tang）是先岳的挚友，40年代同任香港东华三院的董事。陈启云安排我会见他的老师钱宾四先生，蒙他招待在新亚书院进午餐，并由他介绍认识好几位该书院的学者。

担任大学的职务后，我常和外国使节有来往。我协助美国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美马协会、亚细亚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美孚汽油公司（Esso Company）等，遴选并资助马来西亚的学生往美国升学。法国的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caise）也同样得到我的协助。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派遣和平部队（Peace Corp）的青年日语女教师在马来亚大学执教。那时马来亚大学还未设立日文系，也没有语言中心。我就让这些日语教师列在中文系名下，把中文系作为她们的临时单位。她们跟中文系的同仁相处和谐。我跟她们用日语交谈，得以练习我的日语。傅吾康是德国的名教授，他的父亲傅兰克（Otto Franke）教授曾任德国驻华大使，也是一位著名汉学家，许多德国汉学家是他以前的门生。驻吉隆坡的德国大使和傅吾康很友好，过境的德国汉学家也常来拜访傅吾康。通过傅吾康，我跟德国的使节以及好几位过境的德国汉学家建立了一些关系。60年代中期，中国的驻马来西亚使节是由台北派来的张仲仁总领事。中文系同仁中有三几位，如陈铁凡、苏荧辉等，和他交情较好；他的千金在中文系念学士学位。韩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的长子也在中文系念学士学位。这几个外交使馆，每逢他们的国庆日，都寄来请帖，约我夫妇俩参加他们的招待会。我们尽量应约。我也收到来自一些其他驻吉隆坡外国使节的类似请帖，我的立场是，我并非外交官，这类的应酬该适可而止。

1965年是马来西亚脱离英帝国宣布独立的一年。年初，我获得美国纽约卡内基会旅费（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Travel Grant）补助金访问耶鲁大学的科学与医学史系和东亚学术评议会（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科学与医学史系的系主任普莱斯教授是我在新加

坡莱佛士学院念书时期的应用数学老师。当时他是一位研究物理热学的伦敦大学哲学博士，1949年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研究科学史而再取得一个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去美国。在剑桥的时期他曾跟李约瑟与王铃合写过一部《*Heavenly Clockwork*》（天文钟）。他也曾给予我诸多鼓励。东亚学术评议会的会长是研究唐代的著名历史专家瑞德（Arthur Wright）教授。

我动身前夕，傅吾康给我一份留美汉学家的名单，说大部分的汉学家都集中在美国，建议我有机会应该跟他们会面。我和美瑶搭机经由香港和檀香山抵达三藩市，停留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园内的杜苒旅馆（Duran Hotel），首次看到学生示威运动。我们在大学访问陈世骧，他做东道带我夫妇俩到三藩市吃中国餐，并请得赵元任教授夫妇做陪客。我本来打算邀请陈世骧到吉隆坡作为中文系的客座教授。谁知他回答不能抽空，反说欢迎我到他的单位访问当客座。

耶鲁大学安排我住在研究生大楼（Hall of Graduate Studies）的一个单位，在洪绂教授住所的上层。洪绂教授是耶鲁大学地理系的客座教授，是洪煨莲教授的胞弟。我们常邀请他上来我们的单位共进晚餐。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康桥见他的哥哥。洪煨莲教授留我们在家吃晚餐。他还打电话约杨联升教授做陪客。可惜杨联升有事，当晚须得主持李济博士的演讲，不能赴约。20年后我才有机会在香港郑德坤家和杨联升一见。我们在康桥见到席文夫妇，访问哈佛大学时由梁肇庭博士介绍会见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访问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时候会见了裘开明先生。耶鲁大学的斯特聆图书馆（Stirling Library）就在研究生大楼附近，中日文藏书很丰富。我每天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与医学史系里的一个研究室。我在医学院解剖学系讲堂做过一次公开演讲，讲题是中国的长生不老仙丹。我还和高卢斯坦（Bernard Goldstein）博士合写一篇有关公元1006年超新星的报告。[1]

我们在耶鲁见到李田意教授，邀请他担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下一届的校外考试委员。在康奈尔大学任电子学教授的堂弟何兆中来访，在我们的单位留宿一个晚上。我们去纽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原本希望拜见黄丽松的一位朋友蒋彝教授。蒋彝刚外出，由他的同仁夏志清教授招待我们在金竹餐室用午餐。我在剑桥认识的一位朋友帕逊斯（P. W.

---

[1] 参阅 Goldstein，Bernard R.and Ho，P.Y.(1965)，“The 1006 Supernova in Far Eastern Sources”，*The Astronomical Journal*，70. 9: 748-753。

Parsons）邀请我们往纽约哈佛大学毕业同学俱乐部（Harvard Club of New York）共进午餐。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居然有一个1945年我在怡保所教姓胡的学生Bevan Foo找上门，约我们去唐人街喝早茶。他任泛美航空公司的工程师。我们乘搭从纽约飞往三藩市TWA班机在纽约机场尚未起飞的时候，在机上又遇到他，还以为他是同机乘客。他却说是来送行的，由于他是泛美的工程师他有权登上机场上任何航空公司的飞机。

从美国返回吉隆坡途中，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顺道访问日本。1962年，我乘搭日本航空班机飞往美国洛杉矶期间，曾在东京银座日航旅馆停留一晚，但却纯粹是过境性质，没有去观光。这次访问东京和京都，是为向中山茂查询一些古代日本天文资料，并拜访薮内清教授和访问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京都蒙薮内清教授在京都饭店（Kyoto Hotel）设宴招待。我们从京都往神户，拜访神户大学经营学部的胜吕弘教授。他是日治时代怡保霹雳州日本语教员养成所的所长。他召集以前在怡保的同事来会见我们。这也是他们战后首次在日本相会。从此他们就每年聚会一次，称他们的聚会为“一步会”，共同游览和聚餐，以怀念在怡保的日子。当晚小寺三郎在神户的神仙阁设宴。在奈良和大阪观光后，我们从大阪乘搭飞机路经香港返回吉隆坡。

飞机着陆前，从吉隆坡郊外上空望见我们在八打灵花园（Petaling Garden）170号新盖的房子。马来亚大学是一个新大学，大学所建的教师宿舍供不应求，我们住的宿舍是从外面租来的房子，比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大学8号屋子要小得多。等待较大的大学教师宿舍又不知要等多久。我们就决定盖自己的房子。刚巧盖房子的李姓建筑师自我介绍说，他是1945年我在怡保教中学时的学生。我就把督工等一切事情拜托给他。房子在我



1965年在吉隆坡八打灵花园首置的产业

们启程往美国时动工，回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入住了。这是我们拥有的第一个不动产。搬入新房子后我们可以过一段安定生活。三弟耀南也从怡保移居吉隆坡在马来西亚政府财政部任职。母亲也常来吉隆坡住在我家。

迁入新居不久，马来亚大学征聘中文系讲师，我须前往香港和台湾，会见申请者。美瑶陪同我做此公务旅行。香港大学罗香林教授替我准备一个办公室作为会见申请者之用。驻吉隆坡总领事张仲仁先生替我订台北馆前街的中国饭店，并且安排教育部招待我。这次聘得敦煌学专家苏荧辉先生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服务。此行所获颇丰。50年代初，我在新加坡服务的时期，已经认识王叔岷教授。这次访问台北获得他的热情招待。访问"中央研究院"时他介绍我认识钱思亮院长和韩国的陶渊明研究专家车柱环教授。他在台北的峨嵋餐馆宴客，由他介绍认识台静农、毛子水、张敬、屈万里、李孝定等诸位名教授。最难忘的是我有机会拜见我听过多次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世伯梁寒操老先生。我去"中国广播电台"拜访他。他是先父的知交，曾在20年代先父结婚时担任伴郎。我们也抽空到日月潭一游，寄宿在涵碧楼。

在吉隆坡任专职的两三年期间，我每年还回新加坡大学一次讲科学史课。1966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新加坡大学校长林溪茂博士向我提议，希望我返回他的大学任中文系讲座教授。林溪茂校长是我多年朋友。我坦诚回答他说，也许我可以勉强胜任这个要职，可是要我来新加坡解决他的问题就等于引致同一个问题在吉隆坡发生。我建议不如由我提出三位中文造诣比我更高的学者，让他考虑。我提供的名单中，一位是在香港，一位在台北，另一位在韩国首尔。经过一天的考虑，林校长说，台北这位学者学履很好，但可惜新加坡大学的退休年限是55岁，他已经超龄，不受考虑。他也担心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不容易接受一位韩国学者任本地的中文教授。他可以考虑的仅有香港这一位学者。于是我再向他建议邀请当时正在访问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钱宾四先生和剑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两位学者作为校外咨询专家，以满足华人社会和西方汉学界的要求。林校长接受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建议。新加坡大学聘请中文系讲座教授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回吉隆坡参与一个国际泰米尔学术研讨会，宣读一篇有关印度科学史的论文。[1]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67)，"Indian Science in East Asia"，*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eminar of Tamil Studies*，*Kuala Lumpur*，17-23 April 1966，1: 39-52。

1967年，当我正在文学院长办公室考虑是否要向大学申请假期和旅费，以便去美国出席一个亚洲和北非洲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校长室突然来电话说，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来电话，探听文学院长是否有意访问美国，假如有意思的话，大使馆当年度有剩余经费可以动用。我乐得接受这个提议，于是在“领导人和专家项目（Leaders and Specialists Program）”下访问美国。我从三藩市转机往华盛顿，国务院派人接机。我到国务院后得知，国务院已经安排我去参观史密逊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e），并替我安排入住温莎旅馆（Windsor Hotel）和向国际亚洲和北非洲学术会议报名。我就在华盛顿代表的名义下参与在安雅波（Ann Arbor）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举行的这个国际会

June 8, 1972

Professor Ho Peng Yok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Box 4, P.O.
Canberra, A.C.T. 2600

Dear Professor Ho: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a copy of your recent monograph on the Crab Nebula. It is certainly tangible evidence of cooperative academic effort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I am very pleased that your travel grant facilitated the interchange.

I hope w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when you return in September.

Sincerely,

Jack W. Lydman
Ambassador

驻吉隆坡美国大使的回函

议。我在会场宣读报告时《亚洲历史学报》(*Journal of Asian History*)的主编也在旁听,会后向我索稿。[1] 我在会议上遇到许多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也见到好几位旧友。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黄麟根博士也出席了这个会议。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谈及联合国代表的分别。美国和苏联代表的发言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各国代表关注的中心。小国代表的发言仅能获得礼貌上的注意,影响力很微。散会后我去纽约,我的朋友帕逊斯安排我住在纽约哈佛大学毕业同学俱乐部。他带我去纽约市立图书馆,连同该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三人共同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天文学史的报告。[2] 这篇报告在英国的《天文展望》学报发表后,我将一份抽印本寄往驻吉隆坡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给我回信说这是一个两国之间学术合作最有实质的证明。当时我正在休假,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为1972年度的亚洲学人。

第二次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

我在马来亚大学的服务条件很不错。本来我欠下新加坡大学一笔"六年服务债"的项目,从新加坡大学离职后,本该还须再服务两年多,才可以清还这笔债项。经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大学的交涉,我去吉隆坡赴任时一切已经一笔勾销。因此在吉隆坡服务三年后,我就可以向大学申请六个月的带薪休假以及出国研究的旅费和生活津贴。就在这个时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来了一份邀请信。由于萧公权教授的荣休,邀请我往西雅图讲授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史课程。但我跟李约瑟有约在先,只好婉拒这个去美国的好机会。1968年的上半年,我辞退文学院院长职,再度往剑桥协助李约瑟完成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五册〈炼丹术篇〉两分册的初稿。汉堡大学中文系和天文系联合邀请我去汉堡做一次演讲,并约我替该大学出版的《中国手册》(*China Handbuch*)提供两篇拙文。[3] 这一年剑桥成立一个东亚科学史信托会。我作为合约签名者的见证人。名单上仅有五位创立信托人。他们是乔治索博士(Dr George Salt, FRS.)、

[1] 参阅 Ho Peng Yoke(1969), "The Astronomical Bureau in Mi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 2: 135-157。
[2] 参阅 Ho, Paar and Parsons (1971), "The Chinese Guest Star of 1054 and the Crab Nebula", *Vistas in Astronomy*, 13: 1-13。
[3] 参阅 Ho Peng Yoke(1974), "Kalendar und Datierung", *China-Handbuch*, (Hamburg), 602-606 和 Ho Peng Yoke(1974), "Astronomie", *ibid*. 63-64。

巴比基先生（Peter George Burbidge）、鲁桂珍博士（Lu Gwei-Djen）、斯亚德先生（Eric Betrand Ceadel）和哈兰先生（Walter Brian Harland）。这次我在剑桥是李约瑟的客人，住在他凯思学院院长官邸（Master Lodge）的西厢。这是学生运动的时代，剑桥大学生抗议大学的某些传统作风。许多学院都受影响，唯独凯思学院得免殃及，这是由于李约瑟是知名的学生同情者，他以前常参与学生运动，学生们对他很客气。美瑶利用学校假期，带领奕康和淑姬来访，全家做客院长官邸的西厢。鲁桂珍取笑李约瑟说，当时凯思学院有三个“Master”，一个是他，一个是奕康，一个是他们有 Dish Master 牌子的洗碗机。[1] 过了几天，就轮到李约瑟开鲁桂珍的玩笑。在晚餐时他请各人起立，举杯庆祝英国多了一个洋鬼子，因为当天鲁桂珍入了英国籍。李约瑟向我解释说，鲁桂珍常笑他是洋鬼子，这是一个回敬她的好时机。

1968 年 8 月，我和家人共赴巴黎参加第 12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李约瑟夫妇和鲁桂珍也赴会，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我在会议上宣读一篇有关明代天文学的报告。[2] 奕康和淑姬还要赶回吉隆坡上学。巴黎的会议结束后，我们租一辆飞霞汽车从巴黎开往法国南部海岸的康成，然后搭火车进入意大利境去罗马。所以美瑶带领奕康和淑姬从罗马搭机回吉隆坡。在罗马机场和他们道别后，我乘搭火车从罗马去米兰（Milan）等候专车迎接我去比拉几噢湖（Lake Bellagio）美国洛克菲拉基金会（Rockefella Foundation）属下的塞波伦尼别庄（Villa Serbollini）参与一个道教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耶鲁大学的瑞德教授。我离开吉隆坡前已经接到邀请参与这个学术会议，席文也接到邀请。李约瑟很希望参加这个会议，可是没有接到邀请信。他和瑞德从来不认识，而且瑞德曾批评他的书，他不好意思自动向瑞德要邀请信。我知道这回事，就托席文跟瑞德联系。后来李约瑟就接到邀请信了。李约瑟和李大斐一起来塞波伦尼别庄，鲁桂珍自己回英国，到伦敦濮子明夫妇家度假。开会的时候，李约瑟和瑞德两人首次会面，一见如故。瑞德回到耶鲁大学后，就设法替李约瑟在美国筹款，以资助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大业。瑞

---

[1] 剑桥和牛津某些学院的院长称 Master，尚未成年的男童也称 Master。此外硕士和学校的男教师也称 Master。

[2] 参阅 Ho Peng Yoke(1971)，“Alchemy in Ming China”，*Actes X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Paris)，3A: 119-123。

德的一位高足李弘祺博士告诉我说，1976年的夏天，他曾回到耶鲁大学拜访他的老师，听到瑞德谈及筹备援助李约瑟的计划。不料过了几天瑞德在高尔夫球场上突然摔倒病逝。后来1977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史凌罗博士（Dr Cliff A.Shillinglaw）在纽约成立一个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分会（New York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Incorporation）。瑞德的逝世对李约瑟来说，可算是一个大损失。他生前是美国的一位名教授，同时也是一个美国富豪。得到他的热心帮助，许多事情可以水到渠成。他生前的同事普莱斯是李约瑟的一位热情支持者。普莱斯出任纽约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唯一科学史专业出身的成员。不幸他在1983年英年早逝。他的遗缺后来由席文补上。

言归正传，散会后我乘搭火车回英国，归途中适逢大雨，英国南部多处被水淹。抵达伦敦时天已晚，没有班车去剑桥，只得订旅馆住宿。这是一个星期日的假期，我花了三个多小时订旅馆和等候计程车。我记在心里以后不要在公共假期的傍晚抵达伦敦找寻计程车。回到剑桥不久，我要返回马来亚大学述职。我从剑桥回到吉隆坡，认为与李约瑟合作的事情已经美满完成了，谁知李约瑟有另外的想法。下文自有分解。

我从剑桥回到吉隆坡的时候，我再当选为大学理事会委员。我又一次接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邀请信，但暂时无法再向马来亚大学请假。马来亚大学在人事上有很大的变动。大学已经聘任经济学院的翁姑阿兹（Ungku Aziz）教授为校长，历史系主任王赓武已经转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而化学系主任黄丽松讲座教授也快要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翁姑亚兹校长上任不久，日本明仁皇太子和皇妃美智子1969年2月20日下午访问马来亚大学。翁姑亚兹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能用日语和他们交谈。在欢迎会上同学们唱日本歌曲。美智子皇妃跟着他们齐唱“椰の实”一曲。

黄丽松托我承继他的一份义务工作，加入在筹备中的拉曼学院（Rahman College）工作小组。小组的主席是房屋部长丹斯里许启谟（Tan Sri Khaw Kai Boh）。[1] 他直接向财政部长敦陈修信（Tun Tan Siew Sin）全权负责筹备这个学院。学院成立后，学院当局邀请我出任校长（Principal）。我表示不愿放弃马来亚大学的职位，经过丹斯里许启谟和

[1] 拉曼学院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一所大学。2003年它终于如愿成为拉曼大学（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我曾在此做过一次演讲。

马来亚大学校长的商洽，马来亚大学校长同意我兼职，但必须改职称为顾问（Advisor）或主管（Director），以示我的原职还是在马来亚大学。

60年代的最后一次访问美国

我在60年代一共访问美国四次。1969年，耶鲁大学邀请我去美国，做休谟讲座演讲。刚巧伦敦有两位申请中文系空缺职位的候选人和一位申请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空缺职位的候选人。我就取道伦敦会见了这几位申请者，替马来亚大学省了一笔召见申请人来吉隆坡的旅费。那时鲁桂珍刚动过肺部手术出院，我也顺便到剑桥一行看看她和李约瑟夫妇俩人。爱德华休姆讲座的主持人是瑞德教授。瑞德夫人玛丽瑞德（Mary Wright）也是耶鲁大学的一位名教授。我抵达耶鲁大学的第一天晚上，她请我看一部斯诺（Edger Snow）所拍摄的中国电影。第三天我做爱德华休姆演讲，讲题涉及《易经》与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关系。[1] 这次我仅能在美国逗留三四天，因为我要赶回吉隆坡，参加5月10日的大选投票。瑞德还请张光直教授送我一程到车站。我经由东京和首尔回马来西亚。

我到达东京就和中山茂联系，跟他一起去看东洋大学的八木江里教授。当时一个东亚科学史研讨会正在进行中。八木江里拉我进会场，要我用日语简单介绍我最近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原来1962年她在耶鲁大学获得科技史的哲学博士学位。她的指导老师是普莱斯教授，说起来异校同门，也可算是我的同门师妹，彼此不用客气。我问她有什么法宝把我放进已订的议程表。她笑着答道："这不成问题，议程是由我安排的。我只须把我自己的发言时间交给您就行了。他们随时可以听我讲话，这次难得有机会听您的报告。"后来，她还将我的英文原稿刊登在日本的学报上。

散会后八木江里和中山茂两人请我去东京的一间豆腐餐室吃豆腐。事后我去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探访新到任的新加坡驻日本大使洪国平教授。洪国平是我的老朋友，我结婚前跟他同住在一个大学宿舍。后来他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化学系讲座教授兼主任，也曾当过部长。

---

[1]Ho Peng Yoke(1972)，"The System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Chinese Science"，*Japa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11:23-39.

赴美前，韩国驻马来西亚崔圭夏大使，以家长身份，托我为他在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儿子探听留学英美的名大学手续，在我出发前他已经回韩国任外交部长职。[1] 我在首尔停留，就是为了向他报告考进英国的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以及美国的耶鲁大学的手续。

我在耶鲁大学时看到普莱斯教授。他说五月上旬将携同家眷访问吉隆坡，托我替他在马来亚大学校园里安排住宿。我预先约他一家到吉隆坡的丰泽园北方菜餐馆用餐。该餐馆以烧鸡驰名，烧鸡是普莱斯的两位公子最喜欢吃的中国菜。听到我要请客，他们都显出急不可待的样子。我回到吉隆坡就立刻和汤寿柏联系，请他安排普莱斯一家住在他管理的马来亚大学第二学生宿舍，并邀请汤寿柏夫妇做陪客，在5月13日晚上准备陪同普莱斯一家到吉隆坡市内的丰泽园欢聚。可是当天我下班回家，陪同美瑶往附近的一个超级市场购物，在回家途中就听到无线电广播传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消息。丰泽园的约会被迫取消了。闻说普莱斯的两位公子为着没有吃到烧鸡而哭了一场。

族群的斗争与社会荡乱

政治环境对学术风气有很大的影响。6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人口多过一半是马来民族，华人占大约三分之一，其他由印度民族和较少数的土著民族以及欧亚混血民族等组成。执政党是由马来人的巫统（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华人的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和印度人的印度国大（National Indian Congress）三党组成，而以巫统为领导的联合政党（Alliance Party）。1969年5月10日，全国举行大选，虽然执政党获胜，但失去不少下议院席位。5月13日发生族群斗争动乱，遭殃者多属华人，死者数以百计。政府立刻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由副首相敦拉萨（Tun Abdul Razak）兼任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主裁。紧急法令实行期间，暂停上议院和下议院一切活动。行动理事会成立了一个由65位成员组成的国家协商理事会（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暂代处理上下两议院的某些任务，以国会上议院会议室为开会场所。65位成员中，有13人是代表专

[1] 崔夏珪大使是以学生家长身份找我，他的公子念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他从外交部长升为首相，曾一度任韩国总统。

业团体的，其中两人代表全国的高等教育学府。马来亚大学校长翁姑亚兹是其中一名，我也被任命权充滥竽之数。我在协商理事会上数次发言，都是以各民族唇齿相依作为前提，每逢讨论如何促成某一经济比较落后族群的发展时，同时建议如何兼顾其他族群的利益。理事会也委任我为族群亲善小组的成员，旨在使各族群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1970年，敦拉萨继任马来西亚首相。1971年，他宣布解除全国紧急状态。这段时期马华公会的会长敦陈修信任财政部长。这是仅次于副首相的最高官职。他派人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就任内阁部长一席。假如我愿意，他可以向首相提出，首相就先委任我为上议院议员，然后任命我为部长，无须经历选举的途径。我委婉地回答说，我对政治是一个门外汉，仅愿在学术上有些成就，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心中想着，即使我答应做部长，这个部长职位也难保，不出一年半载，很可能有人要我另觅高就。我向马来亚大学校长报告此事。他说这是明智之举。真想不到我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四五年后竟然发生在这位在政界获得最崇高地位的马来西亚华人敦陈修信的身上。我对他充满同情。

去留的犹豫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总算没有虚度这段社会不安定的日子。这是不幸中的大幸。1969年，我获得新加坡大学的科学博士（D. Sc.）学位。这是英国大学制度的高级博士学位，不是靠论文，而是靠哲学博士（Ph. D.）后期的著述，经过校外考试委员的审定，认为对学术有一定的贡献才授予的。我的两位审订人是德国的天文学史权威哈多那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的薮内清教授。上文提及我再次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由于不能短期内又向大学请假，唯一办法是向马来亚大学提出辞呈。我没有考虑这个选择。1968年，我的文学院院长接班人是地理系的韩沙（Hamzah Sendut）教授。1969年，他受委往槟城（Penang）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校长职。这是一所新设立的大学，韩沙是创校的首任校长。他亲自来向我游说，希望我去他的新大学任物理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职。我坦诚地回答他说，虽然在校务行政上我有信心，也许我还可以开一些物理学的课，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将无法替他的大学在国际上增光。此外新加坡大学也在探听我的口气，是否愿意回去担任一个全职的理学院院长职位。可是我无意放弃学术研究的生涯，而扮演

一个大学行政官的角色。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也邀请我转校，到他的大学任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我回答说吉隆坡还有他以前托我替他办理的拉曼学院，事情未了，不便即时放下。其实当时我不忍离开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认为有留在该学系扮演一个"保卫版图"角色的必要。各处对我的看重和热情，大概是由于我的人缘还算不错。朋友们都认为我身处不利的环境，所以伸出援手。其实我在马来亚大学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我已经是该大学最资深的一个教授，而且已获得政府和校方的信任。

马来亚大学文学院内的"版图之争"

前文提及英国大学系统的中文系，性质上与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有所分别，英国系统的中文系往往与某些其他学系有"版图之争"的事件。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的历史系皇室讲座教授与中文讲座教授两人的大争论，认为中国历史是归属历史范畴。当初这类问题没有在马来亚大学出现，尤其是在王赓武主管历史系的时期，没有人会想到它。但自从族群动乱后，马来亚大学一部分教职员对国家的政事和大学的校务发生浓厚的兴趣。有些讲师以族群为出发点，参与校政和争夺政权，例如，院长的职位成为一个争夺对象。中文系所面临的不仅是"版图之争"，而且是"存亡之斗"。文学院中有些人企图把中文系的中国历史割让给历史系，中文归属语言中心，等等。我必得留下，尽力保卫这个中文系，以防它遭受解体的命运。我跟马来亚大学校长的关系相当好，而且我曾经把我以前被各处邀请的事情全部告诉他。这次我坦白向他表示，假如这类事情是出自政府当局或是他本人的意愿，我不想再留在马来亚大学作螳臂挡车的斗争。校长不但否认这类事情和政府或他本人有关，而且说他需要我的帮助，共同应付某些问题人物。

中文系幸得以保存，但是有些影响全校政策的大局问题，我就无能为力了。例如，大学的国内和校内公文、会议和授课语言都改用马来西亚的国语，即马来文。仅有中文系某些课程还可以保留使用华语讲授，英文系的某些课程也同样可以使用英语。[1] 校内的权力斗争，大大改变了校内的气氛。中文系本身虽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免不了蒙受外界的影

---

[1] 中国的普通话称华语。

响。这时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情况，和陈启云所怀念的，已经是两回事情了。王叔岷教授此时已离开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往新加坡南洋大学任职。

无忘学术研究

在当时大学的生活中，常出现一些争权夺利而与学术无关的争论，浪费不少宝贵时间。假如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与学术或中文系无关，我会在会议进行中掩耳不闻而写我的文章。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国际科学界对脉冲星有浓厚的兴趣。不少人认为古代天文记录也许载有一些有关脉冲星的资料，对发现新脉冲星有所帮助。1970年，英国伦敦物理学会邀请我替该学会的通讯，撰写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天文记录和应用的文章。文稿的一部分就是在校务常会开会中完成的。文中提到后来曾任新竹清华校长的沈君山博士当年在美国的研究成果。[1] 有趣的是这次刊登拙作的期刊，还以《二十四史》〈天文志〉中的一页作为封面。1970年，我被选为伦敦物理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London）。同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部李约瑟由王铃、鲁桂珍跟我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与西方的工匠》（*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2] 李约瑟在书的首页以“三人行必有我师”和在书的导言中以“同窗”来表达我们之间的关系。

1971年，李约瑟夫妇和鲁桂珍在前往中国途中访问吉隆坡，下榻寒舍。事前我曾经利用大学开会的时间，和大学图书馆馆长林必达（Beda Lim）合写一篇学术报告以纪念李约瑟这次莅临吉隆坡。[3] 李约瑟在马来亚大学做了一次公开演讲，由校长翁姑亚兹亲自向听众介绍，称他为知识分子的巨人（intellectual giant）。我也带他参观拉曼学院。我们招待李约瑟等三位在马来西亚旅馆（Hotel Malaysia）的丰泽园进晚餐，并请了几位朋友做陪客，包括马来西亚的大法官素菲恩（Justice Suffian）夫妇、傅吾康夫妇等。我们还在美轮旅馆（Hotel Merlin）的一个中国餐馆庆祝李大斐的76岁诞辰，由一位凯思学院旧同学姓蔡的医生做东。

---

[1] 参阅 Ho Peng Yoke(1970)，“Ancient Chinese Astronomical Records and their Modern Applications”，*Physics Bulletin*，21: 260-263。

[2] 参阅 Needham，J.(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Wang，L.，Lu，G.-D.& Ho，P.Y.)，(1970)，*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参阅 Ho Peng Yoke and Beda Lim(1972)，“Ts’ ui Fang，a Forgotten 11th-Century Chinese Alchemist”(with Beda Lim)，*Japa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11: 103-112。

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我仍尽力鼓励同事们多做些学术研究，并且亲自参与他们的某些研究项目。[1] 1971年，我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邀请信，作为该大学1972年度亚洲学人（Asian Fellow）。1971年度的亚洲学人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之所长。李约瑟在吉隆坡的时候没有向我提及《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事情，可是听说我要去澳大利亚，就来信要我利用这个机会和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职的王铃博士合作，替他完成《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火药篇〉初稿。

1972年，我利用马来亚大学的半年带薪出国研究假期，又从拉曼学院获得休假，前往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这次是由王赓武的远东历史系和柳存仁的中文系联合做东道主。我在他们的两个单位各有一个研究室。我一般上午在远东历史系，而下午在中文系。我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找王铃。他告诉我他已经完成〈火药篇〉所要做的事。我很高兴听他这样说，使我得以专心执行亚洲学人的任务。我立刻写信向李约瑟报告此事，谁知引起一场误会。下文自有分解。

作为亚洲学人，我的主要任务是在远东历史系和中文系分别做一次公开演讲。此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鼓励我去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其他大学和做演讲，旅费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支付。我利用这个机会往新西兰参加一个汉学研讨会，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几个大学做演讲。这也是我在澳大利亚发表学术报告的开始。[2]

何去何从

这20年来，一直为工作忙碌，那时社会有时也不安定，我仅想到自己还年轻，从来没有想过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校园为我提供一个比较宁静的生活环境，让我能细心替我的家庭着想。主要问题是儿女的教育。那一年我46岁，离马来亚大学的退休年限只有

---

[1] 例如，Ho Peng Yoke and Yu Wang-luen(1974)，“Physical Immortality in the Early 19th-Century Novel *Ching-hua-yuan*”、*Oriens Extremus*(Hamburg)，21:33-51 和 Ho Peng Yoke、Goh Thean Chye and David Parker(1974)、“Po Chu-i’s Poems on Immortali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4: 163-186 等。

[2] 参阅 Ho Peng Yoke，Goh Thean Chye and Beda Lim(1972)，*Lu Yu*，*the Poet-Alchemis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 13(Canberra)，Ho Peng Yoke(1972)，“Early Chinese Science”，*Hemisphere*，16: 10-14 和 Ho Peng Yoke(1973)、“Magic Squares in East and West”，*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8: 115-141。

九年。[1] 我有五个儿女，老大16岁，最小的只有9岁。倘若五个子女都需要自费出国留学，资助一两个出外留学应该可以应付，三个以上就会大伤脑筋了，况且老五在我退休的一年，刚刚达到进入大学的年龄。假如还是留在吉隆坡任职，只能希望有些儿女可以进入当地的大学攻读自己选读的学科，更希望其中有些可以获得奖学金。但这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刚巧澳大利亚正在筹备开设两所新大学，一所设在昆士兰州，一所在西澳大利亚州。设在昆士兰州的格理斐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登报征聘现代亚洲学院（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的创校教授（Foundation Professor）和首任院长（First Chairman）。[2] 我离开澳大利亚前就向该大学提出申请这个职位。

1972年7月，我返回吉隆坡，不久就接到格理斐大学来信，约我到布里斯班（Brisbane）面会。继后我收到聘书，受委为现代亚洲学院的创校教授兼任期五年的首任院长。这时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版图之争”和“解体”的问题已经平息。当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时期，拉曼学院的负责人丹斯里许启谟突然在访问英国时逝世，工作小组有了一位新主席。我回吉隆坡时才知道拉曼学院也正在物色一位全职的校长，这样我对这个学院的责任也可以放下了。于是我在1972年12月初，向马来亚大学校长提出辞呈，本来我必须给大学当局六个月的通知才可以离职。格理斐大学校长向马来亚大学校长提出要求，希望可以缩短我的通知时期，以英联邦大学互相协助的精神帮助他新大学的建立。马来亚大学当局就把我的六个月通知时间改为三个月。

两个不同立场：王铃与〈火药篇〉

就在这段日子，从剑桥来了两封有关王铃的信。李约瑟说，他看到我向他报告说王铃已经完成〈火药篇〉的工作，便立刻写信恭贺王铃并请他将所写的稿寄到剑桥。可是王铃回答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正在等

---

[1] 退休年龄是55岁。

[2] 英国式大学通常称学院为Faculty，美国则例称College。College这个名词在英国比较复杂，School的用意也不简单。一般来说，school使用在小学和中学，而college是指较高层次的专科学院，但是school也可以用在比大学学系较高层次的独立单位，例如，伦敦大学的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等。英国的College可大可小。牛津和剑桥的college和美国式大学的大有分别，医科专业团体，例如，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和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等在英国有崇高地位，可是有些幼稚园也自称College，例如，我一个好友在伦敦市外所办的St.David’s College。

待李约瑟光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得以协助他在该大学撰写〈火药篇〉。王铃已经获得他的系主任王赓武的同意，由王赓武致函李约瑟，邀请他到来任客座教授。李约瑟大失所望，无论如何他实在无法离开剑桥，一旦离开他的卡片和资料处理系统，他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何况鲁桂珍正在等着他和她一起写他们的〈医药篇〉呢？李约瑟就请我独力负起撰写〈火药篇〉初稿的责任。接着，剑桥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会长巴比基也来信，要求我代替王铃写〈火药篇〉的初稿，信中含有对王铃不满的语气。

其实从王铃的观点，他并没有过失。他原来的任务是替李约瑟搜集资料，他离开剑桥后还继续搜集资料和写卡片。他认为这是他身为合作者的分内事，而写作方面都是李约瑟本人的事，况且鲁桂珍也从来不执笔编写书稿。[1] 这也难怪他不愿意由我代表李约瑟跟他合写〈火药篇〉。他也尽了他的心力邀请李约瑟到澳大利亚和他合写这篇书。

我回信给巴比基解释我的处境。虽然澳大利亚是一块极为广阔的土地，但搞中国研究学者的圈子实在很小。这个圈子的人都认识王铃，也知道他和李约瑟合作编写〈火药篇〉的事情。假如他们误会是我从王铃的手中夺取编写〈火药篇〉的，我将来在澳大利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的意思是这份差事可推则推，除非剑桥可以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后来我听鲁桂珍说，巴比基看不懂我的信，召开一个小组讨论会也找不出解决方法，最后由她建议说只需让王铃留名作为其中一位合作者，问题就化解了。这样一来，〈火药篇〉又推回到我身上了。

离别吉隆坡

1973年初，除了中文系的系务要做交代，我还忙着处理私务。办理移民手续、出售房子、处理银行业务、整顿手上的商业股票、替儿女办理吉隆坡学校的退学手续和澳大利亚学校的入学手续，等等。我还须考虑到留在马来西亚的母亲，在吉隆坡的银行留下我的户口以便支付她的花费。此外还有许多应酬，要参加同事们和朋友们的送别宴会。

[1] 当然他不能像鲁桂珍，可以堂堂大方地说："李约瑟的文笔比我好，为什么他不写要我来写？"



离任前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同仁合影

1973 年 4 月初，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在马来西亚的亲友们，远赴澳大利亚。虽然我有在南半球推广中国文化甚至在文化上把澳大利亚和亚洲拉近的抱负，但是我没法预测我的愿望能否实现，也许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以实实在在看到的是，这次的选择把我在大学服务年限延长 10 年，我的儿女教育问题得以迎刃而解。[1] 这个选择让我的儿女进大学时可以凭自己志愿选择想念的学科，而且节省了他们一两年的在学时间。这也让我省下一大笔从小学至大学的儿女教育开支，使我后来有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去英国当 12 年义工，作为李约瑟的接班人，担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

[1] 马来亚大学的退休年龄是 55 岁，澳大利亚大学的退休年龄是 65 岁。

澳大利亚的新大学

第四章

1973年4月中旬，我到格理斐大学报到，就任现代亚洲学院创校教授兼首任院长职。澳大利亚的大学没有提供教职员宿舍，大学当局就替我们找到一栋在圣路西雅区（St.Lucia）的房子，暂时租住三个月，让我们在这个期间得以选购一栋适合自己的房子。我们的四个儿女进入州立吐望中学（Toowong State High）念书，而最年幼的淑苹则进入爱恩萨小学（Ironside Primary School）。7月8日，我们迁往在肯摩区（Kenmore）的贺伟街（Holdway Street）所购买的八号房子。淑苹就转校到附近的州立南肯摩小学（Kenmore South State School）毕业后她又转往州立肯摩中学（Kenmore State High）。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则照常在吐望中学念书。

我上任的时候，格理斐大学没有校舍，在布里斯班市外的吐望区租了一层商业大厦的六楼，作为临时办公室。大学的校址设在布里斯班市中心以南约10公里的那坦（Nathan）区。当时的校址没有一砖一瓦，没有图书，

也没有学生，有的只是澳大利亚人们称为“bush”的树林。我是现代亚洲学院最先上任的教职员，要参与聘请全校教职员的运作。初时格理斐大学有四个称为“School”的学院，“School”是当时该大学的“基本部门”（Division），主管称“Chairman”。[1]校长韦列教授（Professor F.J. Willett）是一位管理学的专业者。他属下有八个基本部门的主管，包括四个学院的主管，总务主任（Registrar）、财务主任（Business Manager）、图书馆长（University Librarian）和校园与校舍规划主任（University Site Planner）。这四个学院包括澳大利亚环境研究学院（School of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Studies）、人文学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现代亚洲学院（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和理学院（School of Science）。校长有事出差或在他的休假期间，他的任务则由在校院长中之一，按照上任日期先后，作为代理。依照次序，我排第三。幸运得很，我只当过一次代理校长的职务，而且仅一个多星期，不算长。

格理斐大学之所以采用许多异常的名词，是由于当局认为需要一所别有风格的大学。这时布里斯班市原有一所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当局要显示这所新大学是和原有的大学不一样，宗旨是以改变来迎合潮流与社会的需要。英国式大学校长称“Vice-Chancellor”，校监称“Chancellor”。校监不管校内一切校务和行政，仅主持大学的隆重仪式。例如，剑桥大学的校监是爱丁堡公爵，昆士兰大学的校监是代表英女皇的昆士兰州总督。格理斐大学则把校监和理事长的职务合为一体。首任校监布雷爵士（Sir Theodor Bray）是一位退休的新闻业者，很热心参与校内行政。他当过多年新闻记者，习惯做实地采访和一般人打交道，不习惯听别人称他为爵士，我们都以“Ted”称呼他。校长韦列教授来自墨尔本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获得“战功十字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早年在剑桥大学念书，曾参与学生划船队和牛津大学学生比赛。

我在格理斐大学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学期制度、大学章程、新校舍的蓝图、聘请新教职员、财政预算、各学院的课程，等等。有时会讨论很长时间。例如，决定采用两学期制度经历了六个多月的讨论。我记得，做了最后的决定不久，来了一位新聘任的美籍讲座教授。他是我

[1] 这个大学的制度时常更改。当初School是大学的基本部门，主管称Chairman，后来改称Dean。经过多次的改变，现在连我以前的现代亚洲学院也不存在了。

一年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认识的朋友。他喜欢的是英国式的三学期制。他先到我处做说客。我告诉他不必多费口舌劝服我，只要他能去说服半数的有关人士，我将会乐意依从他。我个人的立场是，一个大学的品质不在乎两学期或三学期制，而在于老师和同学们本身的素质和努力、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备等。因此我对学期制度的问题，只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校长的理念是设立一所有别于原有昆士兰大学的大学，连格理斐大学的组织和职称都有异于原有的大学，我早已料到格理斐大学将会采用两学期制度。我的美籍朋友没有再来跟我谈这件事情。

为吸引新学生，每个学院的教务人员都被安排到市内和市附近的中学校做宣传，介绍他们的新大学、新学院和新课程，指出这个新学府与别校不同的特点。我也不例外，要到处做宣传。我谈的主要话题是向听众介绍中文以及解析了解亚洲人士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性。我觉得首先要吸引澳大利亚人士听众的兴趣。例如，有人曾问及中文是否难学，我就在黑板上写下“women”这个字。这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个英文字。我就继续说，假如是中文，“*wo*”是等于英文的“I”，“men”是中文的复词，“women”是等于英文的“we”或“us”。中国人讲到他们自己就用“*women*”这个字，可见中国人对“women”的重视。从“women”这一个字就可以学到英文“I”“we”和“us”等的三个字；中文并不难学。谈到亚洲的风俗习惯，我说假如到国外旅行，想向一个印度人商贾购买东西，依例必须讨价还价，倘若还了价看到卖方摇头，千万不可再提高还价，因为依照印度的习惯，摇头是等于中国人的点头。有人发问，中文的名词没有单数、复数之分，动词也不表示现在、过去和未来，那么它是不是一种能够明确表达事情的语言。当时大约半数的澳大利亚人们曾在学校念过法文而半数念过德文。我就反问听众是否同意法文是一种可以明确表达事情的语言。得到听众认为同意后，我就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上“I follow an ass”（我跟着一头驴子）这一句，问听众有哪一位可以大声念出法语的翻译。许多听众面露微笑，但没有人尝试做翻译，原因是法语的“我跟着”和“我是”同是“*Je suis*”，而在西洋文化中的“驴子”是“笨蛋”的别名。我补充说，这不是指出法文不是一种可以明确表达事情的语言，而是证明法文的美妙，中文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数量和时间。

社会活动：谈民主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总是人民占绝大多数而统治者占少数。“民主”这个名词的本身是有“关系着人民的利益”的含义。谁不喜欢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影响国家的政策呢？所以无论在实际上是否可行，“民主”是一个最受群众欢迎的名词。何况在“五四运动”的时期，胡适等人还提到中国最需要的是“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赛先生”（Mr. Science）呢！

我素来不公开谈民主，因为民主已经受现代社会的肯定，而专制、独裁已经被舆论否定了。没有新鲜的论调而唱民主只等于迎合他人所好。民主给我批评民主的自由，但也赋给他人批评我的自由。我没有兴趣挑起一场舌战或一场笔战。有一个晚上，布里斯班的华侨社设宴款待来访的一位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参赞官，也请来许多昆士兰州执政和在野两党的参议员。我也邀请韦列校长做我的客人。不料华侨社的刘会长拉我登台要我说几句欢迎来宾的话。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以称赞的语调批评了西方人士的作风。我说：“今天晚上我很高兴代表华侨社欢迎来自中国的参赞官、各位部长、各位政要和各位来宾，参加这个宴会。我最高兴的是能够目睹今天较早时在州议会上用言词猛烈攻击对方的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现在能够共聚一堂，把酒言欢，把今天在议会上发生的事情置诸脑后。也许当局者迷，你们没有料到这种精神是实行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西方的人士往往坚持别的国家都要学习他们的民主制度，可是忽略了首先要学习你们今天晚上所表现的精神。由于没有学到这种精神，最近澳大利亚北方的一个国家，就发生了一个吊死前任首相的悲剧。每一个新兴国家都有自己的不同文化、历史和经济背景，在他们还没有学到你们的民主精神以前，就不应该模仿澳大利亚式的民主制度，否则就会导致一些我们意料不到的不幸事情了。”

我带着怀疑心情返回我的座位，不知我会否受到批评。我一坐下就有一位国会参议员过来自我介绍，递给我他的名片，约我下次访问堪培拉的时候由他安排和他在国会的 King's Row 共进晚餐。后来我也赴约了。当天晚上，国会正在开会中。我们在用餐时见到费里萨（Malcolm Fraser）首相走进餐室告诉同僚加拿大首相突儒都（Pierre Elliot Trudeau）大选获胜的消息。

以上的各种非学术性的活动使我有时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一个行政人

员甚至是一名推销员。幸亏我有一位以前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任职的朋友星哈博士（Dr Damodar Singhal）在邻校昆士兰大学历史系任讲座教授。他邀请我替他的历史系开一门科学历史课程，作为该大学的一名义务教授，使我不会忘记本身是一个学者。这个课程颇受同学们的欢迎，连该大学的一位副校长韦布（Edwin Webb）生物化学讲座教授也来旁听，并参与同学们的作业和考试。后来这位副校长离开昆士兰大学往悉尼担任该市第三所大学的校长。

提到学术研究方面，除了一篇纪念连士升的文章，我的其他学术报告都用英文写就。[1]1974 年， 我应邀参与南澳大利亚州亚德雷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建校10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宣读一篇有关中国的大学教育问题的报告。[2]我也将一份报告寄呈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让他多些了解中国的情况。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也参与这个盛会，难得有个好机会跟他畅谈，得知他的长子获得牛津大学奖学金念医科。[3]同年香港大学授予李约瑟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我当选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这个学院是当年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一群英国（文）学院院士们（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所设立的人文科学之中声望最

---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73),"Doctors Take a New Look at Acupuncture", *Hemisphere*, 17: 10-5, Ho Peng Yoke, Beda Lim and Francis Morsingh (1973), "Elixir Plants", in Sivin, Nathan and Nakayama, Shigeru, *Chinese Science* (Camb.Mass.), 153-202, Ho Peng Yoke (1973),"The Search for Perpetual Youth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lchem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7: 1-20, Ho Peng Yoke (1973), "Magic Squares in East and West",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8: 115-141, Ho Peng Yoke (1974), "Chinese Scienti.c Terminolog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9: 1-14, Ho Peng Yoke (1974), " Chinese Alchemical and Medical Prescriptions-a Preliminary Study",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No.3* (1974), 295-298, Ho Peng Yoke (1976), "Three Dialogues in Science", *Hemisphere*, 20: 14-21.Reprinted as "An East-West Dialogue on Science", *Asia Magazine*, (12 December 1976), 13-21, 何丙郁(1976 年), 〈回忆连士升先生〉, in Lien Wen-ssu and Lien Liang-ssu,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Lien Shih-sheng*, (Singapore), 40-51, Ho Peng Yoke and Wang Ling (1976), "On the Karyûkyô, the Fire-Dragon Manual",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16:147 — 159,Ho Peng Yoke(1977),"The T'ang Monk Scientist I-Hsing", *Buddhist Studies*, 17: 2-4; 12-13, Ho Peng Yoke (1977), "Able and Adventurous: Navigation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Hemisphere*, 21: 2-9, Ho Peng Yoke (1977), "The Star Move Still", *Hemisphere*, 21: 22-29, Ho Peng Yoke (1977), "Intra-Asian Influ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ceedings of Seventh IAHA Conference* (Bangkok), 532-549, Ho Peng Yoke (1978), "Modern Scientiflc Development in China", *Eastern Horizon*, 17: 5-9, Ho Peng Yoke (1978), "Pride and Prejudice: Science in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Proceedings of Asian Colloquim on Cultural Conflicts*, (Tokyo),1-13, Ho Peng Yoke (1978),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Hemisphere* 7: 36-41。

[2] 参阅 Ho Peng Yoke (1974),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entenary Celebrations: Seminar on Asian-Australi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0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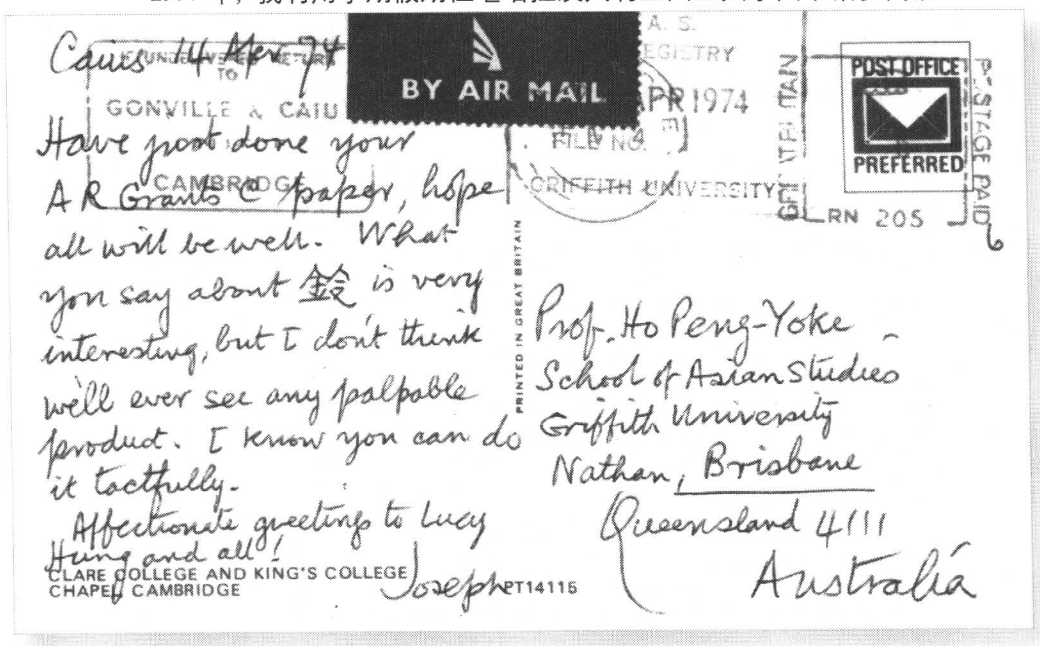
[3] 他的儿子 Dr Christopher Huang 现在在剑桥大学任医学院的 Reader。

高的学术团体。同年，我所参与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第五册第三分册面世。1977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了我一小本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拙作。[1]

《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火药篇〉

我担任院长的时期，大部分的写作精力都放在替《中国科学与文明》〈火药篇〉起稿上。上文提及李约瑟和王铃之间对编写工作分配的不同解释。以往李约瑟在编写方面都是亲力亲为，王铃在澳大利亚的10多年来，却是造了一箱一箱的卡片，认为自己已经尽了作为合作者的任务，只要等待李约瑟的来临，利用他的卡片撰写他的书。这也难怪他当初不愿意接受我来代替李约瑟写稿。剑桥方面来信催我代写，我只好勉为其难。剑桥方面不会体会我的处境，不知道尚未有校舍、没有学生和图书馆等的格理斐大学不会觉得研究是当务之急。

1977年，我利用学期假期往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参阅撰



Caius 14 Mar 74

Have just done your A R Grant's paper, hope all will be well. What you say about 鈴 is very interesting, but I don't think we'll ever see any palpable product. I know you can do it tactfully.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Lucy Hing and all!

Joseph

Prof. Ho Peng-Yoke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Griffith University
Nathan, Brisbane
Queensland 4111
Australia

1974年李约瑟寄来有关王铃的明信片

[1]参阅Ho Peng Yoke (1977), *Modern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stronom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16 (Canberra)。

写〈火药篇〉所需资料。格理斐大学突然来电话说，校长心脏病发作入院，要我立刻赶回布里斯班代办校长的事务。我去校长室办公，刚巧他的秘书也趁机休假，我只得把我的院长室秘书带来校长室办公。我就在校长室写就〈火药篇〉的火药传播的一章。10天后校长回来了。他向我道谢替他处理事务。我回答说我替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我去掉了他办公室的烟灰缸，总务主任得了一个男孩子，我替校长写信道贺，其余的时间我完成了〈火药篇〉的一章。校长没有回答，好像心中有事说不出口。我想他不会反对我去掉他办公室里的烟灰缸吧，因为从此他也戒了烟。我猜想他不愿意有人使用他的办公室作为研究室，但不好意思公开表示反对的态度。

1978年4月，在我的院长任期届满的前几天，我向李约瑟交卷。看来事情也获得王铃的谅解，文稿发出后王赓武路经布里斯班开会，王铃托他带来好几箱卡片。我来不及利用它了，只得原封不动奉还。[1]

首次访问中国内地

我担任院长的时期，搞好国际关系成为我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具有意义的任务。依照当时校方计划的顺序，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尼，是现代亚洲学院的学术交流和研究的对象。首先受到注意的是中国。尼克松访华后，格理斐大学的校监和校长对中国都想一睹为快。我拜托李约瑟把我们的愿望传达给中国驻英国大使并替我们说几句好话。1973年11月，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朱启桢先生邀请格理斐大学校监夫妇、大学校长夫妇和我一共五人，访问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涉足中国内地。除了参观广州、北京、南京、上海、杭州五个城市的名胜外，还访问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四个高等学府。广州市是我们抵达中国的第一站。中国国际旅行社安排我们住在东方宾馆。刚巧耶鲁大学的瑞德教授（Arthur Wright）带领一群美国考古学者访问中国，住在同一个宾馆。我介绍我的校监和校长以及他们的夫人和这位著名美国唐代史家认识。我们的第二站是北京，在北京饭店再次碰到瑞德教授，却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

---

[1] 王铃后来把他的卡片存放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图书馆。

我们在清华大学参观该校的电子计算机，示范打印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现在当然是不算得什么，70年代初期用电脑打印中文字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访问北京大学得到周培源校长的招待。他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早年曾跟随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费思棻博士（Dr Stephen Fitzgerald）是我从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认识的朋友。他宴请我们五人在全聚德（当时改称北京烤鸭店）进晚餐，并请到周培源、华罗庚和周一良三位名教授做陪客。话题转到李约瑟身上，谈及他和鲁桂珍两年前访华，并听说鲁桂珍曾入医院治病，后来就断了消息。他们担心鲁桂珍有什么不测。华罗庚托我调查此事。我回到澳大利亚立刻写信给李约瑟并问候李大斐和鲁桂珍的健康情况，得知鲁桂珍安然无恙，便告知华罗庚让他放心。

我们乘搭火车从北京往南京，住在金陵饭店。到中山陵、玄武湖和长江大桥参观后，我们乘搭飞机前往杭州，住在杭州宾馆。当时西湖的游客不多，我们可以优哉游哉泛舟湖中欣赏美景。后来任杭州大学校长的薛艳庄物理教授代表对外友好协会招待我们。

我们乘搭火车从杭州往上海，住在锦江饭店。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曾被邀请替英文老师上英文课。我个人去访问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由副所长曹天钦博士招待。他介绍我认识所长王应睐博士。我虽早已知道他们的大名，但这是我首次和他们会面。曹天钦曾经跟李约瑟和我三人共写一篇炼丹术论文，他曾参与人造胰岛素的工作。王应睐在1937年曾和鲁桂珍及沈诗章留学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1]认识李约瑟使我很容易跟别人交谈。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坐在一个样子像西洋人士，并且英语流利的乘客身旁。他听到我提起李约瑟的大名，就自我介绍说是马海德，本身是中国人，而且是李约瑟的朋友。

我们由上海乘搭飞机回到广州市，又住在东方宾馆。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在北园设告别晚餐招待我们。当时广州市的著名菜馆有北园、泮溪和南园。我们由广州市乘搭火车回香港。校监夫妇和校长夫妇搭机离开香港直飞布里斯班，我另有任务在香港多留两天。黄丽松博士刚从新

---

[1] 鲁桂珍的导师是李大斐，而沈诗章的导师是李约瑟。我没有机缘见到沈诗章，听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任职，并没有参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大业。

加坡南洋大学转任香港大学校长。[1] 他邀请我在香港大学做一次公开演讲。盛情难却，我就留下向听众介绍中国传统天文学。

我的回程路经吉隆坡，顺便省亲。从香港飞往吉隆坡的飞机上我身旁的搭客是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的秘书韩沙（Hamzah Majeed）。他是我的朋友。他听说我从中国回来就建议我去见敦拉萨，因为他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我说因为有些感冒担心传染首相，不如寄他一份报告。我于是在吉隆坡住入美轮酒店（Hotel Merlin），写了一份报告寄呈敦拉萨首相。

校监夫妇和校长夫妇对我夫妇俩很友善。李约瑟曾在我的推荐书中大赞美瑶的厨艺，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欢迎我们在家宴客。我们的客人包括日本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夫妇、昆士兰大学校长高温爵士（Sir Zelman Cowan）、王赓武和马来西亚来访学者们等，校监夫妇和校长夫妇做陪客。[2] 这次我访问中国给校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飞机上看到我用日语跟一个日本搭客谈话，在广州市看到我认识美国著名大学的名教授，在中国看到周培源、华罗庚等一流学者对我的友善，香港大学又邀请我做公开演讲。他就认为我是国际知名的学者，而且精通格理斐大学所教的各种亚洲语言。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慈祥长者，时常在我的同僚前称赞我。他的善意却带来负面的效果，使我更难分身处理不为他们认同是当务之急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火药篇〉。

1978 年 4 月，我卸任院长职。事前李约瑟收到我的〈火药篇〉文稿，立刻来信催我尽快去剑桥，跟他一起做定稿。本来我在该年的下半年可以向大学申请半年的带薪研究休假去剑桥。格理斐大学的一个特点是带薪研究休假并非教务人员的权利，而只是一个可以向大学申请的项目。这次格理斐大学校长比李约瑟棋先一着，他下令我在学期假中带领一群格理斐大学师生访问中国。剑桥的是私事，澳大利亚的是公事。我不能因私废公，也乐得听从校长所托。违抗校长而申请去剑桥恐怕也难获得批准。

1978 年 12 月，我带领一个由 24 名的格理斐大学师生和家眷组成的

[1] 60 年代郑德坤曾说马来亚大学有四个杰出的华人学者，称他们为该大学的四杰。结果不约而同，他们先后都到香港任职。首先是黄丽松从南洋大学回到他的母校香港大学任校长。接着郑德坤本人从剑桥大学退休后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邀请到沙田当中文大学的副校长。80 年代我曾在香港大学服务六年。1986 年，黄丽松荣休，王赓武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到香港接任香港大学校长职。

[2] 美瑶曾在布里斯班市的伊塔卡学院（Ithaca College）任教厨艺。

队伍访问中国，遍游广州、北京、大同、上海、杭州、苏州、桂林等七个城市。到达香港的时候，香港大学派车迎接我们全体往香港大学参观，然后到香港仔的海上皇宫吃点心，由香港大学的学生代表向澳大利亚同学们示范筷子的用法。

我在北京的访问中，席泽宗博士得知我在1973年已经去过长城和明陵，他安排我的访问团去这两个名胜的那一天，约我去会见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们。我拜托我的副团长基里斯曼博士（Dr Larry Crissman）代替我的职务，领队参观名胜，使我可以赴会。席泽宗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所长。我跟他神交已久，大约已经有18年了，早年在学报上彼此参引对方的研究成果，但是没有书信来往。这次和他确是一见如故。他邀请我在他的研究所做报告，介绍海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在中国内地演讲。席泽宗还召集所中同仁以及考古研究所的夏鼐所长，到我停留的北京饭店，开一个临时座谈会，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前景为题，交换意见，又谈及若干值得考虑办理的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有意义的事情。这次的访华活动打开我的视野，使我领会到除参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大计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对中国科学史研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留意。这对我以后在80至90年代的学术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和日本的交流

我在格理斐大学的70年代，也是我替该大学和日本的大学建立关系的重要时期。由于日本是格理斐大学现代亚洲学院的重要课题，我必须顾及和日本的交流。当时的驻布里斯班日本总领事对我相当友善，协助我的学院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申请从日本派来访问教授，到格理斐大学讲学一年半载。1974年8月，我到东京和京都参与第14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我早在8月15日，开会的三日前抵达东京，住在新桥第一饭店（Shimbashi Daiichi Hotel）。翌日，一步会的友人邀请我去农林年金会馆辖下的旅馆出席欢迎晚宴，17日，我跟他们一起游览鬼怒川和日光各处名胜。18日，我返回东京向大会注册处报名。来自苏联的参会者也全体住在新桥第一饭店。当晚在同一饭店开欢迎鸡尾会。似乎不少人知道我不久前曾经访问过中国内地，一群苏联代表围着我询问中国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住在南半球，这次访问不过是走马看花。他们是中国近邻，懂

的事情必定比我多，反倒是我应该向他们讨教。18日中午，在都市中心进午餐的时间，从远处看到李约瑟和一位貌似鲁桂珍的女士一起，但这位女士看来比较清瘦和充满活力。我走近向他们打个招呼，发现我看错了，李约瑟向我介绍她是多伦多博物馆的时学颜博士。本来他们两人也同住在新桥第一饭店。但在19日看到时学颜，她告诉我说，由于李约瑟觉得房间的书桌太小，他们两人已经另觅旅馆居住。在这个会议期间，我就很少有机会见到李约瑟。李约瑟也没有向我问及〈火药篇〉的进展。若干年后我才听说那次鲁桂珍因病不能陪同李约瑟去日本。24日，我去京都住在离开京都大学不太远的京都饭店。薮内清教授常利用这个饭店作为招待来宾的场所。27日，我宣读一篇与炼丹术的丹方和医药的药方有关的报告。[1]我也利用这个访问日本的机会，和东京的大东文化大学建立一项交换学生的协议，让格理斐大学的同学有机会到日本学习日语，同时大东文化大学的同学也得以到澳大利亚学习英语。我回程路经大阪、香港、吉隆坡和新加坡。

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获得利华休姆公司（Leverhulme Company）的资助，派遣一名在任的讲座教授以客座身份访问澳大利亚的大学，同时从澳大利亚的大学邀请一名讲座教授到庆应大学当客座。1875年11月，庆应大学邀请我做利华休姆客座，访问三田校园的国际中心三个月。1975年11月21日，我路经香港往东京，在香港协助《东方文化》审定一篇有关天文学史的报告。我抵达羽田国际机场时是由国际中心的事务主任石谷一郎和大东文化大学的讲师藤井明一同来接机。石谷一郎把我安顿在港区三田町3-4-18的二业大厦（Futaba Biru）六楼的一个组屋单位。他们告诉我说，铁路的工作人员正在罢工，交通不方便。幸亏我住的单位离开三田校园不远，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我的友人中山茂带我去国会图书馆，从此我几乎每天都到这个图书馆看书，寻找有关〈火药篇〉的资料。2月4日，在中山茂陪同之下，我们到防卫大学校访寻罕本汉籍，找到一部以前研究兵器名家有马成甫所藏的《武备火龙经》。[2]剑桥没有这部书。防卫大学校图书馆的人员替我复印一份。我利用这些资料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做一次学术报告，文稿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74), "Chinese Alchemical and Medical Prescriptions — a Preliminary Study",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No.3*, pp.295-298。

[2] 日本的高等学府中，仅在文部省管辖下的可以使用大学这个名称。防卫大学校不属于文部省，所以称为大学校。

登载。

我在三田得以体验居住东京的生活。附近居民对我很友善，例如，管理二业大厦的老妇人和她的孙儿都跟我打招呼，经过曾经购买东西店铺，如该区的东京羊羹店，所认识店员也折腰对我致礼。有时还遇到路人向我问路和乘搭地下铁列车的年轻人给我让座。新年的时候，我到朋友家去拜年，例如，庆应大学的十时严周教授、名古屋商科大学的胜吕弘教授、东京会记士铃木荣一氏家等。我曾经到过早稻田大学拜访以前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认识的羽鸟钦一郎商学部部长。我的朋友稻村竹男的长子稻村宏在东京从事旅游业，是一个社长。他曾介绍我认识一些商业界的朋友。有一次他陪同我去看“前进座”戏班演出的歌舞伎，闭幕后还跟随演员一同到六本木的一个酒吧，由主角役者中村鹤藏亲自向我介绍刚才的戏本。我不但有机会领略一些东京商业界人士的生活，而且从与片野昭二的交往中也体验到一些日本公务员的生活。例如，好几次他曾经替我订政府公务员专用的旅馆，我仅须付大约公众旅馆的一半费用。有一个傍晚，他说要当值，约我到他的大手町办公室见面。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我不愿意打扰他办公事。他说中曾根总理大臣正在开国会，而他的部属都要在行政厅办公室等候，提供他临时所需的资料。说罢他就带我到食堂跟他的同僚一起吃火锅，一面聊天，一面等着国会来的电话，相当热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格理斐大学首任校长韦列曾驾驶盟军飞机在中国海地区上空和日军作战。也许因为中国是他以前的盟友，他对中国学术持有好感。1973 年的访华经历更加深他的感情。可是日本也是在现代亚洲学院的学术领域，我认为校长也应该对日本有兴趣。我的朋友片野昭二在中曾根康弘总理大臣的行政管理厅任职。在访问庆应大学的时期，我偶尔跟他谈及我的校长。他打电话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替我约一个会见时间，但没有说出会见的事由。因而 2 月 3 日，我就以上述的情由，亲自往访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申请日方邀请格理斐大学校长夫妇访问日本。结果校长夫妇受到邀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我向日方申请的事情。他们大为兴奋，访日期间获得热情的待遇，印象深刻。

我利用这段旅日时间做了些公务。我去东京文化大学访问外国语学部的吉村五郎部长。中文和英文都归属外国语学部。吉村五郎是中文教授。他读中文不是用中国的现代语言，而是用日本的音读和训读。音读

是基于中国以前某时代或某地区的方言。他很高兴听到我用日语和他交流。他数次邀请我在一间店名和他的姓相似的鳗鱼料理店用午餐。格理斐大学的语言中心为聘请日语讲师，请我在东京面试该职的申请者。格理斐大学校长也有一个在日本建立一所学生语言训练中心的设想，请我做初步调查。我得地利人和两便，去冈山请教相泽土木建筑公司的小寺三郎，蒙他免费指点最合适的地点以及购买地产和建筑所需的费用。现代亚洲学院的同仁也希望校舍有一个日本式的庭园。这个梦想仅能在日本方面有人赠送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我在大阪遇到某宗教的一位主持人。他请我到他家用餐，他说可以考虑赠送日本式庭园的事情，但须附带一个条件。我必须答应加入他的宗教并作为澳大利亚的总主持人。这件事情就不好再讨论下去了，只好不了了之。我回到澳大利亚向校长汇报这两件事。1976 年，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逆转，校长不敢谈到在日本建立校舍的愿望。可笑的是，竟然有人反对大学要建设日本式庭园，说是将会破坏大学的环境。我没有浪费时间做出任何反应，只有一笑置之。

1976 年 1 月 10 日，美瑶陪同她的姐姐冯范如和妹妹冯季媛到访，住在我的三田二业大厦单位。我要扮演一个导游的角色了。在东京我带着他们游览浅草的雷门仲见通道等并拜访在东京的日本友人。我们乘搭新干线火车去京都观光，畅游清水寺、金阁、平安寺等名胜。我们路经冈山，得到小寺三郎的招待。他陪我们乘搭火车往九州的博多。在博多有一群一步会的朋友招待我们晚宴。片野昭二当时被总理府派遣到九州监察当地的地方行政，住在福冈。2 月 16 日，他带我夫妇去拜访福冈的进藤一马市长。我们谈及福冈有希望成为布里斯班市的姐妹城市，成功与否就要看布里斯班近来选举市长的结果。[1] 片野昭二值公务到各地方视察，顺便带领我们一行到云仙、唐津、岛原、长崎、熊本、亚苏火山地带以及别府各地游览。在别府我的朋友泽田シゲ招待我们到号称“地狱”的火山温泉区游览。泽田是一位退休的小学女教师。我们从别府回博多，然后改乘搭新干线火车回东京。美瑶就和她的姐姐和妹妹离开东京各自回家。

1976 年 2 月底，我返回澳大利亚述职。1977 年，我受日本政府外务省的邀请，往东京参加东京大学卫藤沈吉教授主办的一个“东西文化摩

[1] 结果天不从人愿，新市长对此事无兴趣。

擦研讨会”。我的报告在1978年刊登。[1] 我顺便到京都一行，恭贺薮内清教授被选在裕仁天皇前以“中国天文历法”为题做御前演讲并且入选为日本学士会学士。[2]薮内清很关心《中国科学与文明》撰写的进展。李约瑟在日本曾托一位年事已高的纺织界退休日本专家替他撰写他的〈纺织篇〉。为探听撰写的进展，薮内清约我陪同这位老专家共进午餐。这位专家说很高兴可以用日语跟我畅谈，由于事忙希望下一年可以着手工作。他的文稿将用日文写就，还要等候将来在剑桥有人代他翻译成英文。我写信向李约瑟报告此事。巴比基回信说已经找到别人负责编写〈纺织篇〉；不久这位日本纺织界老前辈也离开尘世了。

东南亚的关系

我来自东南亚，跟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的大学已有良好关系，不必费多大力气搞好联系。我到过新加坡的东南亚机构英语中心 RELC 做过一次演讲，也到过泰国曼谷参加亚洲历史学会研讨会。当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主席莫哈尔王子（Raja Mohar bin Raja Badiozaman）是我年轻时的同学和同事。我向他提议，为促进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让马来西亚大学的教授们有机会获得在澳大利亚讲学的经验，他的航空公司可利用有空余客位的班机，提供免费头等舱来回机票，而澳大利亚方面则提供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和旅行费用，和安排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利用这个方式，曾经请过两位马来西亚的学者访问澳大利亚的大学。格理斐大学校长曾经多次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学，都有人向他问及我。有一次校长在澳大利亚遇到我以前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的同学而曾任马来西亚的元首的东姑迦法（Tunku Jaafar）陛下。他也向校长问及我的近况。

在东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当客座

1978年的访华活动是公干，我可以保留向格理斐大学申请研究休假的权利，延期一年至1979年。以往我是从一个东方生活环境转往剑桥过

[1]参阅Ho Peng Yoke (1978), “Pride and Prejudice: Science in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Proceedings of Asian Colloquim on Cultural Conflicts*, (Tokyo), 1-13。
[2] 日本的学士会在日本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有如英国的皇家学会等。

一段西方生活方式，可以换一换居住环境。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假如要变换生活方式，不如选香港或日本。我也听说李约瑟在年终也将去香港，做该年度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讲座”的主讲者。他也将利用这段时期在香港筹款以资助建立一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以安置他的藏书。我就决定选择东京和香港作为我的研究休假地点，而放弃去剑桥的打算。这个决定反而对双方都有利。首先李约瑟有一段时间不在剑桥，假如我去剑桥就要呆着等他几个月等到他抽出一小段时间跟我一起做事。即使可以和他一起完成定稿恐怕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原来的计划是〈火药篇〉和〈印刷篇〉编成一书，作为《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五册的第一分册。〈火药篇〉在1978年春已经交卷；〈印刷篇〉是由钱存训教授全权负责，当时李约瑟还没有收到这篇的定稿。80年代〈印刷篇〉的定稿到了李约瑟的手时，他才发觉钱存训写得实在是太丰富了，应该独立成为第五册的第一分册。〈火药篇〉反而变成篇幅太小了。李约瑟不得已要亲自动手，把我的稿子分量增加约一倍，作为第五册的第七分册。假如李约瑟和我在1979年完成〈火药篇〉的定稿，日后还会留下问题等待解决。

1979年，在我尚未离开格理斐大学时，现代亚洲学院的一份学报的创刊号登载我一篇关于炼丹术典籍著成时代的文章。[1] 可惜的是，过了几年该大学的政策改变，这份学报在我离开布里斯班的一段时期，已宣告停刊了。这一年，家中传喜讯，二女淑英毕业，获得昆士兰大学理学士优异级学位（B.Sc.Honours）。她留在该大学的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我的带薪研究休假旅行的第一站是东京。在东京驹场区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任客座（日文称客员）的时期，几乎每天早上我都跑去国会图书馆看书。虽然我认识该图书馆的总馆长岸田实，但我没有利用这个关系向他要求特殊待遇，反而以一般阅览者身份，早上和本地读者一起在馆前门外排队等候开馆。我在书库中发现一部公元1804年汤安道手抄的独孤滔原著《丹方鉴源》。本来10多年前我已经留意这部书的《道藏》版本，而且曾经将它和另外一部《丹房镜源》作过比较。我发觉这部日本手抄本和当时流行的《道藏》印本有些出入，我就手录它以留后用。这部手抄本录自现在日本宫内厅所藏的一部明代《道藏》刊本，而当时流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79), *On the Dating of Taoist Alchemical Texts, Griffith Occasional Paper* Monograph No.1 (Brisbane)。

行的《道藏》印本则出自另外一部明代《道藏》刊本。[1]

我去香港大学访问以前，黄丽松校长已经向我提及该大学的理学院正在讨论开设一门科学史课程，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我在访问该大学的期间替理学院做一系列有关科学史的公开演讲，作为理学院的参考。后来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和格理斐大学现代亚洲学院联合登刊我的演讲词。[2] 我在理学院和物理系的同仁开了一次座谈会。此外我还在中文系的硕士班课程讲课和做一次有关《易经》与科学的公开演讲。香港大学安排我住在风景优美、古色古香的柏立基学院旧院长宿舍。我利用这个良机，整理从东京抄写来的《丹方鉴源》，并与《道藏》的印本做个比较，然后撰写一部《道藏·丹方鉴源》以献给我的老朋友黄丽松博士。[3] 此外我写了一篇有关气象学的报告，登载在《中报月刊》。[4] 我的儿子奕康也利用这个机会到香港大学医学院做实习，住在我的宿舍。美瑶也来香港度假，探望他的哥哥冯祺伟和姐姐冯范如以及他们的家人。

李约瑟在鲁桂珍的陪同下也在我当香港大学义务客座的时期到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做"钱穆学术讲座"的主讲人。我尽可能抽空到沙田听讲。可是有时我们两人，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沙田，在同一个时间做演讲，有如隔海唱戏。有一次香港电视台安排访问李约瑟的节目邀请我做提问者。由于我要给中文系硕士班同学讲课，不得赴会。幸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弘祺博士代替出席。李约瑟的访问受到香港中西传媒的广泛关注。他公开表示希望获得资助以在剑桥建立一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以收藏他的藏书和作为继续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室之用。香港大学解剖系主任李守基教授（Peter Lisowski）在60年代已经认识李约瑟。李约瑟访问香港时，多次在他家做客。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李宗瀛在重庆时代已经认识李约瑟。还有在可口可乐任职的李励生博士（Peter Lee）曾在1976年和1977年在剑桥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香港的"三李"商量组织一个名为"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机构以筹款支援剑桥的李约瑟。他们找到社会名人毛文奇医生（Philip Mao） 作为该基金会的主席。圈内人称他"毛主席"。他在香港亚历山大大厦开一个

---

[1]详见Ho Peng Yoke, *Explorations in Daoism: Science in Literatur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Monograph*, Curzon/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排版中］)。

[2]参阅 Ho Peng Yoke (1982) *The Swinging Pendulum: Science in East and W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参阅何丙郁（1980年），《道藏·丹方鉴源》（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大学）。

[4]参阅何丙郁（1980年），〈后羿射日，白虹贯日，确有其事？〉，《中报月刊》1980年3月，第2期。

招待会，向香港的殷商介绍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我也被邀参加这个盛会。

我在香港多次和李约瑟会面，他都没有跟我提及〈火药篇〉的事。可是我们各自回到工作单位后，我接到他从剑桥的来信，催我在1980年初回到剑桥跟他一起修订我的〈火药篇〉初稿。我回答说，要再过三年后始能向格理斐大学申请带薪研究休假，无法如期去剑桥。李约瑟就立下决心，自己修订我的初稿。

1980年，我回澳大利亚述职，发觉现代亚洲学院已经经历不少变动。例如，已经没有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派遣来的客座教授，也没有从马来西亚请来的访问学者，学报也停刊，大学本身也有组织上的变动。大学行政事务多落在专业管理人员手中。连校长跟现代亚洲学院的密切关系也淡化了。例如，韦列校长以前访问中国大陆和日本，都抱着愉快心情回来。我这次从香港回校时，他却抱怨告诉我说，他曾经访问台湾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他说："他们听说我是个 Vice-Chancellor 就以为校长是另有其人，而我仅是一个副手；他们马上将我的礼遇降级（They imme-diately rolled back the red carpet）。"我回答说，那是出于不同文化冲击引起的误会。事前应该做妥善的安排，例如，名片应该加上中文，把他的校长称号写得一清二楚。我觉得奇怪，这类误会竟然发生在一个拥有现代亚洲学院的大学校长身上。[1] 这反映校长和该学院的交流存在问题。以上的经验使我领悟，做大学行政是一件很快被人忘记的事情，不如留下一本书。对我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鼓励，这也是对学术的肯定。从这角度来看，虽然我撰写〈火药篇〉的过程曾经历诸多波折，但总算是值得的。这一年，我与李约瑟合作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炼丹术原理和仪器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五册第四分册出版了。我也另外发表两篇学术报告。[2]

1980年也是奕康大学毕业的一年。他获得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内科兼外科优异级学士学位（M.B., B.S. [Honours]），被派遣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所医院做实习。我感觉到，从这年开始我一家七口同聚一堂的机会

---

[1] 90年代初期，他的接班人韦布校长（Roy Webb）访问台湾，受到适当的礼遇，回国后还写信感谢"中央研究院"罗铜壁副院长和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并邀请他们回访澳大利亚。这都因为事先有妥善的安排。

[2] 参阅 Ho Peng Yoke and F.P.Lisowski, "A Brief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Eastern Horizon*, 19.5: 30-35 和 Ho Peng Yoke (1980), "Early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rthur Cotterell,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304-310。

就逐渐减少了。羽翼已成，或说是学业有成，儿女离家就业乃是现代社会的常事。我比起许多人家可算是更为幸运了。

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马蒙主任荣休在即，黄丽松校长致函韦列校长，提出借聘一事，聘我去香港大学接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兼主任职，为期三年。英国式大学称这类借聘为“second-ment”。在一般的英国联邦大学（British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互相协助原则的大前提下，韦列校长答应了。于是我向大学当局申请从1981年4月开始至1984年3月底的三年无薪休假。

香港大学

第五章

1981年，我离开澳大利亚去香港前夕，我的老朋友柳存仁教授来访。他听说我将去香港，就跟我倾心细谈文章写作所用语文的问题。他说在英国式和美国式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大学，学术报告惯例采用英文。我们两人也不例外，写作都多用英文。假如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对学术有所贡献，这仅能提高西方所谓汉学的水平，可是对一般中国学者帮助很少，也不会提高中文写作的学术水平。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是身不由己，如今我去香港大学赴任，他建议我在香港多用中文写作。柳存仁曾在香港任教多年，熟识当地情况。我猜想他的原意是劝我多用中文写作，以获取香港华人社会的接受，但是不便直接说出口。当时的香港大学是一所华人社会中的英国殖民地大学，一个不会用中文写作的中文系讲座教授是很难获得社会人士接受的，尤其是一个华裔教授担此重任。

用中文写作我早有此意，自然乐意接受柳存仁的这

一席话。虽说他的话对我写作所采用的语文影响不大，可是却引发我想起一件将来对香港大学中文系同仁可做的事情。1979年访问香港大学期间，我已经对中文系同仁的情况有些认识。一部分的同仁不谙英文，仅采用中文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来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使用中文发表在中文系的研究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在某些需要大学理事会（University Council）或评议会（University Senate）审定的场合上，用中文发表的文章往往会引起许多问题。例如，在申请提升职位的场合，申请者必须经过一个由校长（或他的代表人）和几位评议员组成的小组审定；有关院长和系主任也被邀请出席。小组的成员中谙中文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从西方教育系统出身。全靠主任向他们解析诸多问题，例如，介绍作者的文章和学术贡献、刊登的学报本身的学术地位，等等。申请者不谙英语时还须替他做翻译，否则小组往往以不能评估中文写作为由，不推荐提升。[1] 这是一件不谙英语的系主任所难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起码我在这方面可以替中文系某些同仁效劳。后来虽然没法使得每一位同事达到他们个人的愿望，有求必应，但总算已尽了我个人的一点绵力。

1981年4月，我单身赴香港大学履新，留美瑶在布里斯班看家和照顾儿女。香港大学负担美瑶以及受教育中的儿女每年一次来回香港的旅费。我抵达香港后，大学临时安置我在柏立基学院的旧院长宿舍，然后让我自己选择一所比较喜欢的大学宿舍，我很快选到大学附近的富林花园（Fulham Garden）八楼的一个单位。这年在香港，家事有忧有喜。忧的是从马来西亚传来五弟河通在吉隆坡病逝的凶讯。喜的是长女淑琼毕业，获得昆士兰大学医学内科和外科学士学位后，前往伦敦受训，以考取伦敦皇家内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ondon）院士衔。[2] 奕康也成功考取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Royal Australian College of Surgeons）初级院士资格。

当地社会的接受

由于我能够用粤语和英语讲课和演讲，加之中国科技对香港人来说又是一个新鲜和有魅力的课题，我很快就获得广泛的接受。香港中文大

---

[1] 这也很难怪他们。

[2] 学成归澳大利亚她再获得墨尔本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成为脑科专家。目前她在西澳大利亚柏斯市执业。

学、香港和九龙的一些学院和中学校，例如，当时的浸会学院和圣士提反女中（St.Stephen' s College）等，以及扶轮社、马可波罗俱乐部等，都邀请我去做演讲。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也先后约我写书。《明报月刊》、《星岛日报》、《大公报》等也向我索稿。丹麦女皇莅临香港，参与丹麦嘉士伯啤酒（Carlsberg）公司香港分厂开幕典礼时，我被邀请做公开演讲，提及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é）的"新地心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 香港中文大学也多次邀请我去演讲并委任我为该校的校外考试委员。香港大学当局也乐意看到该校的中文教授有能力参与中文系以外的校内和社会活动。虽然中文系的同仁对科技史是外行，但他们被我能采用三种语言写作以及采用多种语言资料做研究的钻研精神所感动。中西文献以外，他们发现我也利用日本、韩国、越南、波斯等国的资料。[2] 香港翻译学会也委任我为名誉会士。我很快感觉到我与香港的社会之间毫无文化冲击的问题存在。这都可以算是我已经成功获得香港大学和香港社会的接受。

1984年，在我借聘任期将届满的时刻，黄丽松校长再次恳请格理斐大学韦列校长，要求延续我的借聘年限三年，至1987年3月底。此外黄丽松校长又委任我为该大学柏立基学院的院长（Master）。韦列校长答应延长我的借聘任期后不久，他本人也到了退休年限，宣告荣休。1985年，他的接班人韦布教授（Roy Webb）更改了某些行政制度，例如，把学院主管（Chairman）的称号改为Dean。他的作风和前任校长有所不同。

香港大学的中文系

香港大学创校于1911年，初时仅设医、工两科，一年后增设文科，内有一个为期一年的普通中文选修课程，由赖焕文担任讲授中文经史。1926年，英国威灵顿代表团到香港考察，从而在香港大学产生了一个发展香港高等教育的计划，认为除了培养旧式中国学者之外，应该配合时代的发展。同年，香港大学校长在赖焕文的陪同下访问南洋，向当地华侨募款，获捐一大笔经费。1927年，香港大学中文系正式成立，由赖焕

---

[1] 参阅Ho Peng Yoke (1983), "*Tycho Brahé* (1546-1601) and China" *in Hong Kong-Denmark Lectures o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53-60。

[2] 参阅黄兆杰（英文原文）余丹（中译文）(1981年)，〈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o Peng Yoke 从历史观点看科学：与何丙郁教授一席谈〉，《Interflow 交流》号33，1-2。

文当首任系主任。他退休后，由来自北京大学的许地山接任。1936年，中文系课程分为中国文学、中国史学和中国哲学三组。其后，马鉴、赖欧（Rideout）、林仰山、罗香林、马蒙等，诸贤历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一职。我在1979年在香港大学期间，已经获知该大学中文系人才济济、课程丰富、学生众多，兼有英联邦大学之中汉籍藏书最多的冯平山图书馆，海外大学的中文系难以相比。这次黄丽松邀请我去香港，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难得机会。我心里想着应该如何为他的大学中文系做些贡献。

首先我考虑如何在学术上做点事情，我有自知之明，必须发挥一己之长。以往我最为得意的著述是在中国古代天文记录和协助李约瑟编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两方面。对天文记录感兴趣的是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而不是与中文系有关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专家，我和李约瑟合作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事情已告一段落，同时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也增加不少。我认为我可以试图从宏观和组织两个不同方面对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尽些绵力。

文学科学一线牵

我认为科学有助人文，而人文也有助科学；科学不能逃避历史，它本身也能创造历史。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新知识累积越来越多，有关的学科也分得越来越细，而且常有新学科的产生。20世纪初期所惧的文科与理科之间的鸿沟现在就变为越来越宽阔。我觉得专门研究人文科学的人们不妨多些和科技接近，不仅可以赶上时代，而且也许可以对人文科学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从事科技专业的人们说不定能够从人文科学作品中找到一些可以利用的珍贵科学资料，或者至少可以把眼界扩大，训练个人的思想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从而发展成为一个优良的品格。在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科技之间的一座桥梁。1982年9月底，我应邀前往当时南斯拉夫的萨格拉部市（Zagreb）参与国际大学协会主办的一个“当代科技革新对大学人文科学教育的影响”研讨会。[1]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83), "The Special Place of the Humanities in Adapting Traditional Values to Chan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atterns and their Impact o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eir Impact on the Humanities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is), 21-24。

我是以受邀者和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高等教育机构协会（ASAHIL）作为旁听者的双重身份出席这个研讨会的。本来当年的ASAHIL主席是香港大学黄丽松校长，他顺便找我代表他作为旁听者以省得他出外多跑一次。国际的大学界很担心人文科学和科学技术之间的无形鸿沟越来越扩大，寻求补救对策，大家公认科技史为一个良好手段。同年，我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就职公开演讲（inaugural lecture）中指出中国传统人文科学与科学的共同点。[1]其后我也在某些学报发表几篇拙作，讲及文学和科学的关联。[2]这条新研究路线会比较接近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中文系同仁的兴趣。

以往我和李约瑟合作编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必须采纳他的观点。李约瑟是从一个20世纪中叶著名生物化学家的立场，探讨中国的科技史。我到了香港就想起我父亲所讲不可老是模仿的遗训，开始试图不以现代科学知识而从传统中国人的观点再探讨一些话题。这不是说从哪一个观点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我认为从两个角度看一件事情，往往可以彼此印证。总之胜于单从一个角度观测所得的结论。因此我的研究路线就有点偏向人文科学。我所研究的中国传统术数是一个例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传统中国科学史

当我们谈论科学技术时，我们会联想到那些能够使我们理解和解释关于自然界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我们谈及中国的传统科技史，也可以试图和当时的人们易地而处，考虑传统中国人所解析和理解的自然界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解析和理解。宋代的张载、邵雍、朱熹等都有他们的学说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现代研究科学史的人认为宋代的一些理学家充其量只能算是科学哲学家，由于他们的学说在应用上仅涉及人事，所以他们的学说没有被看作为科学。很少人知道宋代的司天监曾使用三种与理学家学说相关的方法来预测天气的变化。无论在他们的时代科学这个名词是否已存在，也无论他们想像中的科学是否能被现代的人们承认为科学，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能够解析自然界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82), “In Harmony with Nature: Principles spanning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upplementary to the Gazette*, 29.4: 全。

[2] 参阅〈科学史与文学〉,《西北大学学报》（西安，1987年）17.2:1-9;〈科学文学一线牵〉,《明报月刊》（香港，1987年）84-91。

和应用这些知识以预测大自然变化的学问，都应该算是科学。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二册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是基于他身为一位现代科学家的立场。在传统中国人的心里，李约瑟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该是当时的科学。

1985年，我接到伦敦物理学会的通知信，获悉我已经是拥有英国女皇特许状的职业物理学专家（Chartered Physicist）。我回忆30多年前，我跟随出身剑桥大学卡文迪实验室的老师学物理，用的课本也是当年剑桥大学所用的课本。我相信我所学的物理学是该时代的物理学。可是在我接到伦敦物理学会的通知信，获得法律上的许可在英国执业作为一个物理学专业者时，我却自知自己已经不能算是当代的物理学家了，充其量仅可算是一名物理学史家。原因是30多年前我所念的物理学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科学是与时俱进的。30多年前的物理学已经不是90年代的物理学，何况几千几百年前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呢？西方托勒密（Ptolemy）的“地心说”和施塔尔（Stahl）的“燃素说”（Phlogiston Theory）是他们时代的科学，后来都已经被推翻。可是从来没有人说它们不是科学。这是从西方希腊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学史，没有什么不对，否则就没有科学史学科这回事了。问题是有些人对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认为假如研究东方科学史，能够兼从东方文化背景做判断，应该可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

组织中国科学史研讨会

1978年，我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座谈会中，提及自从1956年竺可桢、李俨等参与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以后，中国内地的科技史学者1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失了踪迹，甚为可惜。我又提及多次听到李约瑟在国际会议上对这个事情表示遗憾。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讨论组织一系列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的可能性。大家提议我在海外创办研讨会。后来我得知快要去香港任职，就认为是主办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的一个良好时机。我计划1981年往香港赴任后，下一年就在香港召开一个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学术讨论会。谁知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李倍始博士（Ulrich Libbrecht）捷足先登，已经决定在1982年8月召开一个中国科技史学术会议。我只好把我的开会时期展延到1983年12月，而向比利时当局建议把他们的盛会称为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系列的第一次

学术会议。上文曾经提及196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一个中国科技史研讨会。这是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仅有10几位参与者，而且没有一位中国学者与会。我们因此没有把它算在系列内。我因公事未能出席比利时的会议。

筹备第二届研讨会的四人小组由我当主任，黄兆汉博士任义务秘书，赵令扬教授和何冠彪博士任委员。中文系的同仁罗世略、高国治、谭焕琼、潘用财诸位系务同仁在筹备和开会过程中做幕后支援。开会期间筹备小组预先安排陈月玲、尚维瑞、陈远志、陈永明、张南峰、杨玉峰、容世诚、杨永安、查理文、曹光明等诸位助教协助招待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研讨会获得香港许士芬博士资助中国内地学者参加者的旅费，新加坡李氏基金资助新马参加者的旅费，以及日本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日本参加者的旅费。1983年12月14日至17日期间，第二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终于在香港大学召开了。[1] 出席会议者一共30人，其中14位来自中国大陆。大陆的学者由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博士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博士两位居首。他们一起乘搭火车到香港，我亲自乘搭香港大学的小巴往九龙火车站迎接他们。当时的站长是中文系的一位旧同学。他获知我来迎接几位著名的大陆学者，就安排替我的客人优先处理通关手续。我告诉我的客人不必依从其他人排队由正门通关，说“请你们跟我走后门儿；走后门儿比较快”，引得大家一笑。李约瑟本来答应参加这个会议，但后来改变主意。出席者之中有五位是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合作者。李约瑟托白馥兰博士（Francesca Bray）代他向与会者致意。[2] 在会上夏鼐提及李约瑟对考古学的重视，每次访问北京必定前往考古研究所探听最近有哪些考古学上的新发现。黄丽松校长设宴欢迎与会者。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毛文奇医生也在香港的大会堂酒楼设宴招待他们。送别宴由我做东，在亚历山大大厦的北京酒楼宴请与会者以及协助开会的中文系各位人员，并请来毛文奇夫妇和郑德坤夫妇作陪。刚好美瑶、奕康、淑姬和淑苹都在香港，他们各占一桌替我招待客人。淑姬也是这一年在昆士兰大学医科毕业。

1984年8月，我和美瑶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李约瑟和鲁桂珍也参加了这个盛会。详情在关于与李约瑟关系的下

[1] 会议中所宣读论文全部登载在何丙郁主编（1987年）《中文系集刊·中国科技史专号》第1卷，第2期。
[2] 白馥兰独自撰写198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6卷第2分册〈农业篇〉。她现任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另有分解。1985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陈民熙（Henry Chan）邀请我协助他组织第四届的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于是1986年6月，第四届的盛会就在悉尼大学召开了。我极力参加该会的各种活动。第五届的国际研讨会由程贞一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第六届的会议则由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主办。这是为庆祝李约瑟90华诞才建议在剑桥主办的。李约瑟邀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古克礼博士（Christopher Cullen）主办这个会议。在这个第六届的盛会中成立了一个东亚科技史学会。这个新学会决议每隔三年开办一次国际东亚科技史研讨会以取代以往的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一部分的中国科技史的专业者不满意这个议案，不想看到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从此烟消云散。结果要开东亚科技史研讨会的人们就开他们的东亚科技史研讨会，而要开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的人们也开他们的中国科学史研讨会。情况显然比以前更热闹了。90年代，我身为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不能厚此薄彼，还须尽量参与两方所办的研讨会。这事将留待我当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时期的下文再提。

与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我在香港大学任职期间，常有海峡两岸的学者来访，有些来开会，有些来讲学，有些只是过境。例如，1983年，我招待一批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科技史专业者。中文系的同仁中也有几位是来自台湾的。所以可以说与海峡两岸交流几乎是日常的事情。

1982年4月，我访问广州市中山大学，讲学一周。这是我第三次访问这个高等学府。这次我在中文系和哲学系做学术报告。这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大学中文系两系的同仁互相访问的开端。以往我跟台湾地区仅有公事和私人方面的来往，学术上的关系是由1982年开始的。1982年，我参与组织一个由香港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的“图书馆汉籍学研讨会”，由澳大利亚方面筹备大陆学者访问堪培拉的旅费和生活费，而台湾方面则由香港大学筹备。香港大学方面的负责人是文学院长李锷博士。由于开学术会议不能动用大学的公款，李锷院长还得从校外筹款。有一天，他邀请我陪他和一位殷商共进午餐，谈及开会的事情。这位殷商就问李锷所需钱的数目。李锷回答说他需要八万元。这位殷商立刻写张银行支票给他，带笑说，为这个小数目无须麻烦何教授，要他跑一次。给了钱也讲些好听的话，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香港有钱人的

作风。总之该年的8月，这个初次能看到海峡两岸的学者共聚一堂的学术研讨会在澳大利亚首府堪培拉顺利举行了。

台湾大学化学系的刘广定教授探听我是否有兴趣到台湾讲学。我很快就接到“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王寿南教授的邀请信，约我到台湾讲学。1982年12月20日，我带着美瑶和从澳大利亚来香港度假的淑姬和淑苹两个女儿，一行四众做台湾之旅。这是我首次在台湾做演讲。第一次的演讲是在“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由吕实强所长主持，演讲以李约瑟作为话题。[1] 这次的演讲有很大的收获。在发问时间中，有人问我为什么李约瑟从来没有到台湾访问。我反问听众是否有人曾经邀请李约瑟来台湾。我回到香港就立刻写信给李约瑟说他的台湾朋友等待他的来临。后来台湾发出邀请信，因而有李约瑟和鲁桂珍1984年9月的访台之行。我还在“国立政治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图书馆系先后做演讲。

我梦想不到这次的旅行，在公在私都有意外的收获。我启程往台湾的前几天，就接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来信，邀请我替该图书馆的金禧纪念日写一篇文章。我身为与该图书馆有密切关系的中文系主任，又与冯平山家属有姻亲之谊，必得承担这份差使。虽我未及执笔就动身去台湾，反而获得一些有关冯平山图书馆和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宝贵史料。我们前往台湾故宫博物院拜访行将荣休的蒋复聪院长。他告诉我40多年前他在南京主管“中央图书馆”时期的一段故事。“中央图书馆”曾因抗战的关系，把所藏的善本书运到香港，委托中文系主任马鉴和冯平山图书馆代为包装，然后邮寄美国，以便保存。不料在1941年香港也沦陷了，这批书全部被没收。战后某位先生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偶然发现盖有“中央图书馆”印的书，经过调查后，物归原主，一本也没有遗失。据说，许多由冯平山图书馆经手的包装还原封未动。蒋院长补充说，这批文物是无价之宝，若非南迁和获得冯平山图书馆妥善处理，很可能会遭受战火之灾。[2]

1982年，我在台湾所遇到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人员并不太多。我仅见到刘广定教授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萍研究员。1968年，王萍访问英国剑桥的时期我曾跟她会面。我还记得当时她问李约瑟，知

---

[1] 参阅何丙郁（1983年）〈我对李约瑟和《中国科技史》的认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台北）12:425-438。

[2] 参阅何丙郁（1983年），〈我所知道的冯平山图书馆〉，《港大通讯：交流》3:8，英文版3:9。

道台湾有他的翻版书后是否生气。李约瑟回答说，生气的人不是他而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他本人的立场，越多人看他的书越是好事。这次我是以中文系主任身份受邀请访问台湾，科技史专业只可居次位。当时没有料到，五年后我则以科技史专业者身份再次访问台湾。这个台湾之旅给我和我的家眷一个到日月潭和高雄的游览名胜观光的机会。

1984年，我和美瑶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会后往西安西北大学做学术报告。详情在关于与李约瑟关系下文另做交代。1986年11月，我受聘为西北大学名誉教授。除了在西安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外，还要做两次学术报告。[1] 在该大学的一位考古学教授和一位校医的陪同下，我参观汉武帝的茂陵、霍去病和另外一些汉代名人的墓等。我最感兴趣的是访问大兴善寺。这是唐代天竺高僧所住的旧址，与印度天文和占星术传入东土有一定的关系。1986年12月，我参加在台北南港主办的第一届科学史研讨会，并做专题演讲。这是我首次以中国科技史专业者的身份访问台湾，得以会见许多中国科技史同行。

1987年初，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弘祺博士向我索取我的学历和个人资料，说是受美国的一位友人所托，但是没有告诉我这位美国朋友是谁和他的用意。他仅说那是好意的，希望有好的结果。我猜想他所指的朋友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因为我们三人都和耶鲁大学有渊源，虽然我的比他们两位的较浅。李弘祺夫妇曾带我去郑德坤博士家探病，我也曾参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个“十六世纪中西科技史交流讨论会”。[2] 我猜想也许张光直的用意是邀请我去美国做一次演讲，我毫不犹豫就把所要的资料交给李弘祺，然而梦想不到事情的发展，使我以后跟台湾的学术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与日本的学术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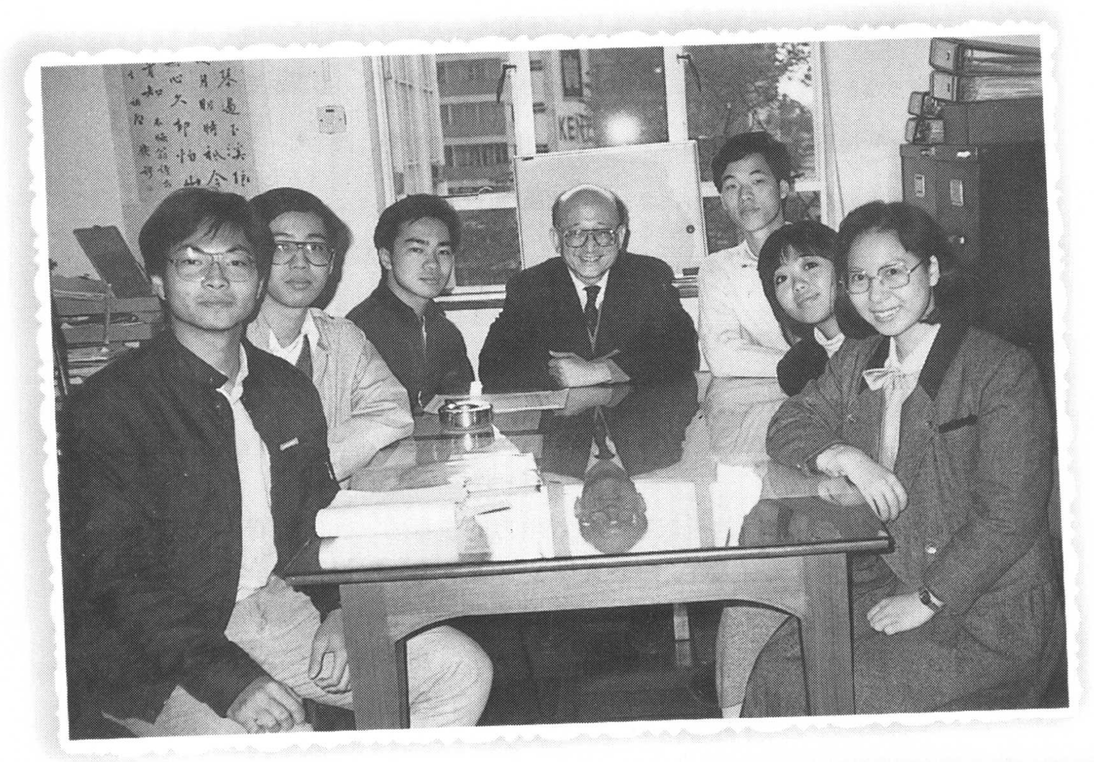
谈到中国文化的研究，香港一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学者和西方汉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留意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研究的人就比较少。其实西方的汉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两国的学者对中国研究的贡献。他们都起码具有阅读日文或韩文的能力。我开始在香港

[1] 参阅何丙郁（1987年），〈三十五年的科技史研究生涯〉，《西北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1-9；〈科技与文学〉，《西北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9。

[2] 参阅 Ho Peng Yoke (1991),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Lee, Thomas H.C., ed., *China and Europe*, (Hong Kong) 189-201。

大学任职的时期，同仁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传统中国文化系统的学者和曾经受西方教育培养的学者，只有一位年轻讲师黎活仁，曾在日本京都大学跟清水茂教授念现代中国文学，取得修士（即硕士）学位。我认为我应该对日本方面多些关注。黎活仁邀请我当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博士论文导师。虽然我对现代中国文学是完全外行，但是想起自己当年找论文导师的处境以及奥本涵老师对我的一片苦心，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做这回事，我就勉为其难。结果后来黎活仁提呈了一篇大受校外考试委员所赞许的博士论文。我在中文系开了一门中国科技史课程，希望将来我的任期届满后，中文系可以继续开这门课。有一位已毕业的同学冯锦荣曾念这门课。他对我说，有意出国进修科技史。我推荐他进入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在山田庆儿教授的指导下，他先后获取京都大学的修士和博士学位。山田庆儿是薮内清教授的一位高足，而薮内清与李约瑟同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冯锦荣现任职香港大学中文系，在国际中国科学史舞台上相当活跃。我曾经在新加坡、吉隆坡、布里斯班和香港的四个大学开过中国科技史课程。现在仅得冯锦荣在香港大学继承开科技史的课程。

不少日本的汉学家不习惯使用英文，也有些不谙现代汉语，在阅读



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室讲课前与研究生合照

序

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　何　丙　郁

水原渭江先生は燃えるような向學心と共に鄉を出で南中國海に浮ぶ香港へ留學するために渡り，昭和52年に遂に「南唐後主詞研究」という論文を提出して香港大學より文學博士の學位を修得された。關西に歸り，中國音樂史，日本雅樂史，民俗音樂，漢文學，詩詞，樂律等の研究に務め，現在は敦煌に於るSteinとPelliot兩氏の發見資料を基盤として當<舞譜>の解讀を完成し出版することになった。本書は新しく唐宋時代の音樂文化を解明する画期的な研究として高く評價され，また，中央アジア少數民族の文化に關する資料も同時に提供する貴重な文獻でもある。

敦煌が發見されて既に久しい，然し乍らその間これらの資料の解讀を試みた專門家は中國を初め日本にも幾人かいたが，それを十分學問的見地から掘り下げることなく今日に至った。幸いにこの難解な<舞譜>の解讀が完成したことは，敦煌研究の世界のみならず，廣く東洋研究の分野に於ても，多大の貢獻をするものと確信し，喜びに堪えない次第である。

(筆者の原文<日本文>のママ)

-4-

代水原渭江作序

方面，他们所精通的是以某时代或地方的古音阅读汉文书籍。当然精通现代汉语的也大有人在。如上文提过的清水茂教授说得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东京大学的卫藤审吉教授不仅精通英语，而且能说流利的汉语。有趣的是在不谙英语的日本人前，卫藤审吉常用英语跟我交谈，而在懂英语的人面前他就讲普通话，仅有两人独自交谈时才使用日语。当时能

用三种不同国家语言交谈的日本学者实不多见。我在香港时期的中文文书通常委托罗世略书写，英文文书就委托打字员。当时电脑处理文件尚未发展至现在的境界。我跟日本学界时有书信来往，我尽量用日文亲自书写，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1]

1981年8月，听说美瑶的姐夫李金辉医生在新加坡患直肠癌，我利用大学的学期假，去日本探听是否有新的治疗方法，顺便应日本友人的约会前往大阪参观万国博览会。会后去东京，在友人片野昭二的陪同下往新宿一所医院拜访一位癌症专家向他询问癌症的问题。这位名叫竹内的专家说，日本对症所下的药和新加坡所用的应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施药方法。日本的方法比较容易被人体接受。在东京的时候我也去找中山茂，讨论1983年在香港召开第二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的事宜。中山茂趁此机会约我一同跟出版商思索社讨论安排李约瑟访问日本的事情。详情另见与李约瑟关系的下文。

1983年8月底，我赴东京参加在东京和京都两地举办的第33届国际亚洲与北非洲人文科学学术会议。在东京赤坂太子大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中会见三笠宫殿下和汤川秀树教授。三笠宫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逗留一个时期，听到我来自澳大利亚而且还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亚洲学人，对我很友善。我在大学生时代已经念过汤川秀树的“介子论”，也认识这位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的两位兄弟。他们三位兄弟都是日本的著名教授。我在东京的时期，曾替日本放送局的教育电视节目用日语做录影，后来在9月20日的一个晚上，在第三电台“アジアの目：世界の目”的节目播出。

9月4日，我前往京都，住在京都大饭店。薮内清教授在附近的一个旅馆的四川菜馆宴客，托他的得意弟子矢野道雄过来引路，使我有意外的收获。赴宴途中，我的注意被在路旁摆档替客人用“四柱推命”法算命的两三个女相士所吸引。“四柱推命”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子平推命”法。从此激发了我对“子平推命”法研究的兴趣。无巧不成书，后来矢野道雄也以研究日本、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占星术而成名。他现任京都产业大学教授。我常跟他和中山茂讨论有关术数的问题。

1985年8月，我和美瑶从美国路经日本回香港。我们在福冈与日本旧识相会。我们访问冈山，友人小寺三郎带领我们登鹫山和参观跨越本

---

[1] 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时期的中文文书则通常委托翁绍凤小姐书写，英文文书也委托她和另外一位打字员文美凤处理。



在京都与薮内清教授和三田庆儿教授等共进午餐

州和四国岛的濑内海大桥。抵达京都的时候研究科技史的学者邀请我们到京都饭店共进天妇罗午餐，并和薮内清教授和三田庆儿教授共商讨1987年在京都主办研讨会的事宜。我们又访问大阪，在一位日本友人相陪下，我们参观了日本的佛教圣地高野山和高野山大学。

我觉得和日本的学术交流是一个机缘。我没有忘记，和韩国的学术交流也同样重要。只可惜的是缺乏了机缘，未能在这方面努力，替香港大学做多一点贡献。

与美国的学术交流

自从我去澳大利亚任职，访问美国的机会就很少了。在格理斐大学任职的初期，我跟美国驻布里斯班的总领事保持友好关系。但自从1875年美国关闭布里斯班总领事馆后，我就有一段时期和美国失了联系。仅有格理斐大学现代亚洲学院从美国聘请了几位讲师，可以从他们间接保持和美国学术交流的关系。

1985年7月，我和美瑶去美国加州，参加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

行的第17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宣读一篇有关敦煌天文残稿的拙作。[1]我宣读报告完毕，亚洲学会学报的主编立刻过来索稿。闭会后我们在三藩市和李方桂教授夫妇等共进晚餐，由李教授夫妇的千金 Lindy Mark 和女婿 John Mark 做东。翌日，我接受史丹福（编者注：即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的邀请，前往他的大学做一次公开演讲。

与李约瑟的关系

前文提及1981年8月，我在东京的时候，中山茂趁此机会约我一同和出版商思索社讨论安排李约瑟访问日本的事情。出席者有思索社的副社长片山宣彦，另外一位与会者是牛山辉代。牛山辉代是东京女子音乐大学的英文教授。她曾翻译过李约瑟的一些著作和在李约瑟和鲁桂珍访问日本的时期替他们做翻译。我们约会的地点是大仓大饭店的一个中国餐厅。我向他们提议迎接李约瑟要准备一部大型汽车，由于他的腿长要让李约瑟坐前座，而且由于他旅行时常带着不少行李，所以汽车的行李箱务必要大的。这次三位日本朋友的名字都带着一个"山"字。我笑着说，李约瑟在三座山的照顾下，他一路上应该安稳如泰山了。10月，李约瑟和鲁桂珍路经香港前往日本。我邀请李约瑟替中文系硕士班同学讲一次课。这个时候我正在和一位同事何冠彪合编一部《中国科技史概论》，就决定将这本书献呈李约瑟和鲁桂珍两位，纪念他们的访问。[2]李约瑟在香港停留的目的是为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建筑一座新图书馆而筹款。在香港他做客李守基教授家。有一天在李守基家收到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传来消息说，该信托会将把新建的馆命名为"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得知，甚为兴奋。[3]这次李约瑟去日本的主要目的是为出席思索社出版《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至第四册日文翻译本大功告成的招待会。闻说该出版社在出版这部翻译本时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便以原文的第五册第一分册尚未出版为由，把翻译的事情告一段落，不再翻译第四册以后的书了。

1982年3月底，我赴剑桥参加一个由联合国大学主办的研讨会。我抽空到李约瑟的研究室，发觉他已经审核我的〈火药篇〉初稿到最后一章。经过他的修改和补充，稿子页数也大大增加了。我过目后，李约瑟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85), "A long lost astrological work: the Dunhuang MS of the *Zhan yunqi shu*",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1:1-7。

[2] 参阅何丙郁与何冠彪（1983年），《中国科技史概论》（中华书局，香港）。

[3] 2002年11月，该信托会改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Trust）。

还要我提出意见。1982年9月，我听说该篇的文稿已经顺利完成了。

1983年，李守基年届香港大学的60岁退休年龄，转任澳大利亚的达士曼尼亚大学。毛文奇主席邀请我加入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作为一员董事以补李守基留下的空缺。

早在1982年12月，马来亚大学校长翁姑亚兹来访时，我曾经告诉他我正在筹备1983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第二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而且李约瑟已经答应来香港出席这个盛会。翁姑亚兹托我替他转告李约瑟，请他安排旅程务必经过吉隆坡，莅临马来亚大学再做一次公开演讲。我将他的愿望转达给李约瑟，获得他的同意。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毛主席也为希望能够向香港人士筹得更多资助，计划配合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科技史研讨会替李约瑟的贡献大做宣传。谁知人算不如天算。1983年6月，我接到黄兴宗博士从剑桥打来的电话说，他会参加香港的科学史研讨会，并且告诉我香港中文大学将授予李约瑟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过了几天我就接到香港中文大学马临校长的电话，建议我把开会的日期提前两个月到1983年10月，以方便李约瑟接受他大学的名誉学位。我无法答应他的要求。10月是学期时间，不能利用大学学生宿舍，要求参加者提早两个月完成论文也不近乎人情。结果李约瑟改变他的计划，提前在10月到香港中文大学接受名誉学位，而取消12月来港参加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的承诺。他对我说，由于年事已高不宜两个月内两次到香港远行。

这次去香港，李约瑟也改变访问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原意，而停留在新加坡。刚巧新加坡的华文报章转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通讯》所载我去年在该研究所的关于李约瑟的讲演。鲁桂珍对我说，当李约瑟看到拙文所写“他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这句话时，心里觉得十分感动。我是从鲁桂珍的谈话才知道新加坡的报章转登拙文这回事。我被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李约瑟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礼毕，我对李约瑟说，我该恭贺的人不是他，而是马临，恭贺马临成功获得他的同意接受中文大学的名誉学位以使他的大学添光不少。

接受了他的名誉学位后，李约瑟就从沙田回到香港，向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报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计划的进展以及介绍《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撰写和出版概况。他在香港大学担任第一回的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讲座的主讲者，先由黄丽松校长做介绍，然后由我致谢辞。我协助

基金会安排出版这次的演讲，也在讲稿出版过程中担任义务编辑。[1]

1984年3月，三联书店跟我预约的《我与李约瑟》脱稿。我将此书献呈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博士。4月1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蓝丽蓉博士来信，告诉我华侨银行名誉执行董事长丹斯里陈振传已经同意捐款资助李约瑟建筑新图书馆。一年前蓝丽蓉得陈振传的次女引见，向陈振传提及捐款事宜。他和陈振传的次女是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也替《东方文化》为李约瑟和鲁桂珍合编的（1983年）《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五册、第五分册写书评。[2] 同年8月，李约瑟和鲁桂珍前往北京开会途中停留新加坡。李约瑟首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次公开演讲，然后由蓝丽蓉博士引见丹斯里陈振传，获得35万英镑的大笔捐款。蓝丽蓉还带李约瑟去新加坡的李氏基金会见她的表哥李成义博士，他答应每年资助剑桥李约瑟研究所5000英镑。[3] 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也将筹来的15万英镑寄往剑桥，资助建筑李约瑟的新图书馆。



1984年一行五人访问西安
（中李约瑟，左一鲁桂珍，左二美瑶，右二黄兴宗，右一作者）

[1] 他的演词见 Needham, J.(1985), *Gunpowder as the Fourth Power,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2] 参阅 Ho Peng Yoke (1984), "Needham, J.and Lu Gwei-Djen (1983),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 part 5, Cambridg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22.1: 62-63。

[3] 李约瑟回到剑桥把这个事情忽略了，等到我去剑桥然后才有着落。现在李氏基金每年资助李约瑟研究所三万英镑。



李约瑟在奕康结婚宴会上致贺词

同年8月，我和美瑶同往北京出席第三届的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李约瑟和鲁桂珍也前来出席这个盛会。这次李约瑟在战时重庆时期的第一任秘书黄兴宗博士也来到北京。李约瑟的第二任秘书曹天钦博士也专程从上海来北京会见他。闭会后我夫妇俩和李约瑟、鲁桂珍、黄兴宗一同搭飞机前往西安。我在西北大学以“李约瑟的治学方法”为题做演讲，由李约瑟亲自致辞介绍我。[1] 然后我们一同参观秦皇兵马俑、华清池、碑林、清真寺等名胜。一路上我看到黄兴宗紧紧跟随着李约瑟，令我想起大约40年前他跟着李约瑟在战时中国的后方东奔西走的情况。黄兴宗显然十分兴奋，后来他对我说，跟着李约瑟跑来跑去使他感觉自己还年轻，虽然当时他已经65岁了。我们分途往上海，在锦江饭店会合。黄兴宗跟我夫妇两人先抵达，鲁桂珍晚一天报到，由于身体不适她比李约瑟早到上海以便就医。李约瑟到上海后我们一同庆祝鲁桂珍的诞辰。曹天钦和谢希德招待我们在他们的家进晚餐，鲁桂珍卧病不能参加。我在上海看到李约瑟的许多中国朋友会见他。2005年8月，美瑶跟我去上海住在王宝和大酒店，现在这些李约瑟的朋友都已作古了，连李约瑟战时重庆的

[1] 参阅何丙郁（1984年），〈李约瑟的治学方法〉，《西北大学学报》第45卷，第4期，1-5。

第三任秘书徐迓亭都在医院中卧病。2005年是李约瑟逝世的10周年，我倍感李约瑟的事情已成为历史的感慨。

1984年9月初，我和美瑶要赶回香港办理奕康和翠桦9月中旬的婚礼，李约瑟和鲁桂珍要在江南多留几天，然后去香港参加这个盛会。他们在香港做客我主管的柏立基学院。他们两人打算婚礼完就访问台湾。可是李约瑟担心鲁桂珍刚在上海患病复原后，难以承受旅途劳累。于是我就带鲁桂珍到玛丽医院找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杨紫芝内科讲座教授替她做健康检查。杨紫芝是当时香港医学界中最具权威的一位医生，而且也和李约瑟、鲁桂珍两人认识。经过她的判断，李约瑟才放心和鲁桂珍同往台湾，否则鲁桂珍就要留在柏立基学院，由美瑶照顾她，直到李约瑟从台湾回来。于是我们就送李约瑟和鲁桂珍到香港的启德机场乘搭飞机往台湾。从李约瑟的台湾来信，知道他们享受了一个很愉快的旅行。他们又获得一套《四库全书》名贵礼物和八万元美金的捐款。他们这次的访台之旅可说是满载而归。他们回到剑桥不久，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和研究室就举行了奠基仪式，由爱丁堡公爵莅临主持。

同年12月，我协助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安排席文来香港做该基金会的第二回讲座演讲。1985年，我协助安排夏鼐博士到香港做第三回的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讲座演讲，不幸夏鼐博士在演讲的一个月前突然病逝。我只得再协助该基金会安排邀请东京大学的中山茂博士在1986年10月到香港做第三回的讲座演讲。过后我向该基金会提议邀请北京科技大学的柯俊院士到香港做第四回的讲座演讲，这是1987年下半年的事情。由于我不在香港，安排邀请他的任务就与我无关了。

1985年，出版了一部我撰写献呈李约瑟的书。[1] 本来这部书是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介绍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巴比基（Peter Burbidge）请他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比基是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主席，也跟我认识。为希望当局仅从学术上的观点评估我的著作，我没有告诉他香港有人负责资助全部的出版费，而且我会将我得来的版税全部捐给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不料剑桥方面误认我这部书是《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节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部节本不会出版另一部。我没有再费时间向剑桥解释，假如这是学术上的问题我就无话可说，假如是学术以外的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85), *Li, Qi and Shu: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re-published in India under another title An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India, 1985), reprinted (2000),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5年在柏立基学院招待冯秉芬爵士和夫人（坐者），冯家是3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大学的长期大力资助者（站者从左至右：翠桦、美瑶、作者和奕康）

问题，也不必多说了。我就让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仅送一本给李约瑟，说是献呈给他的，而关于本书其他的事情就与剑桥无关了。从销量方面来说，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书。牛津出版社的印度分社在印度分销这部书。美国某些大学也采用这部书作为课本。2000年，当它宣告绝版时，美国纽约的多瓦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 Inc.）重印了这部书。

1986年11月，我在西安的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赶回香港迎接李约瑟和鲁桂珍，招待他们住在柏立基学院。我常在该学院接待贵宾和大学的赞助人。这次李约瑟和鲁桂珍是访问中国内地的途中，路经香港，顺便为建筑李约瑟研究所的南馆，希望能从香港的人士获得资助。这是李约瑟的第八次，也是他和鲁桂珍最后一次访华。我邀请50多位来宾，包括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全体董事和其他客人，在柏立基学院进晚餐。饭后由李约瑟介绍他的计划和告知大家他所需的款额。李约瑟提着手杖站立演讲，说他还需20万美元。毛文奇主席立刻召开一个基金会的临时会议。林马丽夫人说，她不忍心看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还要到处筹钱，派

他到来要钱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她建议不用多说，马上寄钱往剑桥。不费五分钟这个会议就通过一项寄给剑桥25万美元的临时提案。

在这次的宴会上李约瑟邀请我作为他将来的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接班人。他补充说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差事。这一年淑苹已经大学医科毕业，回想1972年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所做的考虑，我去澳大利亚的选择，不仅让我尽了儿女大学教育的责任，而且替我省了一笔相当大的教育费，使我现在无后顾之忧，不必斤斤计较薪酬的问题。我看李约瑟的身体和精神还好，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访华活动。当时我就答应他说，我希望他可以继续管理他的研究所，越长越好，让我有多些时间享受候任所长这个称号，而到必要的时候我将放弃我现任的职务，去剑桥担负这个义不容辞的义务重任。李约瑟马上向毛文奇主席等人宣布，说我已经答应做他的接班人。12月，我利用大学学期休假往访剑桥，希望多了解李约瑟研究所的近况。

1987年，我参加李弘祺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个“16世纪中西科技史交流讨论会”。同年，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刊登一篇拙文。[1]



落成后的李约瑟研究所南馆和后院

[1] 参阅何丙郁（1987年），〈西方天文学家串起：参观北京古观象台有感〉，方励之主编，《科学史论集》（合肥），101-116。

第六章

格理斐大学任职的后期

在离开香港回到澳大利亚述职前，我向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提出辞呈，辞退董事这个职位。在这个基金会服务期间，我跟毛文奇主席和义务秘书长利荣康博士合作得很愉快，颇有点儿依依不舍。我期望将来到剑桥任职后，还有机会和他们共同做事。

1987年4月，香港大学续借期届满，我返回格理斐大学任职。发觉人事、制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是意料中的事，况且新校长韦布教授跟前校长韦列教授的作风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两位以前都在墨尔本大学任教。韦列教授不时去泰国做大学管理顾问，常回到格理斐大学。我有机会与他相见，并谈及剑桥的事情。他是剑桥出身，获得硕士学位，是一位剑桥学生划艇名手。他夫妇两人跟我和美瑶建立了很好的友情。我们从来没有谈及他退休后关于校务的事情。新校长比较注重学历，尊重我的高级博士学位和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的资历。初时格理斐大学有

四个称谓 “School” 的学院，“School” 原是大学的基本部门 “Division”，主管称“Chairman”。新校长保留某些“School”为大学基本部门“Division”，主管改称 “Dean”。可是未到他的手，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已经失去原来作为一个基本部门（Division）的地位，不配称为学院了。它变成属于另外一个基本部门的小单位，而它的 Chairman 也只可说是一名组长了，不能称 “Dean”。虽然如此，新校长还称呼我为 “First Dean of the 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也用这个称号向别人介绍我。

我回到格理斐大学就再开科技史课。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在昆士兰大学图书馆里看到我跟李约瑟合撰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火药篇〉。我没有收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书，就去格理斐大学图书馆查看是否已经购入一本。当事人告诉我说，格理斐大学图书馆已经决定不再购买《中国科学与文明》这一系列的书。我只好向昆士兰大学图书馆借阅，发现在我的名下写的是香港大学而不是格理斐大学，而且书中没有提及格理斐大学。这都不是出自我的原意，可是我不知如何向该大学解释，所以



1987 年京都会议全体参与者

不敢问及该大学的图书馆不再购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原因。我也从来没有收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一本〈火药篇〉。后来只得在台北买了一本台湾版。[1] 这不是为省钱，而是原则上不满对作者这样的待遇。

1987年9月，我利用学期休假到剑桥一行，出席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一个会议。会议表决，正式委任我为李约瑟研究所的候任所长。当时看来李约瑟的健康还不错，我再说希望他可以继续任所长多几年，让我有多些时间享受这个候任所长的称号。同年12月，李大斐与世长辞，对李约瑟在精神上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她去世的消息，是在过了年以后他才写信通知我的。

1987年10月，我请假往京都参加一个为庆祝薮内清教授寿辰而召开的"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1987年京都座谈会"，并宣读报告。[2] 这个会议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日文和中文为会议语言。我还要替一位用英语宣读论文的参会者做翻译。我的一些"一步会"日本人朋友在京都开招待会庆祝我被选为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候任所长。岁月催人老，"一步会"的成员也日渐凋零，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同年12月7日，我利用南半球的大学暑假假期，到台湾做一周的访问。我分别在"中央研究院"、新竹清华大学和淡江大学做演讲。

1988年，我撰写的《从理气数观点论子平推命法》（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我以此书献呈钱宾四先生。同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中央研究院"吴大猷院长的电话，恭贺我当选为第17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这的确是事出意外，事前我毫不知情，也从来没有这个梦想。惊喜之余，我联想到此前李弘祺博士在香港向我索取个人资料这回事。韦布校长得此消息也写信向我道贺。

6月，我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第五届中国科技史研讨会，并做专题演讲。开幕仪式时放映李约瑟致贺词的录影带。观众突然看到李约瑟衰老的形象。我也吓了一跳，有了不会太久就需要到剑桥的心理准备。这是我最后一次在美国的学术访问。90年代，虽然我曾三次访问加州，但都是为探亲，与学术无关。其中一次路经纽约，参加会议，但是这是事务会议，与学术没有直接关系。

我接到"中央研究院"吴大猷院长的邀请信，约我访问台湾时了解科

---

[1] 这并非盗版，而是获得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的限于在当地贩卖的翻版。

[2] 参阅何丙郁（1992年），〈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科学史研究の动向と展望〉《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1987京都シンポジウム报告书》，164-172。

技史的研究和授课情况，并向他提出报告和建议。于是我向大学请假，从12月5日至1989年4月4日，访问“中央研究院”，做客数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三个单位。招待我的负责人是数学研究所的李国伟所长。我住在“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个在近代史研究所。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做了一次有关李约瑟的报告。[1] 每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会联合主办一次纪念傅斯年冥诞演讲。我被邀请做1989年度的讲演。[2] 我多次前往新竹，访问新竹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做演讲。李亦园院长和张永堂所长以同属圈内人的态度跟我恳谈。有一次，我和张永堂偶然遇到刘兆玄校长，张永堂向他介绍我。刘校长就说出“清华随时都欢迎您到访”这句话。这些都增加我对清华的亲切感。李亦园也跟我提及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成立的事情。他说希望我将来可以助该基金会一臂之力，又谈及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我还到过台北的“中央图书馆”、台中的东海大学和台南的成功大学做演讲。我在第二届的科学史研讨会做专题演讲。[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熊秉真博士跟我谈及她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并替我向葛兰素大药厂（Glaxo Company）的葛兰素基金会（Glaxo Foundation）的台湾代表人提出资助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问题，希望资助在剑桥做中药的研究。该代表人说他是很愿意资助这个研究所，但可惜这是在英国，台湾方面无权处理，要把申请案转交英国本部。以后就无下文。后来听说葛兰素公司资助剑桥大学设立一个医药学讲座，不知道与我的申请是否有些关联。1989年4月4日，我向吴大猷院长提呈报告后，就回澳大利亚述职。

1989年8月，我再往台湾，这次是参加台湾大学主办的一个“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4] 我利用这个机会到新竹清华大学拜访李亦园。再过几个月，我受委为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委员，经过几次连任，直到2001年为止。

1988年9月，我在澳大利亚接到李约瑟的电话说，他和鲁桂珍已经结了婚。我接着和东京的中山茂通电话，告诉他这个喜讯。中山茂笑着回答说：“元气だなあ！”，讲李约瑟身体还了得。我也略为放心，以为

[1] 参阅何丙郁（1989年），〈再谈我对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认识〉，《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第7卷，25-34。
[2] 参阅何丙郁（1989年），〈易数与传统科学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卷，第3期，493-505。
[3] 参阅何丙郁（1989年），〈从科技史观点谈传统思想中的数〉，*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第3卷，1-16。
[4] 参阅何丙郁（1992年）〈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7-25。

我还有希望在澳大利亚多教两三年书。12月，我利用大学的学期假到剑桥一行，以多些了解李约瑟和李约瑟研究所的情况。我发现李约瑟年事已高，已经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了，而李约瑟研究所的事情也变得比想像中更为复杂。我回到澳大利亚后就不断收到剑桥的来信，催我赶快去剑桥接班。

我在剑桥获知李约瑟研究所有经济上的困难。李约瑟和该所的总务（Administrator）饶南（Colin Ronan）提供我一张他们所称的“购物单”（shopping list），列下他们所需资助的项目。我在访问台湾时，已经跟蒋经国基金会和熊秉真博士谈及李约瑟研究所需要资助的事情。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毛主席和利荣康博士对我多方鼓励。我对他们两位都具信心，可是我也心知全靠香港方面独力资助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也是一件不公平的梦想。我在新加坡也跟一些朋友谈及李约瑟研究所。伍玉玲博士安排我去会见一位银行界富商连瀛洲先生。我拿着一封来自李约瑟的信，往他的办公室会见他。可惜时机不对，当天的早上报章登载一项他不愉快的家事。他心情不好，拿过我带来的信，一言不发。我知道没有希望了。

我在香港的时候毛文奇主席曾经替我介绍认识一位银行主管。听说这个主管和日本的富士银行有密切的商业来往，我就异想天开试图向富士银行申请资助。首先我去日本拜访东京大学的伊东俊太郎教授，获知富士银行的主管是东京大学商学部出身。伊东俊太郎是一位知名教授，也是当时日本奖的一位咨议委员。获得他的同意后，我就用日文写了一封信，托在香港认识的银行主管呈交富士银行的主管，信中提及伊东俊太郎，作为我的咨询人。不料这个事情毫无下文，有如石沉大海。伊东俊太郎对我说，富士银行没有跟他联系。我的信是否曾经到达东京是一件不便追究的事情。我在东京的时候，中山茂陪我访问豊田基金会，得知该基金会没有可能成为李约瑟研究所申请资助的对象。[1]

1989年，我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韦布校长向我道贺。本来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退休年限是1991年，但是在剑桥的不断催促下，不得已在1989年12月提前退休。退休前韦布校长授予我格理斐大学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的称号。后来我在两三个场合和他相见。他说在我的剑桥工作完成后，希望我回格理斐大学指导研究生。可是在我剑桥任满的时候，他本人已经退休，而我协助创办的现代亚洲学院也不见踪影了。

[1] 中文“豐”和“豊”字异音同义，日文合为一字，字从“豊”，音从“豐”，中文简体作“丰”。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第七章

《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主编

作为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一般人会认为我是替李约瑟完成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负责人。事实并非如此。1990年4月，我抵达剑桥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职务时，李约瑟告诉我说，他已经邀请黄兴宗博士主管《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编写。当时的主管称“联系人”(Co-ordinator)。虽然他事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但是我不但立刻表示欢迎，而且向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建议委任黄兴宗为副所长，负责所内财务。信托会同时委任鲁维一博士（Michael Loewe）为另外一位副所长。鲁维一原本是信托会的一位董事。

其实管理《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编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许多事情管理人都没有办法控制，例如，执笔者的交卷日期，甚至执笔者是否可以完成他们的任

务。有些执笔者中途放弃他们的任务，也有些执笔者完成文稿后，不向剑桥交卷而各自出版自己的书。绝大部分的执笔者都不在剑桥，有些是已经成名的学者，许多执笔者参加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是属于义务性质。李约瑟称执笔者们为“合作者”（Collaborators）。[1] 处理《中国科学与文明》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在上任前已经为这个问题动过脑筋。可是局外人误会这是一件有权有势的差事。黄兴宗就因此而树大招风，仅仅几个月，不是由于他犯了错误，他的这份差事就易了手。信托会委任鲁维一为“主编”（Editor）。联系人的职位就失了作用而告消失了。李约瑟和鲁桂珍在会议上讨论这个案件时，一言不发，我就不便开口了，况且我心知主编也不是一份好差事，何必替黄兴宗出头呢？

还有，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各分册的合作者都喜欢直接和李约瑟本人联系。我上任后不几天，就有一位合作者走进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约瑟的合作者，而李约瑟刚才告诉他说我将会向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找钱资助他的研究。我回答说，李约瑟没有跟我提过这类事情，假如他要我直接向蒋经国基金会申请经费，那就是等于强迫我辞退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义务职位，这样对他和李约瑟都没有好处的。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告知年事已高的李约瑟，也没有浪费时间追究是否有人假传圣旨。总之，事情过了14年后，才听说这位合作者已准备交卷了。再说，作为《中国科学与文明》主编的鲁维一博士，大约再过一年，他就因为站在另外一位合作者和李约瑟的中间所引起的风波，而自动提出辞呈。1992年初，古克礼博士（Christopher Cullen）继任副所长兼主编职，《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全部完成之日也有望了。

我没有把《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事情完全置之不顾。虽然我从来没有干涉主编的工作，但我随时乐意帮助他。例如，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医药篇〉的篇幅显得太少，主编忧虑可能引起非议。我就替这部书写篇书评，向读者解释李约瑟编写它时的困境。[2] 台湾方面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中译本曾引起版权的问题。我协助台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之间的谈判。有些合作者也不时找我讨论学术性的问题，我都尽我所能替他们解决。总的来说，我还要感谢李约瑟使我肩上少了这个主编的包袱。我猜想也许他是故意这样做，减轻我的负担，希望我可以照顾

[1] 由于collaborator这个名词曾被用在欧战时期与德军的合作者，有些执笔者不喜欢它。

[2] 参阅 Ho Peng Yoke (2000),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I.6 edited by N. Siv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8.3-4: 451-452。

一些他从来没有余力处理的事情。

我猜想李约瑟为一心一意撰写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所以未能分神顾及其他的事情。他的专心就是他成功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一个秘诀。可是这样一来，他没有兼顾许多重要的事情，例如，培养新一代学者，如何与剑桥大学建立密切关系，李约瑟研究所同仁的福利和前景，李约瑟研究所在将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整套书完成后的用途等。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累次邀请李约瑟在大学开中国科技史课，提及这个课程的重要性。每次李约瑟都说，对他而言占优先的是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不管对方提出的是什么道理。[1] 没有《中国科学与文明》这个包袱，我获得许多自由，得以替李约瑟做些他无能力顾及的事情，我也无须限制我的学术活动在李约瑟研究所的范围内。

吃亏反而得益

我放弃澳大利亚讲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去剑桥当义工，从经济上来看是一件极不上算的作为。我也很难向关心我的局外亲友解释我的行动。可是在李约瑟研究所当时的场合，不领薪有不领薪的好处。一个受薪的所长当时不仅会树大招风，而且还要讨好几个意见不同的东家。这样的一个所长恐怕我是做不下去的。我赴任前，李约瑟研究所的总务替我向英国政府申请工作允许证，须要我向警察署报到和登记。我一到剑桥就优先办理这件事情。管理登记的女警官听说我是当义工，就告诉我说我无须去见她登记，而且按照法律，我没有薪酬就没有雇主。她又指出由于我是澳大利亚公民，随时欢迎我访问英国，无需签证。假如我在英国另觅职业就必须先申请工作证，到时可以再找她做登记。我没有浪费时间查问李约瑟研究所的当事人，问他何必多此一举。我料这不会是李约瑟亲自安排的事情。也许有人要把我看成一个不费钱的雇员。我不必详细描述李约瑟研究所当时的复杂情况。更不想讨论谁是谁非。事情多数环绕着年迈的李约瑟和鲁桂珍两人的身上。例如，伦敦的一位学者取笑着说，我去剑桥上任后就要应付那里的“慈禧太后”。李约瑟研究

[1] 这是李约瑟的性格。我想起鲁桂珍告诉我一件50年代在巴黎发生的事情。有一次他开车和鲁桂珍一起从相反方向闯入一条临时改的单行马路。一名交通警察指示李约瑟停车向他质问。李约瑟装着听不懂法语，一言不发，只拿出地图指来指去，表示他想开出这条马路要去的地点。这样一来，过来的车辆越来越多，造成交通堵塞。这个交通警察再没有向李约瑟盘问了。为着恢复交通的流畅，他下令前来的车子停下来，让李约瑟先把车子转回头离开。

所是直接由英国的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管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巴比基是该信托会的首任主席，也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发起人。鲁桂珍是信托会的一位成员，而李约瑟是研究所的创办人（Founder）和所长（Director）。他以创办人或所长的身份出席会议，无投票权，但是信托会绝少违反他的意思，而且表面上该会的人说都是为替他办事而开会。李约瑟和鲁桂珍都存有他们是信托会主人的心理。80年代下半期，他们两人已经年迈。信托会使人代替李约瑟处理许多所内的事务，说是帮老人家的忙，让他有多些时间撰写他的书。鲁桂珍则对我说有人阴谋夺权。1988年访问剑桥的时候，鲁桂珍已经对我说务须留意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双方都有他们的道理。我没有当他们裁判官的能力，也没有人授予我这样的权力。我仅能按事而为，随时准备让位。

香港和纽约各有资助李约瑟研究所的基金会，它们都被剑桥方面看作为剑桥信托会的分会。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替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向外筹款。剑桥的信托会本身不能在英国和欧洲方面获取资助。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支援对象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建筑；李约瑟有些香港朋友的支援对象是李约瑟本人。纽约方面的兴趣是在资助《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出版。剑桥信托会把经费来源依赖着它的两个所谓分会。信托会的成员中有两三位来自凯思学院的李约瑟多年老同仁，有些来自剑桥大学的各部门，也有些来自社会中的专业者。我观察到“各为其主”在剑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凡事务须首先顾及自己所属单位的利益。有人认为中国科学史是汉学的一部分，参与李约瑟研究所的活动亦即对汉学做贡献，从而把李约瑟研究所向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拉近。在理论上我认为李约瑟研究所应该和剑桥大学拉近，其实我任所长期间也在这方面尽了一番努力。可是难在寻求一个保证李约瑟研究所独立的良策。李约瑟和香港的基金会都极力坚持确保这个研究所的独立地位。我到剑桥上任的时候巴比基已经与世长辞多年。[1]当时剑桥信托会的主席是一位伦敦金融界的名人，由于事业太忙未能抽空去剑桥亲自处理所里事务。他只得依赖三四位常驻剑桥的亲信。他们有些是信托会的成员，也有些是接近李约瑟替他处理日常事务的人。本来照理这样的安排未尝不妥，不

[1] 这并非说我认为巴比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主席。他是《中国科学与文明》和李约瑟研究所的幕后人。目的是为着使李约瑟和帮助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人替他的出版社赚钱，和利用李约瑟替他发动的李约瑟研究所在香港和东南亚筹款。他的专长是管理，但并非一个学者，他本人的兴趣也与中国文化研究无关。

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一个90岁高龄而且行动不方便的人身上也不足为怪。可是如果同样一个老人兼有权势和钱财管理权，被人利用的嫌疑就容易产生。又如果替他处理日常事务的人的年纪也跟他相差不太远，不寻常事情的起源就更不易追究了。所内发生的问题就越发引起香港和纽约两方的关心，因而李约瑟研究所的资金来源就受到牵连。当时该研究所的资金来源都靠东亚、东南亚和美国。1987年，香港和美国两位基金会主席已经同时表示剑桥的信托会应该自己在英国和欧洲筹钱，而不该只靠他们的两个基金会。后来建议也纷纷从香港和纽约而来，从东方来的只指向剑桥的信托会，从大西洋方面来的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可是这些建议也不容易获得剑桥信托会和李约瑟本人的接受。

剑桥的信托会认为管理李约瑟研究所的主权是完全属于它的。香港和纽约的两个基金会则认为他们有权干涉该所的事务，香港方面也有些人认为该所是属于李约瑟本人。无论谁是谁非，在三个会以及李约瑟之间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避免得考虑顾及四个不同意见的“雇主”。这是唯有当一个义务所长的人才能享受的权利。

向外筹款

80年代，李约瑟研究所的经费来源全靠李约瑟的努力。剑桥信托会的大部分成员不认为替该研究所向外筹款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他们都有自己的正业，绝不会把李约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业更重要。例如，信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是某学院的院长，有机会筹款他的责任当然是以自己的学院为优先。况且东亚科技史本身尚未能够引起英国本地人士的兴趣，求他们解囊资助可说是难如登天。李约瑟在英国的名气也远比不上在东亚地区这么响亮。我多次遇到剑桥的人，甚至剑桥大学的毕业同学，问我李约瑟是谁。试图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国筹款也不是办法。剑桥信托会曾经派人代表李约瑟到香港寻求支援，但是都未能如愿而归。剑桥将香港筹款的事情都寄托在李约瑟一个人的身上。如今发现我获得毛文奇主席的信任，因此他们都很乐意得到一个，尤其是对权力没有多大兴趣，与世无争，而且有能力替他们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获取资助的义务所长。

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李约瑟本人和剑桥信托会都期望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替他们多筹些资金。我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新加坡李氏基金会联系，开始执行1984年在新加坡和李约瑟所谈的捐款承

诺。李氏基金会每年所捐的款项由开始的5000英镑提升到目前的三万英镑。在鲁维一副所长的协助下，我从伦敦的英国大和基金会（Anglo-Daiwa Foundation）获得一笔研究资金，提供两名日本研究生在李约瑟研究所进修。在古克礼博士主持之下，第六届的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顺利在剑桥召开。我曾协助这次的研讨会从东亚地区获取资助。这都是我上任后最先做到的事情。

鲁桂珍的简介

李约瑟和鲁桂珍同时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我替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写了一篇关于鲁桂珍的简介。[1] 一年前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曹婉如研究员有意写鲁桂珍传，托同事何绍庚研究员在访问剑桥的时期向鲁桂珍索取资料。鲁桂珍告诉我说，她没有答应提供资料，仅建议要写她的传记的人可以从《世界名人录》去找。[2] 她还补充说，她活着的时期，不愿看到关于自己的传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陈美东所长就找上门说，我是写鲁桂珍传最理想的人物。我回答说，由于我跟她太接近，虽然知道她的事情比许多人多，但绝对不适宜替她写传。我不是对鲁桂珍存有偏见，五年后牛津的全国名人传记邀请我替李约瑟写传记。我也是以同样的理由婉拒，而推荐别人担此重任。其实，要写他们两人的传记谈何容易。李约瑟的遗言要把一切有关他个人生活的文件归剑桥大学图书馆密藏，等待他逝世50年后才公开，让读者参阅。密藏的文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鲁桂珍和李约瑟的来往书信。

可是陈美东的盛情难却。为两全其美，我向他提供一篇简介，把重点转移到《中国科学与文明》这部书上。我在这篇简介里说“没有鲁桂珍就不会出现一个李约瑟和一部《中国科学与文明》”。鲁桂珍不但在李约瑟面前朗读这句话让他听，而且向我多要一份抽印本，用来送给他的老朋友戴连理。她又说，由于我写了这篇好文章，她要称我“老弟”。她告诉我说，她离开中国后，一直都很少朋友，在美国时认识吴健雄，在英国仅有濮子明（Benjamin Platt）夫人和戴连理（Mrs Lianli Jackson）。她讲的当然是她的同年辈知己。她的三位知己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尤其是吴健雄。1990年，我初次遇见吴健雄时就代鲁桂珍向她致候，她也关

---

[1] 参阅何丙郁（1990年），〈鲁桂珍博士简介〉，《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第4期，25-27。

[2] 她没有提及是那一年的 *Who's Who*。其实所载的简略资料对写她的传记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心鲁桂珍的近况。濮子明是鲁桂珍30年代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服务时的上司。他以研究维他命闻名于世，回到英国后在伦敦大学的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任教授职。他的夫人与鲁桂珍私交很好，鲁桂珍通常去伦敦就在他们的家度周末，直到60年代他们谢世而止。照顾鲁桂珍和李约瑟晚年的大夫卡特来医生（Dr.Cartwright）是濮子明的一位高足。戴连理原是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华侨，后来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杰逊（Meredith Jackson）法学教授结婚。杰逊教授是新加坡李光耀在剑桥念法律时期的一位老师。戴连理本人也是学法律的。她热爱中国，并关怀在剑桥留学的华人学生。她是我第一次听到唱“东方红”的人。这是远在1958年的事情了。1990年，鲁桂珍和李约瑟常在周末到她家共进晚餐。偶尔我也做伴参与这三位老人家的约会。1991年的上半年，戴连理谢世，跟着在同年的下半年鲁桂珍也与世长辞。



1990年在新竹大学刘兆玄家与吴健雄等聚会（坐：左一陈省身，左二李政道，左三李远哲，右三吴健雄，等；立：左一杨振宁，右四刘兆玄，右二作者）

东南西北奔波

我以前在大学任职的时期，可算是已经走遍不少地方了。我没有料到，年过花甲的时候还要比以前到处跑得更多。我多次在中国内地、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奔波，也到过韩国和美国。我每年到台湾出席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会议一次，每两年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一次。旅费都由台湾方面提供。我利用往返台湾的途中办些李约瑟研究所的事务。李约瑟研究所仅负责支付我个人每年一次往返澳大利亚的商务舱飞机票。由于我身体健康的关系，我已经不适应乘搭经济客舱做长途飞行了。我也多次被邀请到各处开会或讲学，有时由对方提供飞机票，有时我利用开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会议或“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时机替对方省一笔钱，有时在对方仅能提供经济客舱飞机票时我就得自己补钱购买商务客舱机票了。

1990年6月，美瑶从澳大利亚来剑桥。该月底她陪我横渡大西洋去台湾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我利用这个机会在纽约停留，会见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主席和会员。从1987年开始，纽约和剑桥之间发生了误会。当剑桥向纽约要钱时，纽约方面说它仅负责资助《中国科学与文明》某些分册的撰写，而且责怪剑桥方面违背诺言，没有如期完成这些分册，使纽约方面难向捐钱的人交代。李约瑟坚持他从来没有下过这个诺言，剑桥方面向纽约解释说，这句话可能是出自别人的口。纽约方面认为李约瑟也应该负责他的代表人所说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所遇最难堪的会面。纽约方面误认我是一个有实权和负责《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所长，以雇主的口吻向我盘问那些分册的出版日期，以及如何处理李约瑟的处事问题。我答非所问，告诉他们我并非《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负责人，同时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使他们感到我这个所长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从纽约飞往三藩市探亲，会见美瑶的大姐冯范如和姐夫杨炯煊以及他们的家属。从三藩市我们乘搭飞机往台北，在南港出席“中央研究院”第19届院士会议。这是我首次在院士会议出现。会议期间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宣读一篇关于李约瑟研究所的报告。[1] 会议后我们去香港，会见林炳良夫妇。他们是李约瑟的老朋友。林炳良正在筹备一个象牙历史人物作品展览，希望将一部分入场费收入捐给李约瑟研究所。可惜后来

---

[1] 参阅何丙郁（1991年），〈李约瑟研究所与中国科技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第12卷，45-49。

担心象牙艺术品会受非议，林炳良就放弃这个计划。我们获得他答应资助在剑桥聘请一位年轻助理，照顾李约瑟在研究所的一切。在回返布里斯班的途中，我们在新加坡停留了两三天，探望奕康和翠桦以及一些亲友。

在布里斯班仅逗留两个星期，我又离家前往剑桥。8月18日，我有台湾和北京之行。我先到吉隆坡探望我年迈的母亲。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面。几个月后，我在旅途中听到她辞世的噩耗，哀痛之余，我沉思古人的"父母在不远行，行必有方"这句话，是否有古今不同的解释。8月23日，我离开吉隆坡前往台湾，出席在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一个现代中国科技史国际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宣读的报告是有关19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中国士人间的普及。[1]

8月29日，我去香港，住在柏立基学院。香港大学的王赓武校长邀请我到他家晚宴，告诉我香港大学将主办1993年度的第34届国际亚洲和北非洲学术会议，希望我协助这个会议的一个有关亚洲各处科技交流研讨小组。我说乐意为这个小组一尽绵力。我也参与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一个会议，讨论香港殷商田家炳先生所捐款的问题。这笔钱是用来资助李约瑟研究所建筑南馆的费用。我又跟林炳良夫妇共进午餐，向他们报告李约瑟的起居近况。

9月4日，我从香港上京。自然科学研究所派车到机场迎接我。抵达自然科学研究所就看到另外一辆从北京科技大学派来的车子等候着，迎接我去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委任我为名誉教授。9月5日，在一个中国科学史学术会议的开幕典礼，大会的主席卢嘉锡授院士授予我中国科学院名誉教授和中国科技史学会荣誉会员的证书。接着我做专题演讲。[2] 当天晚上，北京广播电台播出我演讲的短片。9月7日，我出席一个庆祝《中国科学与文明》中译本第一至第三卷的出版仪式，坐在钱三强博士身旁。我在会上发言，代表李约瑟向中国人民致谢。当天晚上，我的致词在电视上出现。9月9日，在陈美东所长陪同下，我往中南海拜访江泽民总书记。后来听闻这次的会面是由卢嘉锡安排的。在历时37分钟的谈话中，江泽民说他在大学求学时是属于真空管时代，深感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他问我对中国现代化的感想。我回答说60多年前的上海是亚洲最繁荣的

---

[1] 参阅何丙郁（1991年），〈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技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中国科技史专刊》（台北），19-31。

[2] 参阅何丙郁（1991年）〈试从另一观点探讨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薄树人编，《大自然探索》（成都）第10卷，第1期，27-32。



1990年晋见江泽民，坐右边的是卢嘉锡

城市。由于多年的战乱，许多上海和江浙商人南迁往治安比较安定的香港。他们很有生意头脑，对香港的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我相信上海和江浙的商人有这么好的商业头脑，很快上海就可以迎头赶上，比香港更繁荣。讲到这里我听到有人细语说，江总书记是上海人。我马上改口道歉说，早知道我就不会这样说。我看到江泽民脸带微笑，把话题转到中国科学史上，问及李约瑟。后来他对陈美东所长说，科技史可以搞，可是千万不可搞出一个沙文主义。他的下一位客人是基辛格博士。当晚的北京电视台又播出江泽民会见我的新闻。陈美东告诉我说，这次的会见是中国对李约瑟研究所和对我的肯定。

9月10日，白尚恕教授邀请我去北京师范大学主持一个座谈会。白尚恕是20世纪下半叶后期的一位杰出中国数学史家。1983年，他跟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教授和西安西北大学的李继闵教授一同参加我在香港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他们三位都是极负盛名的中国数学史家，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众人皆知的。

9月11日，我从北京去东京。当天晚上，日本数学史学会的下平和夫老教授，邀请我在新宿的一个晚餐兼讨论会上，简单介绍我最近在北京的演讲和谈及李约瑟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当时我有一些朋友正在考虑在新建立的“京阪奈科学城市”的关西国际学术中心设立一个东亚科技

史中心。推动这个科技史中心的人是桃山大学院的后藤邦夫教授。我就前往大阪会见他，商讨以后和李约瑟研究所互相合作的事宜，如两方学者交流、图书的交换、日文书的翻译、工作研讨会等。后来后藤邦夫在1991年5月亲自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和鲁维一副所长继续谈合作的事情，然后去美国度过他的研究休假。不料日本的经济逆转，在日本设立东亚科技史中心的计划顿成泡影。

9月20日我回返东京。21日，我去拜访日本学术振兴基金会（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理事长下河边淳博士，并会见研究计划部主任山川英明和研究员平川幸子。平川幸子负责处理一项李约瑟研究所申请资助《中国科学与文明》〈结论篇〉案。这是一项申请三年资助的提案，需要每年提出申请，并向基金会报告研究的进展。本来该基金会已经向李约瑟研究所提供1989年度的首次资助，可是由于手续上发生问题，1990年度的资助未能发出。李约瑟也为这事情烦恼，不知道事出何因。下河边理事长就请平川幸子跟我两人解决这个问题。平川幸子说，她很害怕对手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人家，十分高兴有机会跟我谈这个事情。我没有告知她，和她有来往文件的是另外一个老人，而并非这一位受人敬重的老人家。这是由于我无法知道文件内容的哪部分是出于李约瑟的本意。她拿出一张申请表，告诉我说，只要把这张表填好，事情就好办了，寄来的一大堆长篇大论的文件是不能帮助她向基金会做交代、批准寄款给李约瑟研究所的。她还向我指示填表的方法。这次访问东京就替李约瑟研究所解决了日本学术振兴基金会资助的问题。本来日本学术振兴会的下河边淳理事长早已答应资助李约瑟本人，问题仅出自有人不习惯对方的处事手续。这里我不过是替李约瑟把事情搞清楚，没有替他筹钱。

李约瑟本人的直接援助资金有三个来源。一个是资助他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结论篇〉的日本学术振兴会，一个是资助他编写同一部书的〈医药篇〉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还有一个是资助聘请照顾李约瑟在研究所内起居研究助理的林炳良先生。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还资助李约瑟研究所购买图书。

1991年2月至6月，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国科会特约讲座职，主持硕士班的科技史课程。我向毛高文教育部长提呈一份建议书，建议把科技史列入公费留学生的认同学科。我的建议获得接受。因

此首次的台湾科技史留学生就获进伦敦大学念博士学位。我在新竹写了一本献呈我恩师奥本涵爵士的《海纳百川》。[1]

1991年7月，我回到剑桥，在剑桥信托会的一个会议上看到一项提案，建议把我提升为总所长，日常行政事务交由一位新执行所长管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意图干涉我在亚洲的活动，或者这是一个夺权的企图。虽然我对权力已经不感兴趣，但绝不会为一个虚称名号而到处筹钱让他人任意支配。我知道这个提案不是出自李约瑟本人，而且李约瑟和鲁桂珍也不同意它。总之我觉得提案人一方面企图划分所长的权力，另一方面希望我专心替信托会多取些外来资助。我不能在会上讲我怀疑有人别有居心，尤其是我不过是一名被邀的参与者，而并非有投票权的信托会委员。我只得郑重向信托会声明，若然信托会要得到一个唯命是从的所长，它随时可以花钱聘请一个受雇的所长，我是随时准备退位让贤。信托会就没有表决这个提案。后来我还入选为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委员，我也不再遇上类似的烦扰了。

虽然我的年龄不能和李约瑟相比，但我当时已经65岁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毛病，理当保重身体。尤其是我这个上了年纪而离家远居在一个医药服务较为不方便的地方引得家人挂心的人。[2]不食君之禄可以避免一些有害身体健康的精神压力。我尽量避免介入权力之争，我没有理由临老还追求我年轻时代所尽量不做的事情。我的与世无争和准备随时让位的态度反而使我的所长职位稳如泰山，不怕有人来争。反而我常心存警惕，千万不可等到自己达到像李约瑟的身体状态的时候还留在剑桥，留下来必定会害己兼害人。因为年迈而功成身退，是人生中的一个愿望，但是为防止自己的年迈影响公务而退位，就比较罕见了。

我在英国的学术活动不限于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范围内，但都间接和该所的声誉有关。英国的学者们都对我很好。剑桥大学东方学部邀请我做该学部的部务委员会委员。我被选为1991年度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科学史组的主席。恩师奥本涵爵士从广播电台听闻这个消息便写信向我道贺。我还去普里茅斯（Plymouth）参加该年的英国科学促进会大会。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德尔拉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邀请我去演讲。

[1] 参阅何丙郁（1994年），《海纳百川:中西科技交流史》（台北）。

[2] 英国有很好的医生，医院也有很好的设备。问题是在手续上，我在澳大利亚需要看医生或者住院比在英国方便和省时得多。

我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做一次演讲后，不久就被委任为该学院的教授级研究伙伴（Professional Research Associate）。[1]我曾以这个身份担任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的校内主考，也曾做过该大学博士生考试的校外考试委员。我还到过一所中学校向高年级的同学们讲学习中文的问题。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主任跟我提及他的植物园中种有许多原产于中国的花卉。我向他建议在花卉盛开的时节，邀请当地华人到园观赏，以联络民族之间的感情。

多事之秋

1991年的下半年，李约瑟研究所经历一段不愉快的时期。本来我去台湾讲学前早已告知所内的人，我将在下半年接受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做三个月的客座教授，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到槟城会见一位姓林的殷商，请他捐款资助李约瑟研究所聘请我将来的接班人。我的所长任期该在1994年届满。这个提议来自香港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香港方面的人不认识这位姓林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大名。可是我去槟城将会做客槟城州长的官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见他，同时我也希望跟阔别多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取得联系，以便将来李约瑟研究所向该地区的华人求助。这也是我打算访问马来西亚的动机。谁知我在新竹就传来我在剑桥的两位副所长之间发生问题的消息，他们都要在1991年的下半年去美国，不愿意在我访问马来西亚这段时期留在剑桥镇守李约瑟研究所的大本营。其中一位也不同意另找一位所内的人代理所长的任务。这两个副所长都是当义工的，我不能搞下命令这一套。于是我就取消马来西亚之行，让我的两位副所长去美国。我猜想也许我去马来西亚的计划与把我提升为总所长的建议有些关联。我在新竹的时候，已经接到鲁维一来信说，李约瑟研究所管理机构面临瓦解，等我处理。他对我取消去马来西亚的决定表示满意。想不到三四个月后，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但和以上的问题无关。上文已经提及，鲁维一就因为站在一位合作者和李约瑟的中间所引起的风波，而自动提出辞呈。一个月后，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主席也以别的理由向信托会提出辞呈。李约瑟和鲁桂珍很关心将来的主席和副所长的人选，尤其是新主席。他们跟我商讨这

[1]参阅Ho Peng Yoke (1991), "Chinese scien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5.3:506-519。

个事情，同时计算站在李约瑟一线的信托人票数。鲁桂珍还说千万不要忘记她的一票，算出同他们阵线的票数是超过半数仅一票。哪知鲁桂珍所讲自己的一票结果没有派上用场。1991年11月，她生病了。这是肺部的问题，医生和看护到家为她看病。11月21日上午，我离开剑桥乘搭飞机往新加坡前，见她最后一面。再过几天她逝世的噩耗就传到新加坡。

我去新加坡的目的是应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作为梅耶学人（Isaac Manasseh Meyer Fellow），任期从12月1日至15日。我早几天到达新加坡是为试图在马来西亚引起研究阿拉伯科学史的兴趣，希望将来有一个阿拉伯科学史研究中心。当时我一位年轻时代的朋友敦哈姆丹（Tun Hamdan）任槟城的州长。我去槟城就做客他的Seri Mutiara官邸。他对我的提议甚感兴趣，就亲自打电话给马来西亚科学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的校长安排我去会见他。于是乎我就去见这位校长。他说他的大学重视回教科学，并叫来负责这门课程的讲师，要他向我请教。我很快就发觉有点不对路。虽然对方对我很友善，但我所讲的是以前回教人士对科学的贡献，而对方所讲的是回教教义的科学。我此行没有什么收获。我路经吉隆坡回新加坡，在吉隆坡会见马来亚大学奥斯曼校长（Osman bin Taib），跟他谈及此事。他说这是意料中的事。看过我在吉隆坡的弟弟和妹妹后，我就回到新加坡，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内的特马瑟楼（Temasek Hall）招待所。我做一次公开演讲，讨论算命是否一门科学。[1]我就是在新加坡的期间，才收到鲁桂珍逝世的噩耗，当地的华文报章向我采访问及此事，并关注李约瑟的健康和今后的起居情况。我从新加坡回到布里斯班家度年假，同时躲避英国寒冷的冬季。

李约瑟研究所回归正轨

我本来打算春初才回到剑桥。1992年1月，剑桥信托会开会选新主席和讨论鲁维一退任的补缺。香港毛文奇主席授权我代表他在会上投票，加上我个人拥有的投票权，我就有两票可投，可以补救因鲁桂珍去世而失去的一票。在这个情况下我就不动声色，突然回到剑桥赴会。会议的结果如同所愿，选出的新主席是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院长莱德爵士（Sir Geoffrey Lloyd），同时聘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古克礼博士兼任享

---

[1] 参阅何丙郁（1991年），〈算命是一门科学么？〉，《学丛》第3卷，1-20。

有津贴的副所长和《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主编。这是一个大改革。新主席凡事亲力亲为，热心参与所内的学术活动。古克礼则比我年轻20多岁，由于他很能干，我委托他处理研究所的日常事务。黄兴宗是另外一位副所长，年纪比我大。他所管的是财务，同时他也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饮食和营养篇〉。从此李约瑟研究所就过着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李约瑟研究所从此开办的第一件事情是定期的讲读班。这是有些类似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由一位参与者从汉籍中选出一篇与科技有关的文章，或者整本书（如《天工开物》一书），然后逐句翻译和解释，再由其他的参与者补加意见或发问。讲读班引来不少参与者：除李约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访问学人以外，还有剑桥大学东方学部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同仁和研究生。李约瑟也通常按时列席；虽然他已不再参与讨论，但他的出现对在座的中国学人无疑是一种鼓励。而年轻研究生的出现使李约瑟研究所也有点朝气，不再像以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好似一个养老院。

信托会开会完毕，我就返回布里斯班。4月，我去台北出席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两个咨议会的会议。会后又往圆山饭店参加一个国际欧洲汉学史研讨会。我还拜访了陈立夫老先生，代表李约瑟向他致候。李约瑟在重庆时代已经认识陈立夫。陈立夫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曾多方鼓励李约瑟的工作。他赞助《中国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在台湾的出版。我协助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商谈中译本版权的事宜。我回剑桥的路程经过东京、香港和新加坡。

投桃报李

我去剑桥上任以前，已经想到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事要比替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更有意义。李约瑟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与文明》都依赖英国国外财力和人力的支援。从前我亲耳听到一个从埃及来访问的人对李约瑟说，全人类都欠他一大笔感谢的账。[1]这些恭维的言词对我没有作用，没有令我误会出钱出力的人都是有欠于李约瑟的。反而我认为李约瑟研究所理应做点回馈工作。既然李约瑟研究所全靠国际上的资助，它也应该对国际上有关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贡

[1] 李约瑟很高兴听到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出于说者的本心。他是有求而来，而不是报答他讲的所欠下李约瑟的账。再说，他的事情也跟《中国科学与文明》毫无关系。

献，让他们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者有机会利用这个研究所。美国的学者不需我来操心，因为有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其他基金会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到剑桥工作一段时期。较早时，李约瑟研究所已经获得英国大和基金会的资助，让两名年轻的日本研究生在英国大和研究员（Anglo-Daiwa Fellow）的名义下，到该所从事研究工作。[1] 可是中国内地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出国做研究的机会则相反比较少。协助李约瑟出钱出力最多的是华人，我觉得应该先从华人方面着想。这次李约瑟研究所的情况已经安定下来，我专程路经香港会见毛文奇主席和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董事们，向他们建议资助中国留学生在剑桥念博士学位。结果一位研究生获得香港的资助往剑桥念考古学。他是现任职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教授。我又获得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资助，邀请北京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美东所长及刘钝博士到李约瑟研究所做短期访问，以建立两所之间的密切联系。4月30日，我回到剑桥。5月2日，我出席在罗宾逊学院教堂举行的鲁桂珍追悼仪式。

有一天，当我正在沉思如何资助一位中国年轻研究者到剑桥来访一年时，突然来了一位访客。他就是来自美国三藩市大学的梁栋材教授，也是一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我跟他谈及我的烦恼。他说我可以向纽约李氏基金申请资助。[2] 他还对我说，他就是该基金会的主席，而他的夫人是该基金会的财务管理人。这个基金会的创立人是他的岳父。第一位取得该基金会资助访问剑桥的学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洁民。

李约瑟的长寿秘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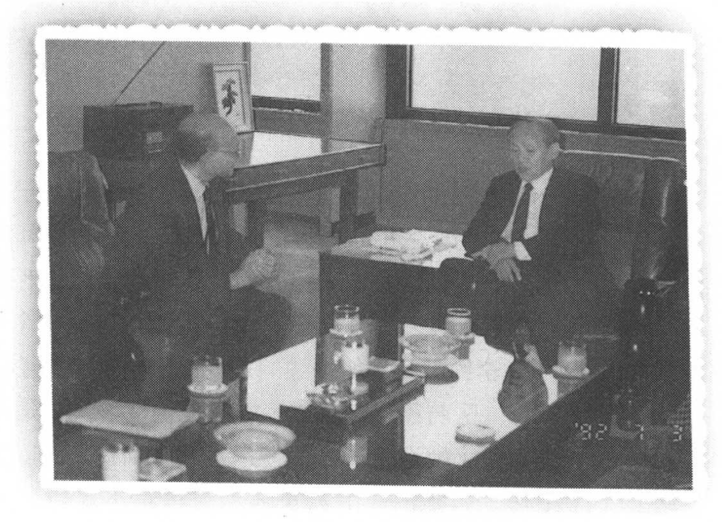
提到梁栋材院士，我想起李约瑟托我引证他的一个长寿秘方。早在1958年，他曾经对我说，依据遗传学及他本人的体形，他恐怕活不到70岁。他的父母仅能活到五六十岁，而且他体重约90公斤，不是长寿的体形。1990

[1] 其中一名是伦敦大学的博士候补生，研究宋代中国数学家对和算的影响。后来提呈论文，由我担任主考。由于他本人和他的校外考试委员都在日本，我利用到台湾参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会议的机会，路经日本，借用神内川大学的校址，举行他的答辩口试。一举两得，替伦敦大学省了一笔旅费，也替蒋经国基金会间接资助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当然是用英文写的。论文题目和和算有关，使用英语时遇上一些技术性日文名词还需多费时间去解释。伦敦大学的主考有权允许博士候补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我就动用我的权力让这位博士候补选择用日语作答。他的校外考试委员也是神内川大学的一位教授。何乐而不为？

[2] 纽约李氏基金会和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是两回事。

年，李约瑟还活着，而且活到90岁。他认为这要归功于长期服用人参。他的上海朋友寄给他许多人参。鲁桂珍说不可多服食，多服食会太补。寄来的人参分红色和白色两种药丸。李约瑟在星期日和星期三这两天分别服食不同颜色的药丸。梁栋材是三藩市加州大学的一位著名医药学教授。李约瑟听说我认识他，便托我向他询问人参对益寿延年的功效。虽然所得答案是尚未获得医学上的证实，我回剑桥向李约瑟报告后，他还是相信人参应该是对他的长寿有效。我没有说出我存在心里的一个猜想。也许正是他坚持完成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医药篇〉和〈结论篇〉的坚强意志在推动他体内的求生机能。1992年我访问韩国，跟韩国的朋友谈起李约瑟与人参这回事，他们乐于听我讲故事，其中几位还赠送我一些人参。

5月，美瑶陪我去访问德尔拉姆和爱丁堡。我也邀请陈美东与我们同行。我在爱丁堡大学做公开演讲。6月20日我们离开英国乘搭飞机往东京，做客中山茂在代代木上原区的一个单位。24日，我们去大阪会见后藤邦夫，问及日本东亚科学史研究中心计划的发展，知道一切已成泡影，他已经不抱希望了。7月2日，我们同赴首尔。我在首尔国立大学做一次公开演讲。韩国的朋友曾经从大宇基金会获得资助购买韩国书籍以赠予李约瑟研究所。我造访大宇财团的理事长李奭熙博士向他道谢。7月4日，我们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梁栋材夫妇也到来参加。梁栋材的夫人生在美国，不谙普通话，和美瑶成为好朋友，说要认美瑶做姐妹。从此我们就和纽约李氏基金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我在任期间，每年都有一位年轻华人科学史研究人员，在纽约李氏基金会研究员（Li Foundation of New York Fellow）的名义下，访问李约瑟研究所。这项安排现在还在继续。



访大宇财团的理事长李奭熙博士



与王赓武出席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

我们路经新加坡回家。在家逗留不久，我再启程往新加坡，担任1992年度陈嘉庚基金会讲座的演讲人。8月，我去杭州参加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个没有列入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系列的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国际会议。我住在西湖边的西子宾馆。《文汇报》记者采访我，问及李约瑟的近况和编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结论篇〉的进展。[1]研讨会的办事人听说我的先祖是上虞人，就安排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博士陪同我去他的家乡上虞一游。我也到过杭州大学拜访1973年第一次认识的薛艳庄前校长。当时她代表对外友好协会在杭州招待格理斐大学的五人访问团。

李约瑟在世最后的三四年

在新的组织管理下李约瑟研究所的运作已步入正轨。虽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出版尚未即时改善，但在古克礼的努力之下，出版的前景也渐露曙光。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李约瑟这位老人家，要关心他避免受人利用和被欺骗。鲁桂珍的逝世也使他遭受一个很大的打击。

李约瑟晚年所关注的是《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医药篇〉和〈结论篇〉。〈医药篇〉的合作者本来是鲁桂珍，可是她素来不动笔，说是李约瑟写得比她好，不该由她来写，而且我上任以后很少看到她在研究室里工作。以她的年龄和身体状态这也不足为怪。〈结论篇〉则靠罗宾逊

[1] 见《文汇报》1992年8月27日第3版。

(Kenneth Robinson) 代为整理。罗宾逊是牛津大学出身，文笔媲美李约瑟，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工作比年轻时慢，但李约瑟总算可以放心。问题是在《医药篇》。我尚未上任时，李约瑟已经邀请一位从中国来的大夫，协助编写这部分册，替他起初稿。鲁桂珍告诉我说这位大夫没有写过一个字，我不以为怪。1990 年的一天，来了一个美籍日本人访客，自称在美国行医，知道日本有不少基金会可以资助研究东亚的医学史，而且他本人发现中国的医学和量子力学有些关联。李约瑟相信他的话，邀请他合作编写他的《医药篇》，并且介绍他来见我。我就是这样跟他见过一次面。李约瑟后来很高兴的对我说这个访客将来可以替他从日本获取资助。我离开剑桥出差的时候，听说这位大夫来过李约瑟研究所三四次。在他第三次访问的时候，他邀请李约瑟替他向日本的一个基金会申请资助。当时我在新竹清华大学讲学。李约瑟替他写了申请信，寄到新竹托我附加几句好话，转寄去日本。我对这位仁兄的量子力学和中医关联说已经存有疑心，我一字不加，就把李约瑟的原信付邮寄往日本。1992 年，这位仁兄第四次访问李约瑟研究所。他认为李约瑟已经是他的老朋友，就称呼李约瑟为“Joe”。这个字本来是“Joseph”的简称，可是也用于称呼美国的有色人种大兵。李约瑟听得不顺耳，古克礼就得替他挡驾，请这位仁兄不要再来访问李约瑟。李约瑟替他向日本的基金会申请资助的事情也没有下文。

我谨记从前父亲讲课时期所引的一句“入境以问禁，入乡以问俗”的话。有一天，李约瑟因病没有上班。他从中国请来的一位合作者是名大夫。这个大夫就拿着听筒，走过去探看李约瑟所患何病。但他很快就跑回来向我报告说，他被李约瑟的看护赶了出来，并且被骂了一顿。这个大夫是出于善意，而李约瑟的看护是严守职业上的规矩。不理会父亲所教的那句话就会引致这个误会。我深知自己不是英国本地人，对李约瑟个人的事情特别小心，不能犯错。李约瑟早已委托两位凯思学院的多年朋友哈兰院士（Brian Harland）和麦法逊院士（Ian McPherson）照顾他的一切私人事务。两人分工合作，哈兰照顾李约瑟研究所的事情，而麦法逊则照顾李约瑟的起居、钱财和身后事。我从来不越权干预麦法逊的任务。我们两人相处得很好。他找我帮忙的时候，我都尽力而为。例如，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替李约瑟聘请一个看护和照顾他在家里起居的佣人，可惜经费不足，还需要多一点钱聘请一个在研究所办公时间照顾他的人。这件事情不能动用公款。所以我就在香港找李约瑟的老朋友林炳良，他答应每年寄钱往剑桥，资助聘请一名协助李约瑟的研究工

作和日常起居的女助理员。

中国驻英国马毓真大使很关怀李约瑟的健康。他知道李约瑟不良于行不方便到伦敦，就两三次特派他的一位钓鱼台训练出身姓何的厨师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设宴招待李约瑟。所中同仁也受益得以享受美味的中国餐。

李约瑟所获的最后荣誉

10月22日，李约瑟在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女皇爱丽沙伯（编者注：即伊丽莎白）二世御赐的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的勋衔。这是一个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仅授予极少数的人物，如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其中的一位。顾名思义，授封的人可算是女皇的荣誉同伴。这个事情的经过有一段我从来没有引述的故事。1991年7月，当鲁桂珍还在世的时候，李约瑟的研究室来了一位英国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这位访客和李约瑟道别后，就由我跟鲁唯一博士两个招待他。鲁唯一毫不在意地向他询问，李约瑟从来没有受到英女皇的封赐是否别有原因。我插嘴说道李约瑟并不是没有受过封赐，早在1968年女皇曾赐予他一个封号，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个CBE(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勋号。由于当年有一位披头士也受封，李约瑟不愿意接受女皇的所赐。我补充一句话说，听闻一次不接受御赐，便不会再有下次了。这位访客回答说这也不是绝对的，让他回去试试看，并告诉我们说事情尚未成功前千万不可谈这回事。[1] 当时保守党的戴卓尔（编者注：即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李约瑟是知名的工党左翼派人物，而鲁桂珍又常用毫不敬的语言谈及这位铁娘子。我心中没有存着很大的希望。

9月，从加拿大来了一位在加拿大行医多年的李约瑟老朋友马杰克（Jacque Mar）和他的夫人葩美拉（Pamela）。见过李约瑟和鲁桂珍后，他们对我说希望李约瑟可以获得英女皇的封赐，理应替他申请，但不知如何入手，希望我找到办法进行此事。我没有泄露上次跟英国国会议员的谈话，仅回答说他的提议值得思考。这两位华裔访客离开不久，李约瑟接到鲁唯一向他提出的辞呈，两三个月后鲁桂珍也谢世，上文已经提及这两回事。马杰克医生接到李约瑟传来鲁桂珍逝世消息就写信到我澳大利亚家说，老人丧偶，许多不久随着过世，很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催

[1] 我当然没有跟李约瑟和鲁桂珍提及此事；鲁唯一似乎已经把整个事情忘记了，几年后我还需替他恢复他的回忆。

Tel.(604) 758 2828.
Please send me your number.

242 Cilaire Drive,
Nanaimo, B.C.
Canada, V9S 3E8

February 7th, 1992.

Prof. Ho Peng Yoke PhD, DSc,
8 Holdway Street,
Kenmore, Queensland,
Australia, 4069

Dear Dr. 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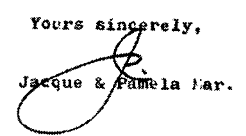
As a multi-proficient peripatetic professor, I hope you found time to get home for Christmas, and received our letter. Perhaps the slightly cool Down Under winter is gently getting you reclimatised from autumn in Cambridge.

W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Joseph Needham bearing the sad news of Lu Gwei-Djen's death, a few weeks after our visit. What a loss to your team! I hope you plan to return in April. Your experience and moderating guidance will be much needed.

As a clinician I cannot but notice the closeness of the Needhams. In elderly couples like these, often when one spouse dies, the other will soon follow, -- sometime within days. So we sent words of cheer and courage to keep up his spirits. But I am apprehensive. Any recommendation for Royal recognition should be speeded if it is to be in his lifetime. There is no time to lose. Is there any hope of it being done in time for the Queen's Birthday Honours in June ? You have full knowledge of what goes on.

I trust this finds you and your family well. We send our Best Wishes for your continued good health and good work.

Yours sincerely,



Jacque & Pamela Mar.

马杰克医生的来函

我早日使到李约瑟获得英女皇的封赐。他的心目中爵士是李约瑟应该获得的最高封号。谁知结果李约瑟受封为女皇的荣誉同伴者。也许有两位加拿大人士误认我是神通广大。其实这不过是事出偶然，我哪有能力影响英国首相向女皇提呈的推荐受封者的名单呢？无论如何，马杰克的信充分表露许多华人朋友对李约瑟的特殊关怀。

由于随着年迈而来的个人身形变化，李约瑟已经没有一套适合的西式礼服可以派上用场了。他获得皇宫的特许，穿着他的蓝色中国长袍，坐在轮椅上，接受英女皇亲手颁发的奖状。这个月，莫弗特（John Moffett）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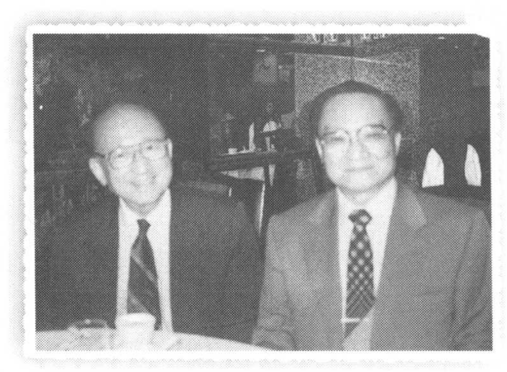
1992年作者与黄丽松夫妇在剑桥罗宾逊学院园内合照

钟喜莲博士（Hilary Chung）任图书馆馆长。1992年年底，我返回布里斯班。

1993年4月，我去香港协助香港大学主办的1993年度第34届国际亚洲和北非洲学术会议中的一个有关亚洲各处科技交流研讨小组。自从黄丽松在香港大学荣休后，我多次在英国、香港和新加坡有机会和他相聚。这次我访问香港，他约我跟查良镛一起在湾仔的一个餐馆共进晚餐。接着查良镛邀请我跟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麦大维博士（David McMullen）在文华酒店用法国午餐。

我在李约瑟研究所的任期将于1994年届满，为筹备资金聘请我的接班人，毛文奇主席建议我写信向香港的邵逸夫基金会申请。于是我就向该基金会的主席马临博士提出申请。等待一段长的时间才获知这次又失败了。我从香港去台北参加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两个会议。会后我去东京，在中山茂陪同之下，访问日本学术振兴基金会。下河边淳博士的任期已经届满，新任理事长在国外出差，会见了两位副主任。他们告诉我，由于日本经济情况逆转，短期内无法接受来自李约瑟研究所的申请。我从东京回到剑桥。

8月2日至7日，我在京阪奈科学城市参与第七届国际东亚科学史研讨会，并做主题演讲。[1] 9月10日至12月10日，我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开一门科学史课。在这段时期我曾访问吉隆坡，出席一个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持的研讨会。同年，有两篇拙作登载在德国的书刊上。[2]



1993年作者与查良镛于香港合照

[1] 参阅 Ho Peng Yoke (1995),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in Hashimoto, Jami and Skar, eds., *East Asian Science: Tradition and Beyond*, (Osaka), 7-16。

[2] 参阅Ho Peng Yoke and May Wang (1993), "Kuo Shou-ching" in I.de Rachewiltz et al.,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Personalities in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121, (Wies-baden) 282-299 和 Ho Peng Yoke and Hok-lam Chan (1993), "Li Chih" *ibid*.316-335。

在新加坡的任务完成后，我回家过新年，然后再返回剑桥。1994年4月，我赴台北参加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会议，顺便去东京替伦敦大学主持博士候补的答辩口试。回到剑桥时，我的所长任期已告届满。剑桥信托会主席莱德爵士邀请我留任，希望早日捐到一笔钱聘请我的接班人。考虑到李约瑟的年纪很大了，又加之我跟这位新主席和副所长古克礼一向合作良好，彼此敬重，我就答应留下。我们没有订下留任的任期，每年莱德爵士都来跟我说句客气话，请我宽恕他再利用我一次。他用的是“Exploit”这个字。我回答说，不能被利用的人就等于一个无用的废人，而他也是被利用来当信托会主席的。李约瑟研究所很难得有一位像他这样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又德高望重的学者做信托会主席。我们两人都是因为公益而被利用，我相信他也跟我一样，绝对不会答应被那些损人利己或者是别有居心的人所利用。

6月，美瑶到剑桥，看见李约瑟从维尔斯度假面带伤痕回来。原来陪着照顾他的是一个妙龄爱尔兰籍女佣，李约瑟答应让她的男朋友同行。有一天，李约瑟摔倒，伤了面部，因李约瑟疼爱这个女佣，也无法追究。[1]这也是李约瑟最后一次出外度假。6月底，我和美瑶乘搭飞机往三藩市，在美瑶的姐夫杨炯煊家小住几天，然后去台湾，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后去香港，向毛文奇主席和林炳良夫妇报告李约瑟的情况。我们路经新加坡回布里斯班。在家小住数天，我再次回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如常，可是李约瑟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上文提及李约瑟在世时常在讲读班列席旁听。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们都高兴和他共聚一堂听讲。使我难忘的是9月在一个研讨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他。[2] 这个一连两天的讨论会是有关道教与它对中国科技的贡献。参会者有当时牛津、剑桥、伦敦三所大学的精英和来自欧洲的道教研究专家，李约瑟也照例出席。讨论的焦点竟然集中到讨论李约瑟对道教的评价。两天的讨论中，没有一个发言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也没有人理会他在场。由于年事已高，而且患上巴金森麻痹病，他毫无能力替自己辩护，实在可怜。当时我任最后一场讨论的主持人，就利用宣布散会的时机替他讲几句圆场话。我说：“在宣布闭幕前，请各位让我用主席的最

[1] 我很幸运能够避开李约瑟的家事。我离开剑桥的时候获得报告说，李约瑟周围的人怀疑这个女佣欺骗李约瑟的钱财，把她解雇。古克礼还须动用警方，她才肯离开。

[2] 参阅何丙郁（1996年），〈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12卷，93-98。

后发言权，讲几句话。我要尝试投考一个外交官的考试，由各位做主考，但是由我自己出试题。试题是‘我对在座全体参会者在这次研讨会中表现的意见’。由于我是最后的发言人，各位主考不必将我的得分告诉我，只需心里有数。首先，我要向诸位发言人致谢，提供许多宝贵意见，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的科技贡献不限于道教，我的意见当然是和他们一致的。李约瑟博士认为对中国科技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道家。他是从‘道’的广义来说。‘道’是一种哲学，包罗万象，从先秦诸子的学说至自然哲学，不限于道教，我觉得他也是对的。会上有几位没有发言的参会者，他们大概深明道家的‘无言之教，无为之益’。他们当然也是对的。”

散会时剑桥大学东方学部的麦大维教授带着微笑说，我考及格了。我也带笑回答说，可惜及格也派不上用场，我已经来不及当外交官了。李约瑟指着离开会场的一位与会者，问我他是谁。我回答说，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历史系讲座教授巴若特博士（Tim Barrett），而他的专业是中国的宗教史。这是我跟李约瑟最后一次的交谈。我向他道别后，当天晚上我得赶搭飞机往台湾，去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五个月的访问。

1994年9月至1995年2月，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讲座，同时在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开硕士班科技史课。我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宣读一份报告，解析《南齐书》中的一篇有关太乙术数的〈史臣曰章〉。[1]台北出版一部论文集，载有一篇有关《易经》和科学的拙



1994年在台湾大学做傅斯年纪念演讲

[1] 参阅何丙郁（1996年），〈太乙术数与《南齐书 · 高帝本纪上》史臣曰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卷，第2期，383-413。

作。[1] 我在“中央研究院”任务结束后，就回到布里斯班家中。澳大利亚时间3月25日早上，古克礼突然来电话，报告李约瑟病危。再过若干小时，又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世长辞。这是剑桥时间的3月24日。3月31日，凯思学院举行李约瑟的葬礼仪式。

4月初，我去台北出席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两个会议。会后，参加一个中国科学史研讨会宣读主题演讲。[2] 我从台湾回到澳大利亚，发觉腿部不时作疼，我以为是老年常患的风湿，没有理会它。剑桥传来消息说，我必得回到剑桥参加6月10日将在剑桥大圣马丽教堂（Great Saint Mary Church）举行的李约瑟追念仪式，于是我就忍着腿疼去剑桥。在剑桥靠着李约瑟遗下的手杖走路。席泽宗院士和王渝生副所长代表中国科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所莅临剑桥参加这个仪式，在我家做客。仪式过后，我在李约瑟研究所招待一些有关的来宾，谈及该研究所将来的活动方向。从牛津来了一份撰写李约瑟传记的邀请信。我婉辞这个邀请，并推荐加拿大的布鲁博士（Gregory Blue）担此重任。李约瑟留下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他从来不丢弃文件，连自己个人开车犯交通规则罚票也好好地保存下来。我常对图书馆长莫弗特说，我很同情将来替李约瑟写传记的人，恐怕他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参阅李约瑟留下的资料。此外有关李约瑟的某些私人资料是受剑桥大学图书馆保管，李约瑟逝世后50年，始能公开让读者阅览。

李约瑟逝世后，黄兴宗辞退他的义务副所长职。讲读班仍继续举行，而且偶尔利用剑桥大学的课室以方便剑桥大学的研究生，现也无须顾虑方便李约瑟来临旁听。李约瑟在世时，常受剑桥大学人们的非议，说是科技史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而李约瑟既不开科学史课也不授徒。[3] 东方学部多次邀请李约瑟讲中国科学史课，但是都被婉拒。李约瑟每次都说他的第一任务是完成《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各有各理，不能怪任何一方。我认为，李约瑟研究所开办的定期讲读班，可算是与剑桥大学合作的起步。

7月13日，莫弗特陪我乘搭火车去爱丁堡，我还是靠着李约瑟遗下

[1] 参阅何丙郁（1995年）〈从科技史观点谈易数〉，见何丙郁等，《中国科技史论文集》（联经，台北），19-34。
[2] 参阅何丙郁（1996年），〈太乙术数及其对传统科学之影响〉，《科技史通讯》，第14卷，1-12。
[3] 李约瑟曾做桥本敬造的科学史博士论文的导师。桥本是他在剑桥大学唯一的科学史研究生。我认为这是因为薮内清教授的关系。

的手杖，一步一步地蹒跚而行。翌日，爱丁堡大学授予我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回想1989年，格理斐大学在授予我荣休教授的证书上，曾经肯定我的跨学科性的研究成果和讲学方法。这次爱丁堡大学授予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再次肯定我跨学科性的研究成果。宣读奖状的文学院长说，这份差事本来可以交给其他好几位院长担当，由他来负责是他的光荣。我又想起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位探险家在一个荒岛发现史前猛兽，后来火山爆发，荒岛沉没，他幸得逃命还带回他的笔记。故事达到最高潮是后来爱丁堡大学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的场面。我体验的场面远比不上电影中的热闹。

我回到剑桥后，立刻去一所伊维林私立医院（Evelyn Hospital）接受骨科专家检验双腿。专家判断我患的是骨关节炎，勿需动手术，专家说，需要动手术时可以再去找他，他没有开什么药方，仅对我说，双腿的疼再过一段时期就会减轻。我在凯思学院跟一位剑桥大学内科教授谈及此事。这位教授是我在吉隆坡故友丹斯里许启谟的千金。她对我说，回到澳大利亚应该检验体内的尿酸含量。

回澳大利亚途中，路经新加坡。7月29日，在奕康和翠桦陪同之下，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出席伍玉玲的一部《回忆伍连德博士纪念图册》(*Memories of the Plague Fighter Dr Wu Lien-the*)的出版仪式。除了在仪式上发言，我还代表剑桥大学图书馆、伊曼奴儿学院(Emmanuel College)图书馆和李约瑟研究所领受伍玉玲所赠送的这部书。

我乘搭飞机回澳大利亚的时候，航空公司使人用轮椅推我上机。我心里想着，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外旅行。回家后，淑姬马上安排我去检验尿酸，发现确是过多。她便改换我用的血压药，因为以前所用的可能引致尿酸过多。同时他和淑苹陪我早上去跑步。我的腿疼就慢慢消失了。

“龙腾”计划

1996年1月，虽然我还需带着李约瑟遗下来的手杖，我已经能够再次出门。这次是往广东省深圳，参加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宣读一篇有关奇门遁甲与科学的报告。[1]在会议期间，廖伯琴

[1] 参阅何丙郁（1999年），〈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新途径：奇门遁甲与科学〉，见王渝生等，《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集》(郑州)，12-16。

教授来采访，说要替《中国科学史料》写一篇介绍我的文章。

在深圳发生了一件后来不但对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而且对北京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有相当关联的事情。跟我本人有切身关系的主要课题是李约瑟研究所如何有能力聘请我的接班人。我已经年届古稀，早已超过大学的退休年龄。这么大年纪，我还要自己一个人离乡背井去剑桥当义工。原本我以为只做不多几年义务所长，让当时的信托会和两个基金会有足够时间去筹备一笔款项用来聘请我的接班人。原则上大家都同意我的愿望。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梦想。一年又一年，我老是等着，不但接班人的事情毫无消息，连研究所的一部分经费还需靠我在外募捐。我不能怪责任何一方面，因为募捐这一大笔钱绝非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李约瑟逝世后，英国某电视制片公司和李约瑟研究所商议在中国制片。他们需要和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合作，以进行一个“龙腾”（Dragon’s Ascent）计划，在中国内地拍摄一系列有关中国科技和医学的影片。将来售片的利润将由李约瑟研究所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平分。首先这个计划必须获得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方面的同意。我就在深圳的盛会介绍制片公司的当事人认识路甬祥院长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所长廖克和他所内的几位主要成员。除了介绍“龙腾”计划，这个当事人还放映了一部他以前所拍摄的“紫禁城”以显示他的拍摄技术。中国和剑桥两方面都留意制片人不会别有居心，利用影片在西方对中国做恶意批评，同时也留意影片不会让西方人士误认为是一部中国制的宣传片。

推动这个计划，首先需要一笔相当大的捐款作为经费。幸亏香港恒生银行的利国伟爵士慷慨伸出援手，在香港组织一个“中华文明教育基金会”，替这个“龙腾”计划募捐一切所需经费。在拍片的过程中，利爵士还亲自监督制片人工作上的经费支出。有了他手下专业人士的帮助，节省了不少支出。我身为“中华文明教育基金会”的一名成员，多次在香港和他取得联系。古克礼对这个计划全力以赴，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取得密切的联系。从此也建立了剑桥和北京两个研究所互相合作的一个健全基础。莱德爵士对这个计划也鼎力支助，尤其是在后期，寻求买主的最后关头。中国科学院以及前香港总督尤德爵士的遗孀尤德夫人（Lady Pamela Youde）也对这个计划给予很大的支持。

3月27日至4月6日，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一个科学史研

讨会。会后我去东京和京都跟中山茂和矢野道雄两位讨论我发现的希腊占星术与“紫微斗数”的密切关联。4月11日，我返回台北，参加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两个咨议会会议。会后我经由新加坡去剑桥。6月，美瑶从布里斯班来剑桥。6月底，我们一同经由三藩市往台北，参与该年7月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我们在美国住在美瑶姐夫杨炯煊家。在南港我们和梁栋材夫妇每日相见。院士会议过后，我们路经新加坡返回布里斯班。

我在家逗留一个月，不久又要离家去韩国，参加8月26日至31日在首尔国立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亚科技史会议，在研讨会上做专题演讲。[1] 会后我回到布里斯班。我的两个眼睛都需要动白内障手术。手术过后又发现我患青光眼。我就在家养病好几个月。

1997年，美国某图书馆管理员瑟琳（Helaine Selin）所编的《西方文化外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面世，其中包括拙文11篇。[2] 同年4月，我赴台北出席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咨议会的两个会议。会议后，我路经香港和新加坡回剑桥。6月，我去柏林访问柏林工技大学，做该大学在1998年召开第八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的顾问，同时也在该大学做一次演讲，提及传统中国对“数学”这个名词的理念和现代所认同数学这个名词的某些差异。

7月，我去新加坡做1997年度“吴德耀纪念学术讲座”的主讲人。[3] 我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持一个座谈会，并且出席该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开幕仪式。7月20日，丹斯里陈振传在家招待我进午餐，还请来好几位我的新加坡旧友做陪客。饭后李成智带我先去他的家，然后到植物园观赏胡姬花。7月21日，他邀请我在李氏基金会进午餐，会见他的哥哥李成义和弟弟李成卫。当天晚上，吴德耀纪念学术讲座基金会宴客，我又有机会和几位老朋友见面。

---

[1] 参阅Ho Peng Yoke (1999), “Did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Involve Using Calculations to Predict Natural Phenomena?” in Yong-sik Kim and Francesca Bray,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Seoul) 185-193。

[2] 参阅Ho Peng Yoke (1997), “Astrology in China”, in Selin, Helaine,ed.,*Encyclopo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Dordrecht) 76-78； “Astronomy in China”, *ibid*, 108-111; “China”, *ibid*, 191-196; “Ge Hong”, *ibid*, 344-345; “Gunpowder”, *ibid*, 389-390; “Guo Shoujing”, *ibid*, 390-391; “Li Zhi”, *ibid*, 513-514; “Liu Hui and the *Jiuzhang suanshu*”, *ibid*, 514-515; “Magic Squares in Chinese Mathemat-ics”, *ibid*, 528-529; “Navigation in China”, *ibid*, 762-765; and “Yang Hui”, *ibid*, 1043-1044。

[3] 参阅何丙郁（1998年），〈诸葛亮与奇门遁甲〉，见1997 *Wu Teh Yao Memorial Lectures*, (Singapore)和Ho Peng Yoke (1998), “Did Confucianism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1997 *Wu Teh Yao Memorial Lectures*, (Singapore)。

“吴德耀纪念学术讲座”的主讲者要做两次演讲，一次用英语，一次用华语，这是中国内地所称的普通话，而台湾所称的国语，虽然彼此之间也有些微妙的分别。用英语的演讲讨论孔子是否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场所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大讲堂，主持人是坦部教授（Edwin Thumboo）。听众多是曾受英文教育的人们，其中有多位是在大学或教育界任职的。大体上说，这次的演讲仅可算是获得满意成果，我也很高兴看到听众中有许多我的老朋友。可是我用华语所做的演讲则使我十分感动，并引发我的思考。华语演讲的讲题是“诸葛亮与奇门遁甲”。场所是市内的一个新闻社大讲堂。主持人是以前在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代主任的卢绍昌先生。他也是我的老朋友。这个演讲的晚上，报业中心第二楼大礼堂的400个座位都坐满了，站立的听众也有大约100人。发问时刻也很热闹。听众中竟然有些是内行人。在解析奇门遁甲的操作时，我省略了一个要费时间说明的细节，居然有一位听众问及这个细节。我回到新加坡大学的招待所，还接到几次电话问及我的演讲。一位知名的市内术数执业者问我什么时候再回到新加坡做演讲。我深感，在讲述一个与某一种文化有密切关系话题的场合，向同一文化的听众使用相同文化的语言，会更获得听众的欢迎。



1997 年“吴德耀纪念学术讲座”（英语演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

五年后，我在香港九龙的城市大学使用粤语做公开演讲，听众的热情反应也使我难忘。

世上的事情是很难预料的，有时很难得到，但是有时得来却全不费功夫。我在新加坡的一个上午，接到来自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主席詹嘉玲博士（Catherine Jami）的信，说她无法找到愿意主办第九届国际东亚科技史研讨会的单位，向我求助。当天中午，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社学院的院长约我和王赓武三人一起共进午餐。谈话中我提及早上接到的信，文社院长说开会的事情可以由他处理，只要我答应作为这个研讨会的顾问。我真是梦想不到，毫不费力，就替詹嘉玲博士解决她的困扰。

7月底，我返回布里斯班。我被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院士。9月下旬，我又启程往剑桥，这次不经过新加坡，而经由香港和北京，视察"龙腾"计划的进展。9月22日，利国伟爵士约我在恒生银行的会客厅进午餐，和会见协助他监督"龙腾"计划的几位银行职员。他已经筹备到推动这个计划的所需经费。为要向捐款人负责，并且为剑桥和北京两方的利益，他必须监督经费的支出。他也告诉我，他跟制片人交涉的经过。23日，毛文奇主席约我在九龙酒店进午餐，并对我说，由于年事已高，他将辞退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主席职。当天晚上，我跟林炳良夫妇共进晚餐。

9月26日，我乘搭港龙班机抵达北京，下榻金都假日饭店。翌日，我拜访路甬祥院长，接着参加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庆祝活动。廖克前所长前来我住的旅馆授予我欧亚国际科学院的院士证书。他是该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的院长。28日，胡维佳陪同我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一个近年考古的新发现展览。29日，我在友谊宾馆友谊宫贵宾室出席国家科委为李约瑟博士补授国际合作奖的仪式，并代表李约瑟研究所领奖。30日，我前往北京科技大学跟柯俊院士和韩汝玢教授所属的研究人员开一个座谈会。

10月1日，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姚立澄的陪同下，乘搭研究所所长用车往山西太原，受到山西大学郭贵春执行副校长的接待。姚立澄继续陪我乘搭火车去西安。曲安京到火车站迎接，从车站马上带我到西北大学会见他的几位研究生。当天下午，我在西北大学做演讲，谈及宋代如何使用奇门遁甲这种术数预测天气的方法。[1] 10月5日，曲安京陪同

---

[1] 参阅何丙郁（1998年），《从科技史观点试谈奇门遁甲》，《西北大学学报》，（西安）第28卷，第1期，1-4；第28卷，第2期，93-97。

我乘搭火车抵达洛阳。我的一个40年代的老同学冯翠华教授在车站迎接我们，带我们到她的解放军语言学院贵宾馆。1948年我当莱佛士学院乒乓球队长的时候，她是乒乓球小组的文科学生代表。她的丈夫王清辉医生在1949年我替马来亚大学建校筹款的时候，任义舞会小组的义务财政。我们失了联系已经有半个世纪。我们再次会面时，王清辉已经退休，而冯翠华还在学院当英文教授。王清辉曾任军医，当时曾协助同仁用英文发表研究报告。[1] 冯翠华赠送我一本她所写有关英文修辞学的课本。这部书在中国很受欢迎。冯翠华安排我去参观云冈石窟，在曲安京的陪同和一名年轻解放军士兵的扶行下，我被一些路人误会，尊称我为“老干”。10月6日，我乘搭火车回北京；翌日，我乘搭英航班机往伦敦。

在剑桥从1997年至1999年的这段长时期，李约瑟研究所的人员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龙腾”计划上。出力最多的要算是古克礼。他不仅要和北京方面合作计划和监视制片的内容，而且要处理制片人方面的诸多要求，尤其是后者在香港方面感到棘手的时候。莱德爵士和莫弗特对这个计划也花了很多力气。尤德夫人也加入剑桥信托会，北京和香港的人士对她有很好的印象，这对“龙腾”计划有很大帮助。莱德爵士再次要求我留任。我不能在这个时期离开，就答应暂时留下，等候“龙腾”计划完成。12月底，我返回布里斯班。

1998年4月，我去香港大学做一位建筑系博士候补的校外考试委员，同时在该学系做演讲，谈及“九宫图”影响古代建筑的可能性。从香港我去台湾访问新竹清华大学，然后往台北参加该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两个会议。会议后我到东京和京都一行，和中山茂以及矢野道雄两人分别讨论学术交流的一个问题。我路经新加坡回布里斯班，但不久又要离家远行了。5月1日，我乘搭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去伦敦，返回剑桥。

推动科技史的研究

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一个“1998年亚洲科学技术会议”，主题为“亚洲的思想与科学技术”，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做主题演讲，并参加座谈会。李院长不能抽身赴会。于是他向日方推荐我做他的代表，同时也致函邀请我代劳。5月31

---

[1]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清辉会面。几个月后冯翠华来信，告知我他谢世的噩讯。

日，我从伦敦乘搭英国航空公司班机直飞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安排我住在皇宫饭店（Palace Hotel），并邀请我的两位朋友中山茂和牛山辉代参加欢迎我的晚宴。6月2日，我宣读我的主题报告，然后参加座谈会。

我想推动的并不限于中国科学史。我在马来西亚曾经企图在某大学推动研究回教文化圈在历史上对科学的贡献，可惜未能见到任何成果。印度也有一篇关于印度科学史的拙作。[1] 我在日本方面也下过一番努力。上文提及我曾跟几位日本学者建议在日本的关西设立一个“日本科学与文明”的计划，着重于明治时代以来的科技发展，从而与剑桥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遥相呼应，互相协助。90年代初期，我多次访问京都和大阪与日本学者商谈此事，介绍李约瑟研究所的情况，希望日本可以用作借鉴。例如[2] 可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筹钱不易，这个梦想顿成泡影。我异想天开，企图利用这次演讲的机会引起日本大众对日本科技史的兴趣。我的所谓基调演讲（key-note lecture）有以下的结语：

当我们驾驶汽车时，我们不时需要使用后视镜。研究尖端科技的人们也需要留意以往的研究经验和成果。昨日的科学是今天的科学史，而今天的科学也将成为明日的科学史。这就是说，这30年间，日本在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也会成为将来的科学技术史。为提供将来研究科学与技术的人们一个借鉴，我期待将来有人编写一部《日本科学与文明》。（译自日语原文）

我的苦心似乎毫无收获，我虽失望但也没有影响我的心情。凡事我只求心安理得，尽了一己的绵力不必过分计较成败。东京的会议后，我返回剑桥。不久，我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信，委任我为名誉顾问教授。

美瑶在6月中来剑桥。7月，我们一起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往台湾途中，我们在三藩市停留几天，住在美瑶姐夫杨炯煊家。我陪美瑶路经新加坡回布里斯班，8月，我一个人又回到剑桥，然后以副会长身份出席在柏林工技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10月27日至30日，日本福冈市召开第三届国际东方天文学史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一篇有关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占星学关系的报告。[3]

---

[1]参阅Ho Peng Yoke (1992), “History of Indian Science”, in Arvind Sharma, ed.*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Culture*, (Delhi) 219-226。

[2]例如，参阅 Ho Peng Yoke (1995),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 Tradition and Beyond*, (Osaka) 7-16。

[3]参阅 Ho Peng Yoke (2000), “Western influence on indigenous Chinese astrology”, Masanori Hirai ed.*Proceeding of the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iental Astronomy, Fukuoka*, 1998 (Fukuoka), 221-225。

我路经香港返回布里斯班。我在香港访问利国伟爵士，讨论“龙腾”计划摄制的进展。香港东亚科技史基金会邀请我做1999年度“李约瑟博士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利用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和主办人商谈演讲的细节。

1999年3月，我往新加坡和第九届国际东亚科技史研讨会主办人商讨当年8月开会事宜。3月25日，我参加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第五回中国科技史研讨会，并主持一个术数讨论小组。4月3日至4日，我参加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两个会议。

我感觉到有希望在两三年内可以安心放下我在剑桥的负担，在离开剑桥时我应该留下一本书，让后人认识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是一个学者而非一个专业管理者。当时我正在撰写一部英文本术数专书《*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4月，我去台北参加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咨议会会议。会议后我去新竹访问清华大学。公务完成后，我启程往东京和京都，和中山茂以及矢野道雄两位讨论我这部书的细节。在京都矢野道雄陪我去拜访他的老师薮内清教授。薮内清赠送我两部他的著作。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从日本我去马来西亚的槟城，做客敦哈姆丹州长官官邸Seri Mutiara 。这次的目的是参加侄儿奕德的结婚典礼。奕德是亡弟河通的儿子，他在银行界服务。典礼过后，我赶回新加坡乘搭飞机去英国。

5月3日，我回到剑桥。剑桥大学和李约瑟研究所正在忙着准备欢迎江泽民主席的莅临。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会见他时，他说他还记得我是学科技出身。李约瑟研究所送他一套《中国科学与文明》。剑桥大学校长在马丁莉学院（Madingley Hall）招待他进午餐。我也被邀请列席。

8月23日至27日，第九届国际东亚科技史研讨会在新加坡的Merchant Court Hotel 召开。我在开幕典礼上致辞，谈及新加坡和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关联。后来我替该研讨会的论文集写导言。[1] 开会期间我曾向陈嘉庚基金会建议招待从中国来的大会参与者在该基金会进晚餐。

12月，美瑶陪我去香港。我们住在美丽华酒店（Furama Hotel）。我作为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和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第二届“李约瑟纪念讲座”的主讲人，在该酒店的一个讲堂用英语谈《三国演义》

---

[1] 参阅 Ho Peng Yoke (2001), “Forward”, Chan, Alan, Clancey, G.K.& Loy, H.C., eds.(Forewords dated 2001), *Historical Prospective o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Singapore), xiii-xv。

中诸葛亮借东风所施展的“奇门遁甲”方法。香港英语无线电台（Hong Kong Radio 2） 邀请我去录音。香港政府教育署也邀请我参加电视教育节目（TVE education programme） 摄制科技史节目以供中学教师参考。

2000年1月17日至19日，香港大学召开一个21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展望的研讨会。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希望在我到香港的时候会见我，安排了一个方便基金会新主席李国宝的时间在东亚银行开会。所订的时间是1月12日， 星期五中午12时整。我被邀请参与香港大学的研讨会，就提前在11日到达香港，以便出席基金会的会议。不料开会当天的中午12时，圣约翰大教堂举行冯秉芬爵士夫人冯简笑娴（Lady Ivy Fung）的追悼典礼。既然人在香港， 我不能不参与美瑶的四婶母的追悼会。冯家是香港大学的大力资助者， 香港大学的代理校长和中文系的代理主任单周尧教授也跟我一起去圣约翰大教堂。李国宝的李家跟冯家和简家都有婚姻和商业上的关系， 他当然也在场。我们回到东亚银行已经是下午一时一刻了， 与会者还在等着。开会没有按照预先发出的议程， 仅有一个项目， 集中在“龙腾”计划的进展以及我的接班人， 尤其是对接班人的遴选。前一半的项目我可以告诉他们， 后一半是在我权力之外， 只可以照直说。依照剑桥的惯例， 卸任者不可以参与遴选接班人的活动。莱德爵士已经在前一天从剑桥来电话预测香港有此一问。李国宝说他将于3月17日， 在剑桥和莱德爵士讨论这个事情。

4月， 我去台北出席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会议。朱云汉教授已经继任李亦园为执行会长， 而李亦园则成为该基金会的董事会会长。会议后我去新竹访问清华大学。我回返布里斯班的行程经过东京、香港和新加坡， 顺便探看亲友。

回家几天后，我又动身启程去剑桥。从京都传来薮内清教授谢世的噩讯，我代表李约瑟研究所向丧家致哀吊文。5月，美瑶来剑桥。6月底，我们一起横渡大西洋和北美洲往三藩市探亲，住在美瑶的大姐和姐夫家。从三藩市我们飞往台北， 参与该年在南港召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议后我们去香港会见几位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成员， 然后去新加坡。7月11日，我从新加坡乘搭飞机去剑桥。美瑶则留在新加坡参加一个姨甥女的结婚仪式， 然后返回布里斯班。

“龙腾”计划的摄制已经大功告成。利国伟爵士和莱德爵士忙着找个买主。我在这方面帮不上忙。我的《*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已经成稿，便向主编古克礼交卷。

12月7日，我在高雄出席一个纪念李约瑟诞生100周年的工艺博物馆主办的“李约瑟博士在战时中国展览”开幕仪式，并且在该博物馆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做报告。[1] 中山大学文学院钟玲院长邀请我在她的大学做一次演讲。她是我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旧同事，乐得从命。这一年，北京登载一篇纪念李约瑟博士诞辰100周年的拙作。[2] 一部80年代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又在纽约的都瓦出版社再版。[3]

我在剑桥服务的最后一年是相当忙碌的一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替我出版论文集。[4] 2001年2月我在牛津大学沃夫逊学院（Wolfson College）做学术演讲。黄丽松博士不远从伯明翰而来替我捧场。3月底，我在台湾淡江大学的一个国际华人科学史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并且另向该校的同学做演讲。[5] 后来我还替淡江大学写了一篇介绍李约瑟本人的文章。[6] 4月，我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中国科学与文明》〈结论篇〉的内容和编写的进展。接着我从北京赶往台北参加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两个会议。

6月，我去马来西亚度假，顺便回怡保替剑桥大学东方学部向一位朋友探听一项剑桥请他捐款的事宜。我在这位朋友的一个名为 Perak Academy 的学术组织做一次演讲。9月，我在台北出席一个郑和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演讲。新竹清华大学委任我为曾繁城荣誉讲座，任期从2001年9月至2004年8月。10月8日至12日，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出席第九届东亚科技史研讨会。我被邀请参加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一个晚餐兼会议。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场合。会后我前往台北参加“故宫博物院”主办的一个“蒙元文化研讨会”。[7] 开会时才从屈志仁博士处

[1] 参阅 Ho Peng Yoke (2000), “My collaboration with Dr Joseph Needha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to mark the hundredth birthday of Dr Joseph Needham, Kaohsiung, December* 2000。

[2] 参阅 Ho Peng Yoke (2000), *Gengxin yuce*, the Last Significant Chinese Text on Alchem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2000), 19.4: 337-351。

[3] 参阅 *Li, Qi and Shu: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First publishe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Dover Publications Inc.2000)。

[4] 参阅何丙郁（2001年）《中国科技史论集》（辽宁）。

[5] 参阅何丙郁（2001年），〈科学家的质疑精神：沈括与六壬术数〉《*(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March* 24-25, 2001》,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5-12。

[6] 参阅何丙郁（2002年），〈伟人也是寻常人：谈李约瑟博士〉，《淡江史学》，2002年10月，第13卷，7-16。

[7] 参阅何丙郁（2002年），〈蒙元科技的特色〉，《故宫学术季刊》，第19卷，第4期，1-10。

听到郑德坤博士逝世的消息。我从台北回到剑桥。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校长和该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等，一行五众，访问李约瑟研究所。他们邀请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做演讲，我就答应做一系列的三个演讲以纪念故友郑德坤教授。

2001年，“龙腾”的影片找到买主。所获利润由剑桥和北京的两个研究所平分。剑桥所得款项已经足够用来聘请一位领薪的新所长。10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在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会议上，提呈我最后的所长所务报告。我的所长职务也在会议闭会时告一段落。所长的职务就由副所长古克礼博士暂代执行。我的信托会委员任期还有一年，后来被延长至2007年。信托会授予我一个“荣休所长”(Emeritus Director)的有名无职称号。11月，在我离开剑桥的前夕，古克礼在李约瑟研究所主办一个术数研讨会以纪念我在任所长这段时期。

由于所长已经不再是一个义务职位，竞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2002年的秋天，李约瑟研究所经历不少波折后，终于任命古克礼博士为我的接班人。莱德爵士也辞退信托会的主席职，由前香港总督尤德爵士遗孀尤德夫人接任。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后来改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Trust）。纽约的基金会后来也解散了，由一个非正式组织协助在美国筹款。最近几年，李约瑟研究所也从英国某些机构获得资助。例如，中英教育基金会以中英研究奖金（Sino-British Fellowship）之名，资助中国学者到访李约瑟研究所以及该研究所的人员往访中国。英国（人文科学）学院(British Academy)也曾资助李约瑟研究所在剑桥开办小组研讨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主要分册，如〈结论篇〉和〈陶瓷篇〉已经面世，余下的四五部分册可望在这几年内大功告成，了结李约瑟博士的心愿。古克礼也替剑桥大学开科技史课，以促进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大学之间的合作。

后记与回顾

第八章

我以非常轻松的心情离开剑桥，我想起伍连德博士当年教导他儿女的一句话：“做事情要拿得起放得下。”也许一个做义工的人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没有金钱上的报酬未必等于没有其他的报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任职期间，很开心看到的是剑桥大学和来自哈佛大学以及海峡两岸的大学，日本和韩国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能共聚一堂，不分彼此，讨论学术问题。这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化交流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以一位来自台湾的博士候补生为例。她初到英国时，英语讲得很勉强，两三年后我发觉她已经可以在国际上的学术讨论充分以英语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李约瑟研究所的讲读班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她的表现比英国、美国的同辈毫不逊色。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经历了在李约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时期后，也得以和国际上的同辈齐名。他们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令我感到欣慰。我认为这是我在李约瑟研究所当

12 年义务所长所获得的金钱不能代替的最佳报酬。

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

我也有机会在剑桥发展我个人的研究工作。由于我不必参与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工作，我觉得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应该尽量避免和这套书重复。[1] 刚巧以前我在香港的术数研究已经是有别于李约瑟而从另外一个观点出发，符合这个避免重复的条件。我在英国的剑桥、伦敦、爱丁堡各大学、中国内地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西北大学等，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以及多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都在这个术数的学术领域内做报告。

单元学科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不足。我的学术研究多具跨学科性质。与跨学科研究背道而驰的是学术中的“定义”以及“领域划分”的争论。以历史这门学科为例，20 世纪中叶，西方的所谓“正统历史派”以古希腊遗传的文化为正统。例如，剑桥大学没有中国史这门课，偶尔提及的都是中国与欧洲有关的事情。主要的课题是欧洲优越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学者们的心目中，中国史学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当时的“剑桥历史学派”可说是“正统历史派”的代表者。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一个皇室讲座教授（Regis Professor），享誉欧美史学界。起初他对中国史也采取轻视态度。1955年，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在他的就职演说辞中说：“中国不能被摒诸人类历史的主流以外。”[2] 以后他和白特费尔德之间发生多次笔战。《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第二、第三册相继在 1954 年、1956 年和 1969 年面世。1962 年，白特费尔德突然改变他的立场，他自己说是受到李约瑟的影响。[3] 可是争论余波还往往浮现在中国科学史的讨论中。有些人还以西方的定义划分中国的科学史。例如，在第四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中有一位物理学专业者以西方的

---

[1] 例外是某些 90 年代出版的 80 年代的文稿。例如：Ho Peng Yoke and F.P.Lisowski (1993),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ing Arts: A Historical Overview*, (Singapore) 和 Ho Peng Yoke and F.P.Lisowski (1998),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Influence* (Singapore)。

[2] 引自杜维运（1981 年），《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杜维运是我在香港大学服务时期的同事。50 年代末期，我在剑桥认识浦立本，曾跟他和李约瑟等合写一篇有关唐代天文史的学术报告。

[3] 我在拙作（1992 年）〈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2，推想李约瑟和白特费德是老朋友，由于 20 世纪的 30 年代他们曾参加一个小组，安排科学史演讲。1990 年有一天，我跟李约瑟共进午餐时提起白特费尔德。李约瑟表示他们彼此不是朋友。他说：“He was not my friend.”。谨在此更正。

定义说传统中国没有科学。传统中国是否有科学的问题本书已经作了交代。较近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天文记录不属于科学史。其实，当年我研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记录时，我的心中也毫无科学史这个念头，谨希望可以对知识和学问做一点贡献。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泽宗做类似研究的时候，也跟我有同感。况且我们的主要有关著作都是登载在国际专业性的科学学报，而非科学史学报。除非是职责之所在，例如，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时期曾涉及“版图之争”的问题，否则我宁可选择置身事外。譬如说，我没有兴趣跟图书馆争论如何分类我写的书，谨希望读者对它感兴趣而能从图书馆里找到它。

对我个人来说，跨学科研究曾向我提供许多方便。我在20世纪60年代〈黛谷来鸿〉的一文曾将个人的研究范畴比喻为一个矿场，蕴藏矿物数量因地而异，有些很快就被挖尽，有些则比较丰富可以开采一段长时期。当时我在马来亚大学系主任办公室的书架上有若干种类书。往往翻阅其中几本书就会有所发现，找寻到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当时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人比较少，科技史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藏，用之不竭，与我早年在物理系的气流研究有天渊之别。

中国有“学以致用”，而西方有“为知识而寻求知识”两种说法。我认为两者是相容的。我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深感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必要。首先应该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因此我的学术研究也注重文化的交流。20世纪60年代我在吉隆坡时已经关注这个问题。我卸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职后的学术活动也较为趋向文化交流方面。例如，2003年出版的一部和另外一部现在排版中的专书都涉及国际文化交流。[1] 2003年和2004年，我分别在吉隆坡的拉曼大学（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做演讲。[2] 每次都以文化交流作为话题，希望这种学术研究方向可以促进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从而有助于民族和睦相处。学术既能“为知识而求知识”，又能对人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无职一身轻

2002年4月8日至12日，我应中国工程院宋健院长的邀请，在北

[1] 参阅 Ho Peng Yoke (2003),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 (Curz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新书名 *Explorations in Daoism: Science in Literature* (排版中)。
[2] 参阅 Ho Peng Yoke (2005), *Personal Encounter of Islamic Links with Chinese Studies, CMCS China Research Series* No.2 (Kuala Lumpur)。

京参加一个国际现代和近代中国科学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介绍即将面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结论篇〉。会后我赶去台北，参加我最后一次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会议。14日至16日，我以曾繁城荣誉讲座身份访问新竹清华大学。我利用访问台湾的机会到东京一行，向中山茂请教一个19世纪一位日本作家的问题。我近来到东京，每次都约他和牛山辉代共进晚餐，谈有关李约瑟的往事。由于我们往往提及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的趣事，牛山辉代美称我们的聚餐为“迷你李约瑟座谈会”（Mini Needham Symposium）。

7月初，我在南港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议后我前往香港，代表李约瑟研究所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三场纪念郑德坤教授学术演讲。这次的演讲全用粤语。三个讲题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九宫图与魔方阵”、“由文化交流产生的紫微斗数”和“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奇门遁甲”。[1] 郑培凯主编《中国科技史的新视野》（2003年）的序言中谈及听众的情况，不仅另外开的一个讲堂满座，连走廊也站立不少听众。我感到可以用一比喻，将演讲当作客人用餐，听众是客人；演讲所用的语言是食具。假如招待客人的是一样的中国菜，西方客人也许比较欢迎使用西方的餐具，可是大多数的华人就比较欢迎使用中式餐具了。虽然是一样的菜，餐具所带来的气氛是难以代替的。我本人食西餐时使用西方餐具，中餐用中式食具，日本餐用日式餐具。这是容易理解的事情。这就难怪听众欢迎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与他们本身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话题了。

10月14日至22日，我访问北京。我首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欧亚科学院北京中心院士会议。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介绍我的一部有关《道藏》研究而尚待出版的新书。[2] 我还跟刘钝所长谈及2005年北京召开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筹款的事宜。10月底，我去剑桥出席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一个会议，在剑桥住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院士宿舍，作为麦大维教授的客人。

2003年4月，美瑶陪我访问新加坡和吉隆坡。从吉隆坡我们开汽车去怡保。我再次在Perak Academy的学术团体做演讲。回到吉隆坡，我又在新近成立的拉曼大学（Universiti Tunku Rahman）做演讲。当时

---

[1] 参阅郑培凯主编（2003年），《中国科技史的新视野》(香港)，3-44。

[2] 参阅何丙郁（2003年），〈我研究《道藏》炼丹术文献的回顾与反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2卷，第2期，97-104。

非典型肺炎的传闻满天飞，见的朋友不多。幸亏六弟河津夫妇从芙蓉到怡保来见我们，在吉隆坡时我们又得和三弟耀南、二妹润金和三妹丽金相会。7月，我前往新竹清华大学履行我的曾繁城荣誉讲座的任务，主要是跟研究生们谈他们的研究进行情况。完成我的任务后，我顺便到日本一行，探问两年前我提出的一个薮内清纪念讲座计划的进展。当时我跟麦大维教授建议在剑桥大学东方部设立一个薮内清纪念讲座，并得一位日本朋友乐意答应替我们在日本筹款。我在东京的旅馆肠胃不适，中山茂夫妇到旅馆见我。我取消一切约会，返回澳大利亚家中。我的《*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这一年在伦敦出版，收入《李约瑟研究所专书系列》，版权费都全部捐给李约瑟研究所。10月底，我去剑桥参与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一个会议，住在罗宾逊学院的一个院士客房。在一个凯思学院的晚餐上，我坐在霍金教授（Stephen Hawkins）身旁。他的研究室就是以前李约瑟所用的K1号室。通过他的特制语言转音机，我们谈起李约瑟。他提及李约瑟留下写在壁上的“人去留影”这四个字。我向主编古克礼提交拙作《*Explorations in Daoism: Science in Literature*》的文稿，然后乘搭飞机经由新加坡回布里斯班。

2004年4月，我去新竹清华大学履行我最后一次的曾繁城荣誉讲座任务。事后我访问东京，会见中山茂和牛山辉代。中山茂夫妇和他们的儿女招待我在银座的一个餐馆吃晚餐。中山茂陪我先去餐馆，发觉不少我们以前熟识的地方已经改变了，连中山茂也需向人问路。中山茂说，他近来很少到银座。我深感世事瞬息间的变化。我从东京往新加坡和吉隆坡。新加坡的潘国驹博士建议我替他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写一部我的自传，先用英文，然后再考虑出中译本或者另出中文版。我在吉隆坡替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和创价学会做一次公开演讲。

7月，我去台湾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遇到杨振宁谈及新加坡的潘国驹。潘国驹是我两人都认识的。杨振宁请我代他向潘国驹问好。会后我在新加坡停留数天。潘国驹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客卿教授（Adjunct Professor），他向系主任胡祖协讲座教授提议，邀请我在物理系做演讲。[1] 在谈话中，胡教授提议我在演讲中谈我的经历，

---

[1] 客卿教授不受大学的薪酬，也没有大学的职务，但可以替大学的有关单位做些义务的事情，例如，指导研究生，安排演讲等。我的次女淑英也任南澳大利亚雅德雷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航天力学 Adjunct Professor 。

告诉物理学的听众，一个物理学家在汉学的研究上，能够做些什么汉学家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在毫无准备之下，就在理学院的一个讲堂跟理学院的听众一谈往事。我抱着轻松的心情在我的母校跟我的不同年代的同僚谈话，不用讲稿显得更为亲切。世事轮流转，想起当年我在该理学院的任务是由我找人来做演讲，这次我反而变为被动者。我又想着我的演讲生涯是50多年前在我母校的物理学系开始的。这次回到同一个单位做演讲是否我的演讲生涯已经走过一个大圈子，这该是我的演讲生涯告一段落的好时机。

我用过午餐回旅馆途中不小心摔倒，折了左臂骨。在旅馆附近的亚丽莎伯医院施药后，我回到布里斯班动手术。10月，我为胆石外漏再进医院动手术。出院后我专心撰写我的英文版自传《*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初稿完成后，托人替我过目并提供意见。

2005年，一篇关于数字学的拙文登载在欧洲出版的刊物上。[1] 2月，英文版的自传文稿已经完成。2月底，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开会。我利用路经新加坡往剑桥的机会向潘国驹博士交卷。2005年是美瑶跟我结婚的50周年，这是把我的英文版自传献给她的一个良机。8月，北京召开第22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我就和她一起到北京和阔别了21年的上海一游。我们在北京住在友谊宾馆的贵宾楼，见到许多朋友，并且有机会到王府井和颐和园游览。会后我们迁往北京国际大饭店，北京科技大学的柯俊院士和韩汝玢教授来访。中国国际旅行社为我们安排在上海的观光节目。我们很欣赏上海的发展，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回想1984年在上海遇到李约瑟的许多朋友，这次再也见不到一个了，真是宛如隔世！十年沧桑，何况是21年呢？我们仅得和研究李约瑟的专家王国忠先生一见，约他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关增建教授到我们居住的王宝和大酒店共进晚餐。

我们启程往北京时，我的中文版自传已经完成了一半。从上海回家后，我就集中精神继续撰写自传，期望能早日向潘国驹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交卷。现在，英文版自传已于2005年面世，希望中文版自传尽早出版与读者见面。

---

[1] 参阅 Ho Peng-Yoke (2005), "Chinese Number Mysticism" in Koetsier, T. and Bergmans, L., eds., *Mathematics and the Divine: A Historical Study*, (Elsevier, Amsterdam), 45-60。